

人的新世界



與新世界的人



美國 Anna Lonise Strong 著 李銘·魏寧·蕭琳合譯

美國·斯屈明女士著

上海
上錄
刊

李銘·魏甯·蕭琳合譯

海
社 版 出
行

人的新世界與新的人

譯者序言

關於介紹蘇聯的書，不論是譯的人家的，或是由自己親身到蘇聯觀察了寫的，已經不少了。但我們敢說已有的許多書，不是戴了有色眼鏡的歪曲報道，不是根據了考察所得的材料所作的浮面的介紹，便是僅僅一種觀感印象；深入蘇聯人民生活，根據了長時間的體驗，不單是知道得他們的生活樣式，而且知道得他們在十九年新生活中生長的新的生活意識的真實報道，在這裏，我們敢認斯屈朗女士的這本書說得上是這樣的一本書，爲了這，也是我們三個淺學的人敢大胆地來翻譯出來貢獻給我們中國的讀者的。

作者斯屈朗女士現任莫斯科新聞編輯，她的情形，我們不十分詳細，但得說的，她在蘇聯曾經耽過十五年，在今天說已經不止了。她不僅和蘇聯各界的上層相熟識，據書裏的具體材料看，她曾經到過蘇聯的各處地方，曾經和蘇聯的一切人們一起生活過，以這樣的人來報道蘇聯，我們敢相信不因她是個美國人而與蘇聯人自己來說有所不同吧。

這本書，從蘇聯的真實一刻不停的在變的一點說，它不是什麼不朽也無需是不朽的書，但在目

前說，爲的它根據了的是最近的事實，爲的它是長時期實際體驗的結果，爲的它以最平常的事來證實基本的理論，我們敢介紹而在這裏再着重的提出這三點優點來。

這本書的翻譯是我們三個人分任的。其中第一至第七和第十三十四的九章由李銘翻譯，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十六的四章由蕭琳翻譯，第九第十第十二的三章由魏寧翻譯。譯成後爲求文氣筆調的一貫，全由魏寧根據原文對校過一遍。其中誤譯，不妥，不一貫的地方一定很多，我們三個人竭誠希望讀者和翻譯前輩給我們指正。我們三個人也不以誰譯誰校願負同樣的責任。

最後我們對這一本書的譯本作這樣的期望：第一，我們希望有比這本書更詳細更新的書來代替這本書；第二，我們當把譯稿付印的時候，知道馮貞俞先生也譯成了它，但我們希望馮先生如果認爲有同出二種譯本的意義和必要的話，也把它印出來，來代替我們不成樣的東西。

最後我們至誠的感謝替我們畫封面的蔡若虹先生

譯者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序論——對一個新世界的解釋

一年前，一位俄羅斯負責的共產黨員曾經對我說：『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之下，我們人民的心靈變得這樣快，竟使我們難能與世界其他地方接觸，我們覺得更難理解他們，他們也更難理解我們。』

我們在蘇維埃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出入的人，很敏銳地感到這種困難。這兩個世界之間，不僅有從紐約至莫斯科的空間上的距離，在精神上，也有從蘇維埃人民生活至美國生活的不同。像自由、民主和獨裁這些重要的字，在兩處也各有其不同的意義。蘇維埃世界明確地意識着對未來的計劃；而資本主義世界則盲目地發展。蘇維埃的執政當局的行為也有不為人民所理解，但他們認為只有真正懷有惡意的才會懷疑他們，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解釋，也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向產生蘇維埃世界的舊世界解釋這一個急速增長着的蘇維埃世界，現在是越發繁複的一件事了。因為假使它底外表的成績，一年年發展到愈益明顯的時候，它底內面的生活也日益與資本主義世界在一切方面分別出來。

在柏林車站上，第一使我注意的是用三尺高的字寫的『你頭髮怎樣』的一句話。我的心便閃起

了我已經離開了的世界。蘇維埃人民怎樣考慮了這一點的呢？史達哈諾夫運動，莫斯科城市計劃，瑪麗和她的製糖甜菜，遠北的征服，再後是頭髮和裝飾，是的，那是當然的。每個人都知道生活水準的提高，堅信需要一種文化的生活——充裕的衛生設備，無線電話，書籍，戲劇活動，再無疑的需要更好的裝飾。不過他們的個性，不是由財產或文雅來表現，而是由人們創造的各種各樣的方式。總之是動的；他們的文化就是動的。

資本主義世界內第二件值得注意的，是財產的統治生活。那裏儘是些「愛情損失的追償」「五萬金元一個人」或者什麼「我只是爲了這裏的錢才幹呀」之類的話，他們所謂的人生和工作怎樣的卑微呀。我看見有些能幹的工程師們，爲維持生活做着政府救濟他們的小事，不是消蝕便是攔起着他們的創造力量。我看見一個很好的刊物，一位很能幹的編輯的終生工作，結果爲了新老板要急速獲利而至於衰敗停刊。在蘇維埃世界裏面的生活，同樣也有着限制的，不過限制它的不是那一個上司的利益，而是組織的階段和目的。

代名詞的使用也有着不同。資本主義下的人民的「我」和「他們」是對立的。一位評論加利福尼亞煤油場罷工的曾經說過這話：「太壞了。不能在我這地方發生。」蘇維埃人民會歡呼「我們的新油井」在他們，私有油井這觀念，恰如私有郵政制度一樣的奇怪。我記得關於美國失業的一句

話，即「假使事情更壞，那他們得有所作爲。」這不能制服的「他們」是誰呢？名詞無視了階級社會，也是說的人們所意識不及的；他們也許正在等那個上司有所作爲吧。我聽到過一回辯論「美國是否走向法西斯蒂，」我就想到蘇維埃人民就不會這樣說。「我們將走向法西斯蒂嗎？那末我們將怎樣切實地阻止它呢？」蘇維埃人民一定說地球上六分之一地方的「我們。」烏茲倍克的棉田工人，在中央亞細亞的日光之下耕作，可是他們說：「我們征服着北極；我們挽救却留斯金。」烏克蘭的農民，從未乘過飛機，可是他們也談「我們的高空紀錄，」和「我們高爾基號的損失，」並且捐錢建造十架新的。然而甚至羅斯福夫人還問我：「俄羅斯農民是否比以前更順從領導？」當我回答「不，他們正在學習改進組織工作和領導他們自己」的時候，我正感到語言的無能。

美國人常常問我：是否俄羅斯人天然比美國人來得仁慈一些，和更適合於共產主義，不，有些根本不那麼樣。俄羅斯人在革命時，比美國人更是中世紀的。這也就是說俄羅斯人「天然的」更窮困，不可靠，無效率，老是爭鬧欺騙，亞細亞社會的特點到處都有，有時真使到俄羅斯去的感到討厭。但是在財產公有的事實下，這些特點都消失了，現在個人與社會完全一致了。

國家財富和生產機構的公有，是蘇聯經濟的實體，它統一了蘇維埃生活，它使生活能動化了的。使個人與公共福利之間的對立消失，使人們說「我們」的，正是這一實體。使人們意識自己是他們

未來的計劃者的也是這一實體。因為所有者能計劃，而非所有者只能鬥爭，否則便是滅亡。蘇維埃文明的主要的特質，就是世界是『我們的』這一意識，這是他們所要把握，理解和克服的。

我的題目是蘇維埃世界；對於那些快將瓦解的攻擊蘇維埃的勢力，我這裏不談了。我說的不是『全部的真理』，因為真理從不是『全部』的；世界上常至少有兩種真理在衝突，一種在死滅的路上，一種在增長的過程中。美國的那些替英皇喬治進行陰謀工作的保皇派，也有他們的真理，不過他們僅是這世界羅曼司的調味品罷了。大陸的軍部當局的真理，還只是建立一個現代的民主國。他們自己記得在福爾其流域凍了腳，還不如英雄主義那樣的難受。他們這樣的想：過去他們劫掠饑荒的農村，是爲的必要和勇敢。歷史給予勝利者最大的禮物，不僅是他們的生存，也是他們的真理的存在。不過我也不抹煞那些因產生蘇維埃新社會而或多或少地受到破壞損失的生命。但新的歷史爲他們消滅了過去。他們也轉回在新制度中找尋他們新的將來。在財產中潰滅的生活，在工作中再造起來。怠工的改變了，而且得到了光榮的地位；富農從充軍回到工廠農場裏去了；兒童現在不問他父親什麼出身，一律平等了。因為這一個戰鬥根本不同於其他的戰爭，這裏一切人們，甚至被戰勝的敵人，都得轉入勝利者的隊伍，共同承受一切勝利的成果。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目次

目次：……………（一——二）

譯者序言……………（一——二）

著者序論……………（一——四）

第一部 人創造新世界

第一章 改造世界的計劃……………（一——三）

第二章 革命底黨……………（一四——一七）

第三章 獨裁……………（二九——四〇）

第四章 民主主義之增長……………（四一——五三）

第五章 民族的聯合……………（五三——六八）

第六章 領導的技術……………(六七—八二)

第七章 新經濟的建設……………(八二—九五)

第八章 維護和平的鬥爭……………(九六—一二三)

第二部 新世界創造人

第九章 工廠全體……………(一二三—一二五)

第十章 一個大陸的墾種……………(一二六—一四一)

第十一章 澈底解放下的蘇聯婦女……………(一四二—一五八)

第十二章 科學的民主化……………(一五九—一六八)

第十三章 藝術的民主化……………(一六九—一八三)

第十四章 改造人類……………(一八四—一九七)

第十五章 自由空氣中的青年……………(一九八—二二二)

第十六章 新人的發見……………(二二三—二三五)

第一章 改造世界的計劃

「哲學家們只解釋了世界；我們的事業則在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費克巴哈論綱』

我常常自問，莫斯科有什麼吸引人們到它那兒去，人們在那兒要什麼，找什麼呢？爲什麼世界的視線，逐漸的轉向蘇聯，都帶着一種疑信參半的希望，不敢說是已相信了它。這裏，我心裏閃起了一位華爾街富翁底年輕而率直的兒子，在特尼普洛斯脫洛伊（Dnieprostroy）對我說的話。

特尼普洛斯脫洛伊在那時是新俄第一個著名的奇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力水閘』（註一）我們一刻不停的走完了這巨大建築物的『懸崖峽谷』。我們怕聽告訴我們爆炸石頭的汽笛的尖叫。我們看見偉大的碾石廠，鋸作場，汽車修理廠和臨時電力站——一切巨大的工程都爲着建設一個

註一 現在布爾特（Boulder）水閘比它更大。

更大的電力站，一個將供給百倍於它們大的工場之用的電力站。我們過訪了這「社會主義城」這兒，對於這城市的未來，有主張鄉村式，有主張近代都市式，兩者之間正激烈地討論着。我們看見了趕造起來的俱樂部，那裏有數千工人忙着吸取智識，讀寫政治經濟書籍，和關於新工作技術的一切問題。夜了，我們站在還未完工的河岸上面，那裏河水被提高着，準備淹沒那個人造湖潭下面的高灘的。我們往下望着電光的掃射，它破碎了烏克蘭濕原千餘年來的黑暗。揀着一位同伴說：『我想特尼普洛斯脫洛伊已把引起我到俄羅斯來的問題解答了。』

我問：『什麼問題呢？』

『改變世界，還是由一下改進人類呢，還是改變規範人類的社會環境？』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中，工作的噪音，從地底騰起，充滿了地面，不斷的傳到我們那兒來。引擎底尖銳的節筒聲，崖壁撕裂的吼聲，碾石廠磨石的撞擊聲，鑽鑿機鑽鑿河床的聲音，一切的一切——因為在夜裏，覺得格外的尖銳，但爲了距離遠，也不覺得刺耳——混成了偉大的交響樂，人類建設着征服地球的音樂。

在弧形光線的外面，躺着霍爾狄茨島，在過去，這是流匪抗捕的最後立足點。我們記得那個從這島來的粗魯的農女，那天我們看見她穿着外套，管理着十二個用汽槌工作着的人。特尼普洛斯脫洛

伊已經在幾個月內把她從一個農僕變成了一個「組長」。我們還記得那個在鑄造廠爐火旁邊跟我們談話的那個鐵匠，他非常地愛工作，他表示了鐵樣的意志，跟我們說：「你們可知道，我們要在一九三二年以內完成這水閘的。」——一個簡單的工人，把柯柏公司的一等工程師的估計，推前了一年。（註二）

我們記得：河岸左右的工人的競賽怎樣推進了水閘工程，用着不斷增強的意志力超過了美國人精密的估計一倍。紅綠信號夜夜橫過激流指示一天的總績。大紅星慶祝超計劃的完成。夜夜週週，兩岸都競爭保持紅星的照耀。我們記得活動電影，戲劇，音樂會及演講等等。這種種活動把城市的文化帶到來自烏克蘭散落農田中的無數人那裏去。優良的新工藝學院開着晨班，選取河上工作的人，訓練做工程師。我們看見在高岸上的美國顧問們的住宅。關於這大工作的技術，這些顧問比俄羅斯人知道的多，但對於俄人的精神却永遠迷亂。

是的，特尼普洛斯脫洛伊答覆了我全伴的問題了。特尼普洛斯脫洛伊是新社會制度之下的新生產方式，這是全盤的改造人類。

在過去五年之中，美國不斷的有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經濟家到蘇聯去，他們都爲着自己的職

註二 這工人的估計獲勝了。這水閘是在一九三二年即預計的前一年完成了。

業；有偏見的或老朽的旅行家，則找尋新信仰的材料和舊信仰的證據。特別自從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打擊了「永遠得改進」的世界之後，他們從這經濟的「地震」的破垣頽瓦中逃出來，到蘇聯去看，蘇聯造就了些什麼，也許有些什麼東西的。然而，他們決不會像我們青年同伴們，把問題弄得一樣清楚；他們也決不會這樣的迅速地解釋他們所見到的，世界上首創的世界的本質。但是他要求解答的問題，却是基本的，他們大部份所注意的，是一個有人類以來的古老的問題，它曾經苦惱了很多哲學家，正不少於這種失意的遊客，即：「我們的世界能改造嗎？」怎樣改造呢？

這問題尤其激動着美國現在的中等階級。中等階級已經看見它的舊世界被奪去了，但是怎樣被奪去，他們是難以領悟的。百年之前，美國除奴隸制的南部以外，人民百分之八十是獨立的小有產者及通常的農民，他們把民主與自由的理想，「人們應有獨立生計手段的自由平等」(註三)遺給他們的後代。但經過一世紀發展的大規模的工業掃蕩了小的經營，增加了薪水階級的數目，使農民依賴於銀行與市場，這樣，就把美國變做「僱用工人的國家」了。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民依賴他們自己產業而生活，代替百年前的百分之八十。

財產的實體雖消逝了，而其迷戀仍繼續了許久。薪水階級仍然覺得他們有些東西——可不再

是商店，小工場，農田，却是保險、債券、公債的儲金——這些把他們稍微抬在勞力階級之上。突然，世界經濟危險毀滅了這種幻覺。假使要指出這些微小的人們控制他們自己的財產能力之薄弱，那只要看他們流動財富價值由一九二九年之271,000,000,000,000,000金元縮小至一九三二年之40,000,000,000金元。（註四）無數中等階級與工資勞動者一樣被陷於毀滅的深淵；他們同樣地在麵包綫上待着，同樣地注意政府的救濟計劃，同樣地奉承上司。只要資本主義世界一天存在，他們同樣地都得聽憑於上司。上司們具有生產與生活的手段，而且將給予他們以生產與生活的手段。

他們的處境更爲痛苦，因爲在我們西方世界的大部份，過去百年是被約翰斯屈拉齊叫做『有偉大希望的世紀』（註五）啊。』工業革命把生產由家庭工場奪到工廠去了，鐵道，輪船，電報結合了天涯地角，它固然改善了千萬人的生活。尤其在美國——那裏由於新的機械與技術方法的出現，伴着經濟政治之深入於富饒的內陸之地域的擴張，再有由各國來的力壯的勞動者加以推展，更因沒有受到封建殘餘的阻撓——對於不斷進步和繁榮的確信，成了一種意識和非意識的國家信仰。紅屋的小學校也屬望每個孩子將來爲大總統。『到西方去吧，青年們。』成功的財閥們說：『不要在美國』

（註四）依據 Robert R. Dhane 關於收入在五千金以下人的流動財產的數字，由 Corey 摘引。

（註五）約翰 斯屈拉齊 『法西斯之威脅』。

做隻熊啊！但較這種意識的宣傳更深入的，傳播着一種決定底的樂觀主義的空氣，這使每個善良的社會鬥士，對他朋友作不道德的打算。難道美國這樣的大地方，美國有效率的工業，美國生產的能力沒有給每個人民一樣高標準的生活——美國的標準嗎？這很容易證明他們給了的——而現在還是如此。

對於不斷進步的信仰怎樣了呢？除了有些方面這信仰仍然像無望的習俗殘存着，其餘的地方被必然的惡運的信仰所代替了。在歡呼必然進步之後不久，『法西主義的前途不可避免了』，『西方不必避免的昏黑』，『過去繁榮的標準，決不能再有了』，已是口頭禪了。其餘的人開始瘋狂地尋覓過去的信仰，看看別處是否勝於我們，是否還保持這信仰。這些人知道對於進步的必然性之信仰從來沒有成爲普遍信仰，而只限於一定的經濟發展時期，限於那些時期的某數國和某數國的某幾種階級。整個中世紀數百年把世界看做人類本質上不變的花園，宗教由之挑選少數上天堂而遺留其餘的人下地獄，不是嗎？甚至今日，不是千千萬萬人——東方的那些被壓迫的大種族——認爲生命的過程是那樣基本地醜惡的，他們信仰佛教，認「空」是一種幸福嗎？

甚至在我們西方，因爲資本主義腐化爲法西主義，興起了對進步必然性的新的否認。過去的理想——羅馬帝國，日耳曼神，宣揚法西主義的小說所描繪的封建的不列顛——用着情感的魔術鍍

以法西斯主義的教義：認為科學與機械生產是有害的，民主主義和平與戰勝貧窮是腐敗的社會之舞臺的夢想，殺人的戰爭是人類最高尚的目的呀，因為法西斯主義是絕望的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步，絕望的資本主義不能再應用科學與機械的生產，不再敢允許和平或民主主義的存在，它必得無情地拒絕它底犧牲者，不消滅貧窮，然而這在資本主義世界技術上早已是可能的了。

人類的理智能夠找出改組人類社會的方法——一種為人類的意志力所能遵循的方法嗎？我們一定得盲目地跟從未來，忽而因相信必然的進步而愉快，忽而因相信必然的惡運而厭棄，向什麼超自然的世界要求不公平不合理的混亂底合理而公平的平衡嗎？或者，人類思想之繼長的集體的應用，即如科學，我們知道，它在統制和合理化人類現象上還是不完全的，可是我們知道它是最好的一條途徑，不能擴展至於統制和合理化我們人類的運命嗎？人類製造的機械今日愈益威嚇着要把人類奴化；人類能夠克服機械嗎？科學與技術知識所提供的巨大生產力量好像足夠廢除貧窮，然而目今却增加失業，經濟危機，戰爭；人類的意志力能够壓服這些力量嗎？

換句話說：我們是問人類是否能夠主宰命運。是不是人類理智的一切光芒僅是燐火，它給我們增大對物質現象的支配能力，可是却因為它們給了我們虛偽的簡陋的光照，引誘我們踏進了泥沼，更凶狠地陷落我們？或者它們是不是一種黎明時的所謂晨光，它將不斷增強為日光，在其中，不但一

種個別的現象，即人類本身的性質，和他所有組織的社會全部，都能由人類理智計劃，和由人類意志實現出來。

使人們遠涉重洋而至蘇聯的，不外乎這一樣探究。因為，如果在我們西方無數萬人看來，正在過去的世紀是有偉大希望的世紀，那末，在聯合歐亞兩個龐大的半洲的無數萬人看來，寧是偉大計劃的世紀。所指的計劃，不是蘇聯著名的五年計劃，却是遠為廣大——預備並包括各地及一切未來的
一切五年計劃——的計劃。這是八十八年以前，根據倫敦各國勞工會議的指示起草的改變世界的計劃，它以「共產黨宣言」的名字發表於一八四八年，德國經濟學者昂格思和馬克思的著作。

通常以為『共產黨宣言』是政治亡命者的一個非法革命政黨向世界投擲的挑戰。確是這樣。但是，這也是人類第一次企圖為擬定再造世界的計劃——應用科學對人類社會的分析。以前分析世界的企圖是哲學家的課題，然而不志于改變世界。以前改變世界的企圖，限于威脅和忠告，為的獲特殊的變更或改良。還有許多空想的描繪：它們覺得只要一經變動，就可以有非常美麗的社會出現。但『共產黨宣言』則企圖答覆如下的問題：這事怎樣纔能完成呢？十九世紀中葉，那時科學方法意識地改造着物質的世界，也正是那時它誕生了，它分析人類社會的質素，分析我們在歷史上所看見的變動的性質及緣因，為着在一定的方向中產生社會變革的目的。這就是共產主義為什麼是科學

的社會主義了。

馬克思的追隨者看出他的天才，他把十九世紀三個主要的思潮結合起來——古典的德國哲學，古典的英國的政治經濟及法國的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法』。辯證法把每個實在——無論自然的也好，精神的也好，社會的也好——看做經過『內在矛盾』的發展與衝突之不斷改變的進程。這學說在歷史的研究上的應用，指出着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怎樣的不斷變動，有時很慢，有時則以飛躍，災禍和革命的姿態變動着。美國內戰期內的資本主義不是今日的資本主義。新英格蘭城市議會的民主主義不是現代帝國的民主主義。它們可以叫做相同的名稱，但是名字騙人啊，事情甚至正當你注視它——輕視或者佩服——的時候就改變啊。甚至你的厭惡或欽佩也改變，你的話的意義及概念也改變啊。昨天是真的，對的，要得的，明天者不或是真的，對的，要得的了。制度有其存在的時候，也有其停止的時候。

這種改變之中有什麼定則嗎？在這種制度與理想之經常交互作用與衝突之中有什麼基本的東西——有那一種改變其他一切的變動嗎？馬克思說『經濟的結構』是『實在的基礎……生產的方式……決定社會，政治與生活的精神進程之一般性質的。』（註六）在馬克思看來，任何人類社

會的基本東西不是觀念或宗教的制度，也不是政府的形式，也不是家庭生活的本質。這種事情是重要的，然却是有源可推的。它們決定于人類獲得衣食住的方法，決定于他們在這些基本工作中所用的工具與進步的階段。在一個經濟機構不再能獎勵誠實和情愛的世界內，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將不斤斤於這些道德，却創造一個真能誠實情愛的經濟制度，那裏每個人的成功必得建築在其他人的成功上面，決不是由破壞他人而得。新經濟制度將創造新人；在新經濟制度之下，新理想中的教育，將是迅速有效的。

然則，經濟制度怎樣改變呢？馬克思在他『階級鬥爭』的理論中找到了這裏的關鍵。人類的科學及發明創造新的生產方法，這些新生產方法轉而創造人類的新『階級』；即：對於生產有着相異和衝突的關係的人民集羣。在諸階級之間，環繞着生活手段的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而進行鬥爭。『前此存在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主與僱工，一句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互相經常對抗，不斷的鬥爭。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結果，不是社會大部分之革命的重建，便是爭鬥的諸階級之共同毀滅。』(註七)

這樣，在人類歷史各個階段上，新的諸階級由新勞動方法中興起來，在諸階級之間的鬥爭中產

生社會的變革。現代資本主義並沒有廢除階級的對立，却有它底顯明的特點——把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愈益分裂爲……兩大階級，彼此直接對抗——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註八）一方面過着所有者的生活，一方面則只有出賣勞力，求乞上司纔能生活。

在這兩大階級之間，曾經有過中等階級的存在，他們是小有產者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殘留，他們曾經要求私有財產，反對封建的過去。資本主義把他們不斷地，痛苦地置於被僱者的階級之中，在一進程之中，他們受到很大的苦痛。他們奮力反抗他們的運命，但是他們的努力是混亂的，因為他們本能的慾望在於回歸小規模的財產。他們的口號是『分享財富，恢復昔日小有產者的社會。但它已經發展爲今日的獨占了，而且就是能恢復的話，也必然發展爲獨占的。私有財產權曾經是自由底革命底的條件，而現在則隨歷史的過去而變了。小塊農田及手工工具的私有把農奴由封建的主人那裏解放出來；銅廠的私有創立了新的奴隸制。現在甚至小的所有罷，無論其是殘存的或新起的，都是唯大規模產業的馬首是瞻。

世界是誰所有的呢？這是規定一切社會改變的基本問題。據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今日世界上的缺點就在社會化了的的大規模生產的私有，解決的方法，決不在於向後退，恢復固有的農田與手工業，

而是向前達到社會所有一切。不是『分享財富』却由共同享有，由工作的共同組織爲共同的利益而工作。只有這樣，纔能征服巨大的機械；只有這樣，科學及現代的技術纔能爲着全體人類多量地生產。只有這樣，現在人們中所有者及工作者的區分纔能廢除，而這區分是引起社會鬥爭及國際戰爭，把世界毀滅的。必須由一個統一的階級——工人與所有者一致的階級罷除這區分。由這種經濟上的平等產生一切其他的平等。社會主義之第一階段係人人平等獲得工作，及按照工作而獲得報酬。然後當人類的習慣已經因共同所有而改變之時，共產主義的階段就來了，於是人們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了。

誰改變這種所有關係呢？顯然不是目今的私有者；他們的利益在另一面。也不是分化的中等階級所能完成——除非他們了解：他們的未來是和工人一致的。只有一個階級能夠經過困難，展開志意，進行這長時期的變革：這就是勞働階級。它跟現代生產的大機構緊結着的，它管理生產，却被生產所奴役。共同所有是他們解放之唯一出路；當他們了解這一點的時候，他們會完成這條路的。所以他們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在他們，現代生產之社會化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能成爲人類前進至更高階段的白熱的情熱。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業在於幫助他們了解，使他們有『階級意識』知道他們的力量與功

能是社會進步的創造者。許多美國人憎階級觀念，他們恨『激越的階級意識』，其實那兒還沒有存在呢。要知馬克思的階級不是激起暴動的綽號啊！它們是科學分析的範疇。馬克思主義者說：除非人類社會墮入奴役，戰爭與毀滅的災難中，那末，人們必須具有他們的工具和他們創造的財富；工具和財富已經發展為非常複雜地社會的了，然而所有還是私人的，所以必需社會化。而且只有勞動階級纔能展開戰鬥的意志，得奪取所有並由而改造社會。工人之組織愈少，他們對於他們的力量及功能的意識就越薄弱，而人類社會的改變也就越被擱延，越是困難和無望。工人越意識到他們在歷史中的偉大事業，他們的組織越好，他們越能把中等階級集合環繞他們，那末，改變就越順利，人類就得越少受痛苦。

在許多國家中間有兩代經濟學家展開馬克思的學說。列寧在這學說之上建立了布爾雪維克黨，而於一九一七年完全實現俄羅斯的革命。布爾雪維克今日之尊敬史太林，不但因為他是一個政治家及組織者，而且是遠見的分析家及社會改變的領導者，繼承並展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科學方法。今日世界六分之一正在依照馬克思綱領而改造；這綱領是第一次有意識地計劃的典型，為人類前此從未將其應用於社會全體的。

第二章 革命底黨

「把工作的人和空談的人分辨出來」

列寧

在俄羅斯爆發第一次社會主義的革命並不是偶然的事。世界大戰使許多國家受到巨大的挫傷，世界帝國主義的鍊子在最脆弱的一環斷了。（註一）俄羅斯受戰爭的痛苦及渴望和平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還要厲害。沙皇制度，這自中世紀起昏黑的制度，被全部人民所仇恨着。革命在俄羅斯發酵已數十百年。（註二）世界大戰增加了最後的不堪忍受的壓迫，於是爆裂起來了。

在促進革命和決定革命的方式的諸因素中間，布爾希維克黨（註三）的存在是決不可少的一種。它不是在革命期間突發的創造。這是十四年來，意識地由艱苦的計劃和鬪爭所鍛鍊出來的。它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的。俄羅斯十九世紀的整個後半世紀之前進的思想家在沙皇制度壓迫之下，曾經

熱切地尋覓有效的革命道路。他們經過五十年之痛苦犧牲，英雄主義，難以相信的力量，謹慎的研究，測驗過許多方法。他們曾經試驗教育並組織農民；他們曾經嘗試對暴君的恐怖主義的行刺。他們失敗了。他們的失敗由其他諸國的歷史來校正，他們有一部分已轉到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之正確的道路去了的。

如果說馬克思是製成了一般綱領的，則展開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及戰術，建立奪取政權的組織的是列寧了。布爾雪維克主義是一種政治思想和政黨的傾向，開始於一九〇三年之後，那時俄羅

(註一) 因為俄羅斯革命發生於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希爾奎德(Hilke)把她叫做「歷史的偶然」，反之馮士(Norman Thomas)堅持：革命的發生正因為俄羅斯是這樣落後，所以他們所忍受的獨裁制不是別人所能忍耐的。

史太林說：「革命之客觀條件完全存在於帝國主義世界經濟之整個制度內，而後者是整體的」，對於革命必須首先爆發自「普羅列塔利亞已形成多數，文化更爲前進，更爲民主的」的論理，他答覆說：「不，不，不需工業的特別的發展；革命將在資本主義的鍊子最弱處爆發的，原因是普羅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的鍊子的最弱一環破裂的結果」——史太林向 Svetlov 學生的演說。

(註二) 馬克思遠在一八七七年就在致 Zorge 的信中注意此事，參看「馬克思書信集」。

(註三) 現在叫做布爾雪維克的共產黨。

斯的社會民主黨裂爲兩派，即一般知道的布爾雪維克（多數）及孟雪維克（少數）——在今日其他諸國，就是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那時舊的領袖們要『擴大』黨，招入一切的『同情份子』，使他們都可發言決定黨綱。列寧雖承認任何社會的變革有賴於廣大的多數（不但是工人而且是許多其他的『同盟』者），然而他堅持黨藉本身必須『有嚴格的規定，必須把空談的人從工作的人區別出去』（註四）

從那時起，組織和訓練革命的黨，成爲世界著名的領袖列寧的中心工作和最偉大的功績了。列寧供獻他的整個生命於研究並實踐關於政權的理論。在他看來，政權不僅是個人的機關工作，這是人類推進歷史的有組織的高揚。衝突是現代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產物，他研究怎樣駕馭這種騷動的變亂，怎樣預備並領導人們奪取政府及創造新制度，最後，怎樣組織他們戰勝自然及他們自己的命運。在列寧看來，這就是政權的科學了。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看來，勞働階級是現代社會中能夠加以組織去獲取政權及建立新制度的集羣。列寧替這階級創立了領導的『前衛』。他們必須是聰穎、有意志、勇敢的人；他們的行動必須有紀律地集中於共同的方向行動。他們必須使革命爲一生的職業，永恆地研究他們所生活的社會

中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的力量。他們必須應用這種知識於行動上。他們不但對於選舉及政治運動必須活潑地參加，而且對於罷工，工會工作，示威散發宣傳品及其他平凡或危險的活動也須活潑地參加。使勞働階級通過這些活動成爲有組織的並意識到它的力量。他們必得和工人接近，由他們那裏學習並幫助他們，引起他們的信賴，由此取得領導權。

這些領袖怎樣在被人剝削及不滿足的廣大的遊離羣中尋出來呢？假使找出了的話，怎樣把他們在有紀律的戰鬥力量中鐸合起來呢？列寧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被剝削的大衆，被資本主義的脫環擠出，因而他們對共產主義，不是希望便是失望，在這種人中間，包含着許多蠢夫，惡棍，狂人和膽小的失敗者，正如包含着有認識的和有意志的人一樣。他預見了一個艱苦鬥爭的長時期中，適於領導的人要受火力的測驗，能夠學習的人要受經驗的訓練，其他則因他們的愚蠢而淘汰了出去。列寧自己把他的大部份時間獻給建立並訓練一個不大，却經過澈底的測驗的黨的緩慢的工作。當革命到來時候能够領導革命。我曾遇見過些簡樸的工人。對於他們，列寧花費過許多時間個別的教育他們。他們現在還記得列寧四十年前所用的準確的語句。使真正的共產黨員能夠領導羣衆是一個長久而費力的過程。

沒有什麼比今日共產黨敵人所宣佈關於共產黨員兩個矛盾的觀點更無理的了。他們一般的

被當作暴亂及騷動的無計劃的激動者。一味的喜歡混亂，莫名其妙地希望有叫做共產主義的東西出現。還有更詭辯的觀點哩，甚至辛克萊也做了它的犧牲品；他在其『不能在這裏出現』一書中，描繪他們是沒有腦筋的羊。是爲着紀律起見，需要盲目遵從上級人員的命令的人。這些人，不管是那樣的人，領導一個勝利的罷工都不可能，更莫說革命了。我們知道一個因疏忽而增加危險的共產黨員是會給開除的；一個僅僅遵命令的人做起領袖來是沒有用的。共產黨員必須知道知識與勇敢的徹底的聯合；他們不但必須知道一致行動而且他們必須都明瞭爲什麼行動。

俄羅斯共產黨書記之一對我說道：『我們所建立的東西不是受動的人所能建立的。』另一個老布爾雪維克說：『我們都有堅強的覺悟；我們爲着覺悟而作戰，爲着覺悟而入獄。那時在獄中我們和我們投獄的同志們詳細爭論過去的政策，對於過去的錯誤加以研究和學習。我們常常發覺我們理論中少許幾個字的錯誤，丟掉我們在獄中的一年時光啊。』常有因不同意某一點而一部份一部份分裂開來的。列寧也不怎樣的籠絡他們，他明晰地區別出那些能够長期合作那些短期合作的同盟者，和事事反對的叛逆份子。所以黨建立在這樣的人上面，他們能把每個人的生活交給別人，常以絕對的保證互相依護，可不是盲目的屈服，却是進過了一種相互討論和敏捷接受共同決議的紀律的。

列寧夫人克魯蒲斯卡雅在一篇題爲『共產黨員應當像什麼』的文章中，舉出理想的共產黨員的榜樣。『第一，共產黨員是社會的人，有着非常堅強的社會感，渴望人人應當健康與快樂。第二，他必須懂得世界上對於他發生些什麼，——現存政制的機構，人類社會生長的歷史，財產增長及經濟發展的歷史，階級之劃分，國家形式發生的歷史。他必須認明白社會向何處發展——向着這末一個政制，在那裏，人們的快樂並不建在奴役別人的基礎上，除了堅韌的社會感之外，根本沒有強迫的存在。共產黨員必須廓清道路，有如披荆刺棘，加速理想的實現。』

『第三，共產黨員必須知道怎樣創造的地組織。例如，假使他是醫藥工人，那末，他必須知道醫藥，然後必須知道俄羅斯及其他諸國的醫藥史，再後共產黨對醫藥問題的處理，即如怎樣組織廣大的羣衆，（由勞苦階級起）創立有力的衛生機關以俾健康。他不但必須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及將來的是什麼，並且必須知道他在其中的工作應當是什麼及其對羣衆的答覆是什麼。第四，他的私生活必須受制于共產主義的利益並受其領導。無論他怎樣悔恨捨棄家庭的關係及幸福，他必須——假使需要的話——把一切撒手，走入指定的危險地方……他必須把肉體與精神供獻于共產主義及勞苦大衆。』

在共產黨中佔高位的人都有克魯蒲斯卡雅所列舉的特性。他們都懷有最深的動機；這決不是

出於一己的趨向，我們這裏得通過別人知道他們的性情。克魯蒲斯卡雅在她丈夫列寧殯葬時向親密的黨內的朋友所說的是最完全的表現：『列寧深深地愛民衆。』拉狄克告訴我們史太林在五十年生辰怎樣答覆黨向他的致賀，『在這樣一個守口如瓶的人的口中所說的話，好像發自他的本性的深處。』史太林說他準備爲着普羅列塔利亞「一滴一滴地」流血。』(註五)

凡是會用馬克思的方法來領導羣衆改變世界的人，必須清明地爲着兩個方面的不斷增長而奮鬥；日益深切地了解社會與經濟的力量及日益廣泛地參加工人們的鬥爭。一切共產黨員致力研究馬克思學理所費的時間數量或者是第一件使局外人震驚的事罷。鋼鐵廠的管理員，忙碌的公務員，在所得的威脅之下利用額外的時間——像晚間十一時及早晨七時——研究在動盪中的他們的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認爲這些事情與其他迫着做的工作有同樣的重要。

到蘇聯去的人，常有驚怪不至的，當他們發現蘇維埃農村鄉鎮的黨書記討論國際事件時所有的真確及敘述的詳細，簡直是美國都市報紙少數外事編輯所能提出的，他們處置統計及歷史比『智囊團』來遠爲容易。美國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有一次向我表示：他懷疑發表了的韋爾士的史太林訪問記的準確性。在他看來，史太林談話所提及的克諾姆威爾(Cornwall)的革命似乎太詳細了。

他說：『人們並不這樣談話。』但是蘇聯任何共產黨員不知克諾姆威爾革命及其他歷史上的革命（這是他所希望從它學習的）的本質的須加入訓練班，『提高他的意識水準。』一個共產黨員假使全美國普通的政治家一樣糊裡糊塗不知世界事件，那末，他會無情地被黨『開除，』或者由黨叫他加入全路人的團體去學習所必要知道的东西。

情感的模糊是一切資本主義的政治輿論的特點，而且正想從這贏得廣泛而不太明確的支持，但共產主義的論述恰是相反。共產黨員則非常明確的，不逃遁於公式中，絲毫不爽的分析解釋，甚至「一字一句都不拘。然而正因這種毫髮不爽，一切的科學及技術的知識纔有進步，找出準確的化學公式，產生合金，找出數學的關係增強橋拱的建築；任何生理學家或者電氣師的大會的討論充滿了這種『仔細的討論，』沒有這些也不曾有所進步了。共產黨員把馬克思主義看做這樣的科學，即在它們中間最重要的，是要求幾年，甚至數十年的關於社會力量的精密透澈的研究。這不是一次學習百世用的教條；這是思維的發展體，常常應用於新的環境，又常受新環境的影響。就從辯證法的理論而言，這些力量是在變動不居之中的。列寧，史太林，及黨內其他領袖之演說從來沒有激動誇張或眩惑，却是經過小心而精密地分析的。史太林之不會企圖用華美的誇張及光彩的措辭，而只以『人格的力量』來指揮共產黨大會，猶如愛迪生之不用感動的字句希望說服一羣美國的工程師去信賴新

公式。一個這樣的企圖不毀了史太林，便會毀了愛迪生。

但是共產黨員不但必須根據科學；他們並且必須學習和大眾一起工作。關於這事，他們遭遇了一種特殊的困難；一個曾經長時間在馬克思的範疇內思想的人會覺得向質樸的人民解釋馬克思學說，正如電氣工程師之難於向燭光世界的人解釋鍋輪的理論。這樣的事在共產黨員比較在工程師更爲嚴重；因爲工程師能夠沒有燭光時代人的幫助也能建造鍋輪，共產黨員却不能沒有人民而革命啊。可幸的是，除了文字之外，行動也可以傳達，一切共產黨員都需從事積極的工作，依此與大眾相接觸。當知識份子請求黨藉之時，通常的實踐是給予他們工廠工作，如教授俄語，公民或馬克思主義的夜班，或者實際輔導工會的工作。經過一二年這樣試驗後，依據工人們的意見看看這候補者是否適合於做黨員。

任何國家的任何共產黨在任何發展階段都認定：凡是不能和工人運動配合工作的人就不配做黨員。在蘇聯，全部非黨工人對於黨的理想早有了很好的知識的。他們之幫助黨去選擇黨員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大約二年前有二十萬工人入黨，他們實際上都經非黨工人們的推薦，他們經過二三年一再集會討論，然後推舉出來做黨員的。黨時常『清除』黨員，而且這事情由公開會議執行的，會議是由所在工廠的全體工人出席組成。工廠裏的每個共產黨員必須當衆提出報告他的生活及

活動之全部經歷，服從並回答一切批判，在工人集會上證明他適合留在『領導的黨』之內。黨員之被開除不但因其係『敵視份子，騎牆派，干犯黨紀，墮落份子，鑽營生活者，利己者，及道德敗墮的人』而且其有僅僅因為是『受動』不及學習，不及增高知識與在大眾中不及增大威信開除的。

凡經准允——這種准允是需要一個研究及試驗的時期的——入黨的人必須供獻很多時間從事無薪給的『黨的工作』，即強化黨部及組織大眾環繞黨部的各種工作。他們把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選做他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所以必須知道怎樣建立一個共同的綱領。他們參加產生黨的決議的討論，他們希望奮力的去實現這些決議，奮力但不是盲目的。他們須知為什麼作出這些決議；他們必須了解黨的路綫，能夠不用命令強制他人執行黨的路綫。他們必須有堅強的意見，能為路綫而鬥爭；但是他們須知何時作戰和何時退讓。假使他們不能學習這些，那末他們就會因為『消極』或者『反對』而被黨摒棄的。這不是容易的一課：有了許多政治家幻滅了的呀！

黨員們必須學習判斷和集體地行動——不但決定總路線而且決定他們在總路線中的工作。他們必須討論和接受同志們的判斷，看看他們自己在那裏最為有用。內戰時人們希望共產黨員做每條戰線的前衛軍。今日在蘇聯，則他們首先被派充工業農業中的困難職位。他們會被調開他們所成功的工作，而派任他們所嫉恨的工作；他們不得因而嫉恨，必得把它當做重要的工作而好好地幹

去。我曉得有一個高級公務員經過某鎮時，當地的小書記送來一電囑其離開那裏回任不同的工作。但是命令從來不是高級公務員的職份；而是決定工作分配的同志間的決議。這就是有名的黨紀；所謂『鐵』的紀律，但也是『有意識』的紀律，因為這不是基於受動的服從而係基於意識的參加和集體時選擇。有意識地參加創造歷史，便是這種紀律的報償。

共產黨員不但希望領導羣衆，而且在經常互相影響中由羣衆那裏學習。他們必須『組織無產階級；』他們必須指導『他們進行階級鬥爭。』（註六）他們必須『看勞工階級的前面，』做『有經驗的總參謀部』——這是『假使要避免某種失敗的話，』（註七）戰爭中的每個軍隊所必須有的。『但他們不自視爲特出的領袖階層，僅是他們所領導的勞働階級的密接的一部分——『前衛。』他們修改他們的綱領，暫時迎合大衆一些『落伍的要求，或者永久包括大衆發明的某些新的方式或方法。』第一件的例子有列寧應答農民分裂土地的要求，這是落後的步驟，其目的在於獲得農民的支持和『從滿足他們的慾望，進而教育他們自己。』第二件的例子就是政府的採用『蘇維埃』和農村的採用『獨立勞工組合。』這兩種形式直等到發生的時候，黨才看到。獨裁者，必須是勞働階級

（註六）蘇聯共產黨綱領。

（註七）史太林：『列寧主義』一卷八八至八九頁（莫斯科聯合出版社）。

而不是黨當一九二五年齊諾維夫爲着黨獨裁一切辯護時，史太林反對這種『狹隘的觀點』，他說大多數民衆與黨之間的信賴必須不受任何黨的特殊權利所毀滅，『因爲，第一，黨或者受人誤會，而且，就算不會受人誤會罷，大衆也得要有某些時間理會這是對的。』（註八）

三百萬共產黨員怎樣領導一萬萬七千萬的民衆呢？首先因爲他們跟這數百萬人不是相隔的，却是他們之中最富有精力的一部分，他們領導的能力一再經過別人的測驗和認識的。現在蘇聯數百萬未入黨的人在黨指導之下忠心——甚且熱心——工作，却仍不敢自己叫做共產黨員。我有一個最好的女友，她把她的生命供獻於照護無家室的兒童，有一次她對我說：『我的生命和蘇維埃政權一齊開始；只有蘇維埃政權給我機會去爲着兒童而戰鬥……在我的生活中我留心黨的成功比留心任何事情要來得厲害。』然而當她的同夥們舉她做『一個够格的共產黨員』的時候，她辭謝這榮譽，因爲她於黨綱上一二處不符合，所以不能忠實地加入。

一個五十二歲的裝修車輪的，羅森堡（Rosenberg）是我在波羅皮騰（Birobidjan）的猶太自治區遇着的，他勇敢地拆去他在烏克蘭的家庭，攜帶他的十個人的家眷到遠東做先鋒隊去。他經過難以相信的艱辛的戰鬥，建立一種製造二輪載貨馬車的集體工業；他現在是市政府的委員，對於公

共工作供獻了許多沒有新給的時間。他解釋說：『當黨決議開發皮羅波騰的時候，我知道這會是一個偉大的未來。日益展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自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假使我工作，別人也工作，那末，我們就將建設她了。只有少數的人比羅森堡表現共產主義的目的更誠心的了，然而他沒有想入黨。他說：『我知道得不夠，我正研究初級政治課程。在我看來，嚴肅的閱讀並不這樣容易的。我年紀五十二歲。』

十四年以前我在極北遇見里姆拋爾 (Rimpale)，他冒着生命危險往來芬蘭的邊界，『幫助革命。』他首先在飢荒的北極組織石礦之類；他創設工會，合作社，並爲着森林中的不識字的本地人創立夜校。就在那年夏天他爲國家出產十萬金元，而他自己呢，（時在軍事共產主義期內）僅僅獲得『分攤的番薯與食品，有脂油的肉汁及配給我的靴底罷了。』里姆拋爾對我說：『這是有用的工作呀。這兒這樣近邊界，正要對白芬蘭人宣傳，我們需要有工業，供給他們食料呀！』他早已是共產黨的候補者，希望着在幾月內准許做正式黨員。

這些例子指出共產黨員的條件是什麼。在共產主義指導之下的專力活動如詹太的裝修車輪者所提供的，是不夠的。百分之几十的義務如社會工人所貢獻的，是不夠的。里姆拋爾爲着增加社會財富而自己犧牲亦是不夠的；他必須意識地知道他的工作的政治目的。我在蘇聯十五年當中遇着

一個機會的共產黨員，他用詭計攫取官財，而且是一個頑強的官僚，愚昧的狂漢。但是我也看見黨怎樣拋出朽木——不是常常準確的——和怎樣由其所領導的勞働階級那裏更生起來。

這便是有組織的黨，它實現革命，今天，它正改造蘇聯的巨大的羣衆，不管距離什麼遠，不管有着比較落後的人口，不管有一百八十種的民族和四面八方的仇敵。由於黨員的慎選，組織的嚴密，和不斷的研究和工作，蘇聯共產黨是成功了的。

共產黨並不希望永遠的存在。『當階級消滅和無產階級獨裁消滅的時候，黨也得消滅。』（註九）黨自視她的事業是屬於人類社會一定的階段的，有其開始，有其發展，也有其結末。世界上別的政黨沒有這種樣的歷史意識，沒有這種超越的自信；其他一切政黨的生命是由選舉到選舉，根本沒有長時間的計劃。共產黨自認在歷史上有特殊的使命，堅決地希望在必要的時候，保持政權完全實現其目的。

（註九）史太林：『列寧主義』一卷第六九頁。

第三章 獨裁

「普羅列塔利亞戰勝這種政治權力，使其能夠鎮壓剝削者的一切反抗」。

俄羅斯共產黨的綱領。

「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並不以本身為終極……（這）是導至社會主義之路的手段。」

一九二〇年六月史太林向的 *Swetlana* 學生演講

大多數美國人畏避『獨裁』這字。他們說：『我不要被人獨裁。』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人要這樣。但是爲什麼他們本能地採取這字的歪曲的意義，把他們自己看做制度的收受者呢？爲什麼他們從來不想他們可以做獨裁者呢？難道這樣的觀念不通的嗎？這是因爲受了長時期關於個人獨裁的欺騙宣傳呢，還是因爲他們長期在上司剝削下掙扎生存權利，使他們覺得獨裁這字，就是指命令人的

一個不可信任的人呢？

沒有由一個人治理的國家。這種假說是爲掩蓋實際統治情形的謊言，在意大利、德國及美國，政權是存在于私有資本家生產手段的所有權之中，在蘇聯，則存在於一切工人的生產手段的所有權之中。這是在政權絕對相反的基礎上，把現在世界分爲兩種制度的真正不同處。當馬克思主義者應用『獨裁』這字之時，他不是指個人的治理或投票的方法，而是對比財產的統治和工人的治理。

美國政府的長官不是真正的治理者。自總統以下，我曾經和他們許多人談過話。他們有些人會真正歡喜爲着民衆而應用政權。他們覺得受着阻撓而不能這樣做，他們責備政府的其他部會，立法部，法庭。但是他們沒有分析過實在的理由。困難之處在於他們無權力可用。在無論何種形式組織之下，既不是總統也不是國會，也不是普通人民能夠在法律上處置洛克菲的煤油或者摩爾干（Morgan）窖內的金子。假使他們想要處理，那末，政府的其他部會將予以阻止，這就是所謂阻止『越權』的制度。私有的資本家具有生產手段，這樣就統治數百萬人的生活了。政府無論怎樣選出，其功能都限於製出規程，幫助資本主義調整財產之間的關係，保護財產，反對無產者的『非法』要求，於是資本主義就更易展開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叫做財產的獨裁。史太林說：『關於純粹民主主義的討論僅是布爾喬亞的屏障罷了，掩蔽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不可能的平等……這種發明是隱蔽資本主義的痛苦……助以道德的力量。』（註一）

政權而統治生產手段——它就統治一切。誰有誰就是獨裁者。這是十月革命時蘇聯工人所奪取的政權。他們廢棄以前人們依着私有財產生活的神聖的權利。他們代以『不做工，無飯喫』的統治原則。

新政制有什麼特點最明顯地指出它獨裁的性質呢？今列舉如下：

第一，布爾雪維克沒有等待最多數投票而獲得權力——在國會選舉中，他們在三千六百萬投票者之中恰恰獲得九百萬——僅僅依賴他們在工業工人之間驚人的大多數及附近首府城市軍隊之驚人的最多數。他們政權之維持在於精明地分析社會階級和滿足他們所依恃的人的要求。

第二，他們在工人組織的基礎上，組織他們的政府；所以他們剝奪過去過私有生活的底公民權利，並且，在開首十八年間，政府高級機關中的代表比例，工人多於農人。這是因為那時行平等選舉，由於不識字的和小有產者的多，會毀壞了社會化政策的。（註二）

（註一） 史太林：列寧主義一卷四六頁。

（註二） 通常說這種差異爲五與一之比，但並非如此。在高級機關內，工業區二萬五千選舉者選出一個代表，農業區則十二萬五千人（包括兒童在內）選出一個代表。這樣，比例就差不多是二與一了，比起現在美國許多州政府立法中農村與城市間投票數少得多。蘇聯現在隨農業區域文盲的消滅和大規模農業的建成，這種差異已廢除了。

第三，他們統制學校、報紙及一切發表的手段，一面發動對於增大或改進公衆財富的討論，鼓勵工人們廣泛的作批評，一面抑止政府認爲有加強私產權利，或者損害社會生產效率的任何表現。假如他們覺到生產的社會所有權受到了威脅的話，不論是由於怠工、營私或加強私有者權益，那他們在認爲必要時將嚴峻地抑止這種危險，其方法則依經濟情形處分流刑或槍斃。

這些便是真正的特點也是形成獨裁的根據，決不是史太林的什麼個人威權。偉大的人物在各種政府形式下領導國家人民；史太林領導的技術型式之民主，恰如美國總統的，可是比起摩爾干的統治却要千百倍地民主了。獨黨的存在並不有害於民主的自我表現，如次章所示，一黨也能够通過其方法有民主的自我表現，正如多黨一樣。但是上面的特點都是獨裁一般的特點，即它是一種不是對一切人都有利的統治。這是一切國家及歷史上一切時期的一切所有者自己感受威脅時的戰術。這是德意有產者當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的工人投票增加威脅他們的所有權時所採的戰略，在英國某些部份，不論是皇村或阿干薩斯和阿拉勃瑪，只要那裏財產受到雇農和準農奴的威脅時，也用了這些戰術。而且假使美國資本主義真正的感到它自身的崩潰時，那會更大規模地應用這些戰術的。蘇維埃歷史上沒有東西指示布爾雪維克比較任何地方的財產所有者更「獨裁」或者更殘酷。真的，他們遠不如任何「權利的獨裁」的殘酷凶暴——不論是匈牙利、芬蘭、中國、意大利或德國的

——那是建築在私有權的報復排外的，它們真正地覺到了自己的危險。

什麼是布爾雪維克建立獨裁的條件呢？他們爲什麼不等到由投票握政，然後由政府的法令或者賦稅來逐一接管大規模的財產——即他們相信必須社會化的大規模財產呢？法西斯蒂奪取政權遭遇社會主義投票的威脅的歷史開始向世界回答這問題了。布爾雪維克由於他們馬克思的歷史分析知道這裏的答案。所有階級從來沒有不經過鬥爭而放棄所有權的。把持政府機關本身不是政權。

支配生活手段的所有權的權力，是天天顯見的力量，不斷的活動，收買智囊，破壞或搗亂政府，然後加強自己反對一切「人民的意志」。任何人只要到過美國任何城市住過一會的，都可以知道資
本家怎樣利用一切已經獲得的根據，對抗一切很平常的如公共投票一類的事。以我在西雅圖所見而言，資本家爲了街車的公共所有這一很平常的事，曾用不知多少不知怎樣緊急的方法來爭奪，它在戰時對於政府所有的鐵路和目前對於鄧尼斯流域公司將如何，亦不難想知了。當他們不再能阻止某種公有利益的時候，他們就不惜破壞。他們利用舞弊或怠工以使其無效率；他們使其受制於私立銀行。他們繼續通過一切高給宣傳的手段，欺騙選舉者的意見，使其搖動，轉向到其他方面去。

列寧說過：「由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的變革是歷史的整個世代，直至變革終了爲止，剝削者必

然地有着恢復的希望。甚至一地或者一個國家的資本家已經被推翻，而他們仍然在某些時間內較推翻他們的工人們還強。」他們的力量存在於他們和外國的聯繫（國際資本家）之中，存在於他們仍然具有的金錢和動產之中，存在於他們組織與管理的能力，他們的優越教育，他們對於行政的一切秘密智識，和他們對於戰爭技術的優越之中。他們更得習慣與傳統的思想方法的力量之助，在資本主義推翻之後長時期內，這種思想方法甚至仍然存在於工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存在於大部分的中等階級的意識中。（註三）

所以，馬克思主張勞働階級爲着『歷史的整個世紀』必須維持獨裁的政權，這在一方面阻止資本主義的企圖再起，另一面則重行教育全部民衆習於社會化的生產。馬克思向工人們說：『你們將經過十五、二十年內戰及國際戰爭，不但改變外部的環境而且爲求改變你們自己並使你們自己適於運用政治權力。』（註四）

蘇聯獨裁所用的戰略，是依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各種國際關係而轉移的，起初數年之內，他們受外國干涉及內戰的影響，以後幾年他們規定並創造快速的經濟進程及提高國家的國際威信。有四

（註三） 摘引自列寧著：『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第三章。

（註四） 馬克思：『共產黨在哥龍的教訓』（一八五一年）

個主要時期可以注意：革命第一年的工人管理時期；二年半國際干涉中的戰時共產主義；由一九二一至二八年之新經濟政策；第一次五年計劃，反對資本主義之最後的進攻。

新的工人國家所繼承的國家，在經濟上是被世界大戰的創傷所破碎了的。農民奪佔地主的土地；工廠關閉，工人受餓，銀行事業因貨幣之迅速跌價而敗壞了；沒有食物軍火的兵士由前線逃回家中。『和平、土地與麵包』成了那時的一致要求。資本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布爾雪維克握得了政權。他們立即給農民土地，取消一切國債。銀行與運輸都國有化，創立對外貿易的國家專營。工業留在私人手中，但由各種工業的工人建立『工人管理』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查核帳目，研究原料的來源，維持生產，反對私有資本家關閉工廠，認關閉工廠為有害。國內貿易仍係私有，革命第二日訓令商人照常繼續做生意。然而宣佈一個政策，逐漸把工廠合併為大規模的托拉斯，然後轉為國有化，並且經過合作社逐漸把國內貿易社會主義化。

工人政府不是為利益，却是為着人類的幸福，願望在破毀的國家上儘少周折與破壞，重建經濟生活，這種政策把包括工農人口的極大多數，聯合環繞政府。地主，資本家及高級工程師，文官及專門人材，提出了許多反對。但是，假使這些人用暴力及怠工來反對新政策，那末，最大多數的人民組成的政府機關就會把他們鎮壓起來的。

列寧在這時期內在財產獨裁與工人獨裁的對比之中，給了獨裁一個生動的實例。『國家強迫把家庭由它所逐出來。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再做過這事，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也得如此做。……資本主義的國家奪去了工人家庭，這些家庭已沒有了家主，也無力付租的了。』列寧於描敘一批反對窮人的警察的強橫之後，繼續描繪工人國家中怎樣沒收富人財富。

『我們工人義勇隊的分隊由十五個人組成，這十五個人，我們可以分開來說：兩個水兵，兩個兵士，兩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其中我們假定只有一個是黨員或者全路人），一個知識份子，八個勞苦的窮人；至少有五個必須是婦女，家庭僕役，不熟練的工人，諸如此類。他們到有錢的家裏去看，他們看到五間房子只有二男二女住在那裏，然而『公民們，今年冬天你們只得住二間，還有的要給兩家住在地窖裏的住了。我們等着，等到工程師來幫我們忙，（我想你是工程師嗎？）造起良好的工人住宅，那時你們還有不便當，那每十家有個電話。這樣可省許了跑路時間了。我們分隊裏的學生公民，則將報告關於這個國家秩序的種種情形，你們將非常誠懇的給我們簽了字的宣言，你們將非常忠誠地遵守執行。』這就是人民大眾支配財產的獨裁的最生動的實例。

在外國干涉及內戰之壓迫下，『工人管理』的有限度的國家化轉入『戰時共產主義』時期

了。侵略的軍隊把蘇俄和主要食料及燃料產地相隔絕了二年半。烏克蘭的穀倉，土耳其斯坦的棉，唐納茲的煤，巴庫的煤油，烏拉爾的鑛，都在敵人手中。獨裁制採取『軍事共產主義』這是被圍地方的戰略。這戰略征收一切的穀物及生活必需品，在政府直接統制之下攤分；奪取一切工廠，應用損壞的機器的零件去修補其他損壞較少的機件。農民因為收穫被征發，故多數對於這個政策感到生疏。這是用盡最後一兩的原料及最後剩留的螺釘之有效的設計，這期間工業的衰壞比較任何現代工業所曾被破壞的更厲害。但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使早已精疲力竭的國家——對抗了世界敵二年半以上的進攻。

蘇維埃政權繼續存着。列寧隨國內的得到和平，立即進行新經濟政策，這種企圖是儘速『由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方的發展。』（註六）建立國家的經濟生活。穀物征收代以有限制的賦稅，准許自由貿易。允許私有的資本家加入貿易與工業兩方面，而國家則保有土地，重工業，運輸，及對外貿易之『指揮的權力』。這政策恢復農民，小企業家及專門階級對國家的信任；但因為社會主義獲得一些勝利，有的則望增大私人的財富了，所以這信任也是不可靠的。資本主義諸國則幸災樂禍地確信：俄羅斯回到原有的制度了。但是由共產黨員領導的蘇維埃工人，在假日也供獻時間集體地工作：修理

工廠製造街車與新設備，當作贈給國家的禮物。在『戰時共產主義』期內，他們工作的報酬只是分配得的糧食；他們現在的工作，則有着確實而不斷增加的工資了，那時犧牲自己建立原始的社會主義積蓄，而這種積蓄是最後攻擊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一九二一年出產戰前標準五分之一的工業，於一九二八年增至五倍，回到『常態』。

一九二八年的俄羅斯只是一半社會主義。多數工業已是社會所有，但是農業尙在地主的手中；大的地主即小資本家，不但掙扎着殘存而且還增長。階級衝突在這些暴發的農業資本家及被剝削的貧農之間繼續着。年青人離開農田，擁入城市，失業着。共產黨的討論集中於一國——尤其是落後的農業國——建立社會主義是否可能。隨史太林的分析，黨決定這是可能的，急速地創立現代的重工業，同時工業化農業。蘇聯便致力於現在叫做五年計劃之有名的鬥爭，這計劃產生世界上大規模的工業與最大規模的農業，這兩者都是社會化了的。

這是一次凶惡的鬥爭，打擊上層農民和一部份中間階級。在工業方面高級工程師幹部中間，流行過一種怠工風潮，這些人意識地或非意識地想望着特權和財富。罐頭工業方面的高級人員把碎玻璃片，獸毛及魚尾放在工人的食品中。一個城市的獸醫因為恨集體化，他把瘟疫傳給了六千匹馬。另有一個灌溉工程師因為企圖破壞黃種牧民農墾政策的實現，他用了古老的測量法，他知道這樣

可以使他們無從引水。這種事情和其他還有的種種，都是那些以後悔過的人自認的。獨裁制向落後者作戰，鎗斃最嚴重的犯罪者，其餘則投獄及放逐，忠誠的工人們及工程師們的力量把五年計劃完全實現了。對於戰勝許多早先的怠工者之成功，使史太林得於一九三一年宣佈：智識份子轉向了蘇維埃政府，我們應當採取共同工作的政策，來歡迎他們。（註七）

那時，最嚴厲最令人注意的處置，可說是幾萬富農的流刑。其中包括依商業放債，剝削小磨坊，打穀夫和雇工爲生的各種富農，從歐俄或烏克蘭的農莊一直流放到西伯利亞或北極森林去。蘇聯國外普通的臆測以爲放逐是通過了神祕的萬能的格柏島的專橫行爲的。那個機關，果然組織和管理流刑和流刑終止地方，如勞働營或新地方的種種事務，但是那些『用暴力阻撓我們農業』的富農的名單則由貧農雇農的鄉村會議決定；後者應用政府的信用借款借用機器，組織集體農場，情緒狂熱雖効率不大。我所親自參加的幾次集會之嚴肅的司法性，真有如美國法庭的審判。那些『上等家庭』出來的人，一個一個走到審判者的面前，他們有的霸佔良田，有的持有生產器具剝削勞工，正如歷史上這些上等家庭所認爲理應的那樣。還有的反對集體農場的發展——這有向他們要交出良田的權利——甚至放火，殺害牲畜和謀殺都幹。顯然，情勢是有發泄私人怨恨的機會的；顯然，也有來

自城市的煽動者也不以富農的『權利』爲意。貧農及雇農的集會依次討論各案，詰詢富農，允許他們大部份存在，只要求政府放逐一些『搗亂份子』。

這衝突是無情的，嚴酷的，不是不流血的，但也不是俄羅斯所特有。我又記起一九三三年加利福尼亞聖傑金(San Joaquin)村棉田工人的罷工了。加利福尼亞的地方當局驅散干擾棉場耕作的人；而蘇維埃的諸當局則放逐干擾窮人的集體農業的富農。兩種場合，中央政府各自派遣委員前往防備最惡劣的禍端。但是在加尼福利亞，能憑藉政府支持的『資產』是富裕的場主所有的；在蘇聯呢？資產是窮人的集體資產啊。

在蘇聯經過十八年這種種的奮鬥，馬克思主義者的假定對了的——一個階級緊緊握着。產業工人堅強地支持和爲他們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戰鬥。他們所有的就是獨裁，廢有權，和統治權。在共產主義分析的指導之下，他們和別部分的人民聯盟，和大多數的人民聯盟，推翻大地主和資本家，再後與貧農一起推翻富農。中等階級在革命的堅定性上不斷的動搖，而工人們則澈底握住了的。

今天，獨裁的主要鬥爭在於反對腐化和官僚主義。換句話說，工人們和他們自己的政府奮鬥，不是推翻它而是改進它，消滅工作的無效率。這事的生動例子，我們有：真理報所發表的三個鐵路工人的信。他們敘述他們車站的工人們聽到認西茲倫(Sizran)車站爲模範車站的消息之後，怎樣選派

三個代表前往研究。『選舉的結果降在我們身上。然而，我們真悔恨，我們斷定西茲倫車站不是模範車站。』爲了保全修理廠的名聲起見，虛構簿記，迫令工程師們把一再修理的東西當作新的東西登記；這信暴露了這些簿記及其他隱藏無效率的虛造的項目。他們注意對於那些因公鬧而被降級的僱工。他們對西茲倫車站做了澈底而在技術上非常正確的工作，這是別條鐵路的車站，他們爲到那兒學習好方法而去了的。我們假想愛利車站的工人會注意研究，分析和改良本薛文尼亞的車站吧！我們想一下他們的迅速接納人家路線的成績！我們再想一下，這是都市新聞的常例，鐵路監督工作報告的不正確常被審查譴責的呀！

這是蘇聯今日的常事。全國報紙每日刊出許多像這樣的信。有些是譏諷的，有些是統計的，有些是輕蔑的。但是各信均表明：他們知道自己是所有者，通過所有權，他們是居住着地方的獨裁者。

第四章 民主主義之增長

「蘇維埃政權的民主是百萬倍於最民主的布爾喬亞共和國的民主的」。

列寧。

蘇聯一步一步的向着完全的民主主義挺進，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存在過的。因為民主主義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靜止的。它底型式，範圍，和深度，有着各種樣的不同。民主主義可以增漲，和減縮，而在蘇聯則增長了的。

在蘇聯，政府的功能是什麼呢？人民參加的限度怎樣呢？這些功能能夠控制他們的生活多大呢？這裏追隨的理想根據在那裏呢？表現了什麼開創和創造的能力呢？誰提高了地位，用了些什麼方法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選舉的形式上的事實，當然這決非蘇聯公民參加政府的全部。蘇聯今日所

有的投票人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爲多。不僅此，他們出來選舉的百分率比任何國家的都要大，他們慎重的選舉，決定許多複雜的問題。

十八歲以上的『勞工』都可選舉與被選舉；這字包括學生，主婦，已經超過工作年齡的老年人，如一般熟知的工人在內一樣。這樣，投票較之其他地方更普及到年青的人了，不像許多國家把暫居的，公養的人，遷移的工人，兵士，水兵剝奪資格，而且非公民的人只要在蘇維埃的工業中工作，也可以投票。根本沒有性，信仰或種族的限制，即文盲也不限制。唯一重要的限制是對付『剝削份子』的，但因私有營業急激降低，一九三四年的選舉把剝奪公民權的人數減至全人口千分之二五了；那麼，一九三七年也許就可以全體投票了。一九三四年的選舉，九千一百萬人賦有選舉權，其中七千七百萬入或者百分之八五實際參加，這個數目是兩倍于多數國家內的比例的。

我們看一下蘇維埃選舉的影片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莫斯科各街道擁擠了投票隊伍，繼續了好幾天。公共汽車也加了特班，插了旗子，充滿愉快的樣子，載着人們去開會。男的，女的，齊集在街旁，形成了行列，都愉快地喋喋不休，手拿着旗幟走向他們選舉集會的大廈去。

全國一月以上選舉，遠及遼遠的工廠與村落。蘇維埃選舉不是在一天之內舉行的，却是由各地的便利決定，可在全聯大會開會前數星期的期內舉行。各地選擇日期使交卸的政府得完成工作，使

接代的政府有時間預備全聯大會的詰問。這些候選者和詰問都是經過許多次討論的。至於對選舉的態度，則與其說表現于討論，不若在於行動。數十萬農民正加入集體農場，『打破過去，作爲集體農民來加入選舉。』工廠工人努力製造着機關車，渦輪機，創造物的新模型，他們都被派出席大會。而且真的，這麼多的出席者都受命得作報告的。

在西比利亞叢林山中的黑種的 O'Hop 人自負地宣稱：『我們已經廢棄艸舍的遊蕩生活了；我們已把我們識字的比率由百分之六升至百分之八十九了。我們是以受過教育的農民來參加選舉的；我們住在自己的地方。』土耳其共和國的情形，正跟這相競爭着：『在八年之內，過去被壓迫的婦女，參加選舉的比例，已從百分之二、五，升到百分之七十五了。』有歷史的基輔城誇示着：『我們選出代表的一半是女的。我們在婦女被選至機關服務的比例中，領導着蘇聯，這意義就是我們領導了世界。』但是他們的誇示被蒂阜 (Tivat) 現改名爲加里寧的趕上了，那裏也有那麼一樣的多。

少年先鋒隊唱着歌曲督促他們的前輩：

我們可以建築得更堅穩，

以萬分的信心向勝利前進，

我們向我們蘇維埃擇選堅定，百勝的戰士，
精勁的，優秀中的優秀。

在南部卡沙克的草原上，一個黃種的老牧人垂危的時候，向他的兒子發最後的信說：『我全生在勞苦和飢餓的黑暗之中。但是我活着看見新日子了。我的兒啊，小心蘇維埃的政權；這是我們的政權，我們的快樂啊。』他的兒子曾經是鄉村蘇維埃的主席，現在當選為全聯大會的代表了。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那在北冰洋沿岸，那時規定的選舉日期，正在青魚秋汛後不多天，漁夫出去的很多沒有回來，有些選舉委員不耐等，開始了選舉，以致大多數選民沒有參加，結果受到真理報，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嚴厲指斥。『這是大大地破壞了蘇維埃民主主義啊！當工人們不能到時，委員們有什麼權力舉行選舉呢？我們要特別指明：許多漁夫對於他們的責任，非常清楚的。許多船夫也舉行他們自己的集會，選派代表帶着訓令登岸的。但是他們決不甘受這種不合法的處置的。有些委員找到了正當的途徑，他們在船上舉行正式的選舉會，這樣就把良好的熱心的捉魚工作和集體決定怎樣捉魚相聯合了。』

這一切千百萬人民所共同執行和提出的事情，都充分地表明蘇維埃選舉的本質。這是共同所

有者的一種活動，決定怎樣生產。怎樣建立進步的優裕生活。公務人員的公事不是實施成規，却是設計適合投票者選舉的方法。他們稱揚一九三四年的選舉，稱爲他們『前此未有的最熱烈的選舉。』他們看重人民參加政府的日益增加，這是打擊官僚主義和增進國家事業效率的堡壘。

政府之基本單位是勞働機關，工廠或辦公處；在農區中則爲鄉村。選派代表入地方政府，鄉村或城市蘇維埃。（註一）代表的基礎和地方蘇維埃的大小視其團體之大小而定。我曾訪問過牯林（Gulin）村的選舉，這村每四十個投票人有一個代表，村蘇維埃有委員十三人。莫斯科城每一千五百個投票人選代表一人，市蘇維埃委員二千人以上。這些地方代表在選舉之後立即組成新政府。他們自己分成各種部會，由牯林村的五部——農業、畜牧、文化、道路與財政——至廿八部，每部的代表在四十人以上，莫斯科市的行政就通過這些部會進行了。地方政府除了一般知道的職權之外，還有管理當地的工業，在大城市如莫斯科那樣的地方，包括許多市有的工廠、街車、地道、電燈、自來水與住宅等等。它們由公有財產收取稅賦，但是它們的預算也得由稅收及政府公債增加。有些城市有確實的稅收，——就因爲它們實收了一切房租；別的地方則需高級政府的幫助。

中央政府（註二）的全部機構建立在地方政府之上。地方蘇維埃向蘇維埃大會選舉代表；城市

（註一）「蘇維埃」這字意即「會議」。城市蘇維埃即城市會議。

大會向省選舉，這樣一直選到該國最高機關的全聯蘇維埃大會。每個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及各部的會長，高級政府則為輕重工業、財政、健康等等人民委員。地方各部在橫的方面與在縱的方面受地方政府及高級政府的相應部會的管轄。這樣，城市衛生部對城市執委會及省衛生部負責。如果法令衝突，如果某地方蘇維埃把醫院作為一些其他的用處，那末，地方衛生部就得向省衛生部控訴，省衛生部則為公共健康利益計，通過省政府施壓力於地方政府。

蘇聯這種錯綜而又統一的政府制度，其中大部分工作都是無給的。被選為鄉村或全聯大會的代表，都不領公家的薪水的，他們由派送他們的會所及工廠領受平常的薪水，他們繼續原派處所的工作，但因政府的需要而能『由生產解放出來』的當作另論；這隨他們工作的重要而異。所以公民與公務人員之間根本沒有牢不可破的界線的存在。代表是工廠集體生活與國家更大範圍集體生活之間的環節。任何日子，任何工人可以很簡便地走到他們工作場所詢問關於代表對投票者指示的執行程度。代表們任何時候僅須經過工廠集會就可以召回他們。

假使投票人這樣經常要求他們的代表們，那末，代表也同樣有權要求投票人幫助實現他們贊

(註二) 蘇聯正在準備一種新憲法，這新憲法在條款的細目上有許多變動，但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國政府和中央機關之統一的緊密關係，在原則上並不變化。

成的選舉綱領。代表不是代替人民，不是統治者，他只是負責在自治政府他們自己的事業中組織他們。數百萬公民活躍地參加政府各部——住宅人民委員會，學校人民委員會，稅收人民委員會，勞動檢查等等。那些忠誠辦理公共事務的，得連選負責更重要更長期的工作。如果對於某方面如健康、法庭、住宅有專長的人，可以資送研究數月或數年，將來在這些部分成爲終身的內政服務人員。

這樣，蘇聯的民主主義之發展直接依存於公民對於參加政府工作的興趣之大小。政府之爲公民生活各方面的直接組織是這樣清楚，所以這種興趣一部份也正以這事實確保了的。當選舉時候，有數百萬件事情，都由公民予以直接提出指示。他們囑咐增加校舍或有聲電影，改良麵包質料，增加零售店，大城市夜晚運輸貨物；他們要求把住宅托拉斯析爲小合作社，或者學校增加較少的專門的教育等等。這種種是莫斯科投票人最近向市政府發出的四百八千件指示之一部分，這政府在三個月之內報告完成了數百件要求並安排完成一切。在指示之間如有衝突，像有些公民要把有氣味的工業製造廠由他們鄰近移開，而別的公民要它留在那兒的時候，就組成委員會，不僅企圖滿足多數，且差不多儘可能地滿足每個人，不是經過舉手反對，却是經過各方調整一切的提示。資本主義的私產所有權當表現衝突時，把公民參加政府限制於贊成和拒絕的一般政策表現了衝突，社會主義的所有權，由數百萬人民共同的要求出發，促使政府政策直接地自然地展開。而這些人民對於改進國

家幸福都有興趣的。

對於公民參加的範圍及力量，共產黨在工廠、鄉村、城市之間有意識地鼓起廣泛的競爭，這是激起公民對於政府的興趣。一個工廠要是工人沒有百分之九五參加選舉，就蒙缺乏公民意識之恥。候選人從不作演說或作什麼選舉諾言；有人會認這事太無理罷。但是代表們以前的工作已經明白，早提出廣泛有用的諾言，所以投票人也正以選舉這些人爲榮的。他們選舉同夥，不是外間的政客。學生選舉學生，汽車工人選舉汽車工人，『莫斯科大歌劇團』選舉一個著名的歌唱者。代表們之未來的事業是擴展他們早所稔知的工作規模。歌劇團的歌者將組織『莫斯科大歌劇團』與鄉村間之聯絡，派遣藝術家幫助農村歌唱班。一個排印二百萬訂報人郵寄的名單的『農民報』印刷工人，他被選參加莫斯科市蘇維埃，就負有幫助機械化全城報紙的使命。譬如有一個編織工人，她幫助組織一個優良的日間託兒所，她就得被她的同夥選出幫助改進全城的日間託兒所，並且選舉她担任地方政府的衛生部的工作。

蘇維埃民主主義的運用是這樣密切，能耐與有機的，真使熟識於資本主義的政治觀察家難以承認這是政府。那裏是辯論呢？誰決定一般的政治呢？人民能够趕掉上層公務員麼？他們能够趕掉史太林麼？共產黨麼？把這些終極的問題向蘇維埃的投票人詢問的時候，他們很巧妙的回答：『我們爲

什麼應當要如此呢？』問話的以爲他已經被塞住吧但是一切選舉總先認定一個現存的經濟制度這不是投票有權改變的。美國的投票者不能改變洛克菲（Rockefeller）爲着私人利益而管理煤油公司的方法。同樣，沒有一種蘇維埃的選舉提出把公共財產轉回到私人手中的問題；這事已由革命解決了，並形成整個政府之下的基礎。

除去那個問題之外，蘇維埃的投票者沒有什麼不能改變的了。他們每次選舉實際上更換數千公務員，而且隨他們對於國家各重要問題認識的增進，民主主義的方式被擴大了，包括對於最高公務員的控制。史太林的首要位置不是在政府中，只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假使他的政策和行動會使人民不信任他，那末，共產黨一定把他撤職的。他現在是這個國家中最最得民心的人。完全把共產黨趕掉的話，就等於趕掉一切工廠，農場，學校與事業中的種種領導與組織的份子；顯然這只有企圖搗毀一切的暴動才要這樣辦。但是公民的工作正在經常變更黨員資格；任何黨員假使被他的非黨員的同伴抗議，譬如因他太獨斷，對於工作太粗率，或者只因爲不適於做領袖等等，（註三）那末，他得被『開除』的。

我所參予的幾處選舉具體地指明：蘇維埃的民主主義怎樣運用。牯林村因爲沒有足容全體選

舉的大集會所，所以選舉會議同時在四個不同的茅舍內舉行。一個集會把黨的候補者鮑利沙夫（Borisov）趕掉了，因為他們覺得他忽視他們的指示啊；他們選舉一個非黨員的婦女，因為她對於改進該村表現了能力，並且因為發現黨所忽略的良好的公有木料，曾經受過選舉委員（是一個黨員）的獎讚。原望枯林的中央集會有二三五投票者；二二七人出席，在門口按冊對名。那裏，接着每個候補者個人的討論。米海洛夫（Mihaliev）『在道路上做了非常優良的工作。』孟希那展開了非常熱心，她是一個婦女，她『奮力做着指定給她的各事；校對農田資產，測驗種子，收集國有借款。』『母親顧問會』會長的沙爾柯伐（Sharkova）博士受着婦女們的推動：『我們需要一位衛生專家去把我們村裏整潔起來。』接替的蘇維埃受命『在兩年之內把每英畝的收穫增加卅擔，組織馬耕農田，設法每個家宅裝置電氣和無線電，組織成人教育課程，足球與滑擻隊，滿足其他多種需要。』

在『莫斯科建築學院』中，男女一千五百人正在訓練成爲建築家，他們每一班入舉行三次關於選舉的會議，首先討論交代的政府的缺點，其次及於對於新政府的提示，最後則討論候補者。該學生等所提出的一千四百件提議，包括更多更好的打圖樣的鉛筆，繪畫夜校，學生參觀新建築物旅行費的增加，增加外國建築物的展覽，種植果子樹使莫斯科美化，藝術家負責設計國產織品，指派城區建築師做農田新建築物的顧問等等。同樣，『農民報』的一千五百投票人的一千五百件提議，由委

員會小心研究在專爲投票人而發行的報上刊佈授權他們的代表要他們負責完成。這些建設包括：各學校學生之適宜的課本，增加兒童劇院的數目，加強反對暴漢的鬭爭，停止蘇契夫斯靈街上面對『二十二校』的火酒拍賣等等。

這樣被通過的建議，成爲接替政府的綱領，他們把它用作武器，向地方或中央當局提出要求。有許多要求，可以由選舉者和代表們的幫助實現，但另有許多則需中央的協助。我們知道當全聯大會開會的時候，有多少鄉村曾向它要求飛機場，有聲電影，教科書和電氣化。這些要求，在經濟學家和工程師的協作之下，在其公民所選定的方向上，形成國家生活將來發展的內容，不過公民希望由他們自己的工作來完成。假使村民要求七教室學校或者農村飛機降落場，那末，他們希望代表們調查可能的場所，提出意見，由中央當局獲得所需的機械；但是他們自己希望載運木料，或者假使由別人載運木料，那末，他們就按值給付工資。

蘇維埃生活中的民主主義不限於政府。工會組織工人許多方面的生活；集體農場及合作社替農民組織生產與分配。他們的組織和政府機關分離的；也是民主地管理的。在過去兩年中，民主主義有了如下的展開，第一，民主的更加澈底，第二，在上述二種方向下的更進的非中央化。社會保險在一九三六年對於醫院，日間託兒所，病人的庖廚，病人的利益，老年卹金，諸如此類共有八十萬萬盧布；社

會保險行政在兩年以前由工會接管，也是工廠及工人食品商店的監察所。同樣，集體農場的組織，包括聯合管理的田場及農民會員個人工作的計劃之間的關係，今日在農民自己的手中，由全體會議（出席人數至少三分之二）決定。這樣，民主主義更加無孔不入，中介的機體減少，政府的各種功能由那些更直接關切的人掌握了。

社會化在農田方面的擴展及全部選民智識的增長促進了第三種擴展即民主主義的擴展。全國各地數千民衆的集體活動起艸着新憲法。經濟學家與歷史家正在研究各國的憲法，並詳細考量民主的技術；在憲法最後形成之前，他們的報告將在全國每個工廠與農場再作討論。而且，我們大家知道這憲法將包括一切公民代表的平等，直接選舉和祕密投票等，代替前此工農間的不平等，並望廢除一切剝奪公民權利的階級，因爲在一九三七年，社會所有權將是普遍的，一切公民將屬於一個勞働者所有者的階級。

『永遠的謹慎是自由的代價，』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主義曾經這樣宣說過，這是小資產階級保衛他們權利之所依據的。然社會主義要求的不止於此。人力的永遠合作，才是社會主義和那種徹底民主主義的代價，它運用人們共有的生產手段擴張生活各方面。它是最後的階段，正是目前蘇維埃民主所爭取所展開的。

第五章 民族的聯合

『凡是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

列寧。

『蘇維埃政權的開發卡沙克，有如雨之於沙漠』。

卡沙克農民致農民報的信。

在莫斯科開的全聯蘇聯埃大會，真是一個活潑的，雜色的會議。那裏有從舊卡撒(Kazan)來的扁面的韃靼人，從亞細亞中部山中和肥沃的山谿裏來的烏茲伯克和泰芹克黃種人(Tajik)，從亞拉斯加附近遠北來的斜眼的通古茲人(Tunguz)和來自高加索的數十種人民一起，共同通過治理這許多人民的法律。這些人民中間有許多黑種的，以前被俄羅斯人剝削，但是現在在蘇維埃之下是平等的公民了。這有如華盛頓的國會，有着廿個南部的黑人，六個來自亞利曹拉(Arizona)和加尼福尼亞的墨西哥農民，印第安殘存諸種族的代表，愛斯基摩人，夏威夷人，來自撲托·里柯(Porto

(23) 的印第安人，一個來自巴拿馬的混血種，和在法律上同等的，來自德第羅的汽車工人，由壁流域來的鋼鐵工人，和來自美國最西的農民。大不列顛的統治會議，情形也可以如此，假如有一個同樣組織的會議，那一定可有許多從阿非利加和印度來的黑種人。

沙俄出名是『民族之牢獄』。帝國主義者壓迫種族和民族，沒有比她還更野蠻的歷史了。高加索傲慢的山民民族，一個一個被戰勝的俄羅斯人趕到黑海去。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在橫渡黑海至土耳其的奔逃中被殺死了幾萬。北冰洋大平原和原始人的諸種族，俄羅斯用了帝國主義慣用的方法，拿伏特加來削弱他們的體力，用宗教來克服他們的精神，這樣可以更多地劫奪他們的皮毛和土地。甚至比掠奪還要兇惡的，是以戰勝者的『優越』侮辱人們。一個來自北冰洋的通古茲的憤閃眼的婦人說：『他們哄騙我們，隨後又嫌惡我們了。呢，但壞的是在過去，我一生恨俄羅斯人。』

落入蘇維埃政權去組織的國家沸騰着民族怨恨，被數世紀的壓迫所激起和培養的怨恨。沙皇帝國主義同一切的帝國主義一樣，不但直接地壓迫，而且使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土耳其人屠殺亞米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屠殺土耳其人，烏克蘭的農民由俄羅斯的憲兵鼓動去暗殺猶太人。『民族問題』使奧國和巴爾幹幾代成了歐洲的火藥庫，增加現代世界大衝突的嚴重性。而蘇維埃政府正在十二分緊張的情勢中遭遇了這問題了的。

共產黨關於民族的政策數十年以來應用馬克思對於民族歷史的分析展開着史太林一個喬其亞人，一個自負的民族的一份子，是一個最能幹的理論家。他底所屬的民族，幾世紀來被她的強鄰高加索屠殺着，它們倆民族不斷的僅因民族仇恨而發生戰爭。我們知道史太林在大戰前幾年，展開了關於『民族』的正確的意義，『民族是一個歷史地展開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表現於社會文化中的心理構造的恆久的結合。』(註一)他爲這概念辯護，反對那些把民族當做『種族』的人，反對現在法西斯蒂的先驅。資本主義既聯合諸民族又驅迫它們分離。資本主義用鐵道，輪船，迅速的郵政，報紙來結合地球上的人民。資本主義創立一切民族聯合的物質基礎，但是其擴張的方法却又殘酷地打消這希望。資本主義的掠奪與合併推進到世界上落後的地方去。『文明』的人民擄掠『不文明』的人，最後他們本身之間爲着掠奪權利而戰爭。帝國主義既堅強地增長地球上之經濟的統一而又堅強地增長撕裂這統一的民族的仇恨。

大戰前諸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基于這種分析採取的民族政策，根本否認民族間的強迫，承認每種人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並謂人民長期的統一只有自發的協商纔能完成，也只有經過推翻帝國主義纔有可能。當一九一七年五月俄羅斯克倫斯基政府拒絕芬蘭要求脫退時，這個原則經過

了第一次的實際測驗。列寧在五月十二日社會民主黨會議席上宣佈：『我們向俄羅斯的人民說：不要胡亂地強奪芬蘭；凡是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史太林表現這信仰：『現在推翻沙皇制度之後，十分之九的人民將不切望脫退了，』但是那些願望脫退的人自然必須允其脫退，至於決定留存的人民，當爲之建立一個區域經濟的制度。

當十月革命布爾雪維克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們立即向芬蘭重申歸給一切權利，由波斯北部撤退俄羅斯的軍隊，放棄在蒙古與中國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者的要求。沙俄的崩潰使世界上帝國主義列強有機會混水捉魚。英法德用錢收買各地邊境的民族。但仍然是布爾雪維克而不是那些帝國主義陰謀家們，承認拉特維亞，愛索尼亞，立陶宛成立國家。然而蘇維埃不但承認諸民族；他們而且承認工農反抗的權利。烏克蘭的工農推翻了烏克蘭資產階級拉達（Rada），土耳其斯坦的貧農推倒他們的所謂自治政府；喬治亞，亞米尼亞及烏茲培克的『民族會議』由外國的金錢支持而不是由他們自己羣衆支持了的。這些國家的工農的反抗是由布爾雪維克幫助的，當作十月革命之一部分。工農新起的諸政府受了軍事與經濟的幫助，成了今天的社會主義「聯邦」。

這聯邦起初的組織是鬆弛的。各區自主權表現在種種隨意的形式中。這種地方政府有些保有他們自己的外交部；有的發行他們自己的貨幣。每個民族獲得所屬工農所要求的自由。共產黨員

以相互間的經濟利益把這些人民逐漸結合在一起，這樣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即他們悲苦的來源消滅了。這其間，他們廢除『殖民者』的一切特權，修鋪這條真正民族結合的大路。這些『殖民者』即俄羅斯與哥薩克的小集團，它們由沙皇那裏得到特殊的土地和特權，轉而替沙皇鎮壓他們的鄰人。共產黨員還推進下列的政策：本地人民建立本地政府，建立本地語言的學校，法庭，行政機關，尤其是把以前不識字和被壓迫的本地人迅速訓練成爲他們人民之未來的教員與領導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們看見這政策的成果了：當烏茲柏克、亞美尼亞及喬治亞（以後和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聯合）創立時候，各蘇維埃共和國都加入聯邦，相反的，這時候，戰後歐洲各國却在增大地分成敵對的營壘。這樣組成了蘇維埃聯邦，一個民族的大聯合。國家正式的名號也把『俄羅斯』的名稱取消，而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註二）了，俄羅斯不過是聯邦的一邦而已。聯邦一萬七千萬人之中差不多一半屬於俄羅斯之外的民族。這些人民的數目不一其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戶口調查指出有一百八十二種不同的國民和一百四十九種語言。人民有種族和

（註二） 加盟共和國共有七個，即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烏茲柏克，土克門，土庫克。這些

共和國有許多本身包含幾個很小的自治共和國，尤以最大的俄羅斯爲甚。代表出席聯民族會議的民族有四十二個。

顏色的差異，他們包括由北方看守馴鹿的愛斯基摩人以至南部沙漠牧羊的卡沙克人，由栽種亞麻的白俄羅斯人至中央亞細亞的棉花生產者。

資本主義的民族政策與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之間的對照，可在新聯邦憲法的序言內找出最好的說明：『這裏，在資本主義的營壘中，我們有民族的敵對和不平等，殖民的奴隸制度及忠國主義，民族的壓迫和暗殺帝國主義的殘酷與戰爭。

『這裏，在社會主義的營陣中，我們有相互的信賴與和平，民族的解放與平等，人民和平的共存與兄弟似的共同工作。

『帝國主義的世界，數十年以來企圖由聯合人民的自由發展，却伴着人剝削人的制度來解決民族問題已經證明沒有成果了；布爾喬亞證明了自身絕對不能使全世界人民共同工作。

『只有在蘇維埃的營陣內……已經證明可能廢除民族壓迫的根源，創造相互信賴的空氣，放下人民兄弟似的共同工作的基礎。』

作為更緊密結合的理由，這序言提及了這戰後衰壞地方的經濟上的需要，在敵人環攻之中在外交和軍事上應有聯合政策的需要，它認『蘇維埃政府的機構，在其階級性質上是國際的，促使所有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聯合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家庭。』序言結論保證了一切人民的平等狀態，

每個共和國應有的權利及准許『一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無論現存或者此後興起）加入的權利。』

布爾雪維克不以形式的聯合爲滿足，依人口爲基礎選舉的中央大會使俄羅斯民族處於支配的地位，但有『民族會議』作爲輔導。這會議是國家兩個立法與行政機關之一；沒有它，就不能通過包含民族權利的立法。除了這種平等的立法之外，還有幫助比較落後的民族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只有經濟文化的發展纔能使比較落後的民族在實際上和比較發展的民族互相平等。新工業中心建立了，現代農業與灌溉的方法引用了，農民與手工業合作社組織了。鼓勵每個民族共和國十足發展文化，『民族其形式，社會主義其內容。』

蘇維埃遠東新興的猶太自治國皮羅比亞(Birobidjan)的一個猶太人巧妙地對我解釋『民族其形式，社會主義其內容。』這句話。他說我們是分別了國家主義和民族的。假使我們宣稱猶太人是選民，是世界上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那就是國家主義了。這是危險的無意識，是一種帶有戰爭意味的無意識，這可使土耳其人攻擊亞米尼亞，或者白種美國人對黑人濫用苛刑。要說一種文化有支配另一種文化，或者甚至超越另一種文化的權利——等於資本主義希望剝削，結果會引起戰爭的。我們沒有剝削或者要求優先的權利；但是我們同別人一樣有權發展我們自己和平的特殊文

化。各種民族文化之自由發展增加世界文化的質量的。我們關於這問題的政策是尊重人類個性，而個性又與個人主義有別，我們不尊重那些拖轉歷史的個人；但是對於那些幫助推進歷史的人如工人，作者，一切生產份子，都必須幫助其十足表現。蘇聯甚至尊重最小的民族的文化，因為它們每一種文化都能擴展一切人類文化，而它們自己都是統一的。我們不懷疑，最後結合為一個民族和一種語言，但是，這不，不是由鎮壓和阻止所能做到，却是由質量之十足發展而來的。

民族的偏見仍然存在於一些俄羅斯人的心中，這是由於他們過去優越的特權。以前被壓迫的人長久不信任俄羅斯人，他們的心中也仍然存在有民族的怨恨。這些怨恨成了最後的問題。假使因這種民族仇恨而發生衝突，雖至最小的事情，也得嚴厲處置。不過平常俄羅斯人因醉酒而發生衝突，是作為惡行輕輕地放過的，但如果在一個俄羅斯人和一個猶太人之間因醉酒衝突時，以民族的名詞來侮辱另一民族尊嚴的話，那將作為政治犯辦理的。幫助建立史太林格拉拖曳機廠的美國工人將永遠記得：劉易士和布朗把黑人魯濱遜叫做『該死的下賤黑奴』引起爭鬥之後，他們和蘇維埃法庭所生的衝突吧。這兩個白人回到美國去了！在蘇維埃看來，是蒙着犯嚴重政治過失的羞辱的。而黑人仍在蘇聯，現在是莫斯科市政府委員了。

共產黨員對於進化各階段的人，由大平原的遊牧人，以至自負的喬治亞人，都應用這民族政策，

結果是什麼呢？它曾經把以前數十種被壓迫的人民的力量在革命周圍鍛合了起來，使俄羅斯工人能夠擊退他們的敵人，這政策以不可相信的速度消滅了長時期的民族仇恨。這政策展開了熱烈的民族力量，成爲經濟文化的動力。這政策對於『劣等』和『優等』種族的神話給予致命的打擊。資本主義是依照這說法來分開地球的，『劣等』是命定被剝削的目標，而『優等』則擔負『白人的負擔』，即剝削的任務。法西斯蒂今日把這神話神化作宗教了；而蘇聯的全部事實恰與此相反。那解放了的非歐洲的各種民族一經走上蘇維埃進化的道路，就不比真正進步的文明的歐洲人能力小了。

各民族共和國的新工業中心之興起，比較蘇聯其餘的地方還要迅速，這是共產黨的政策『使落後的區域和中央平等』的一部分。當第一屆五年計劃期內全國工業生產兩倍時候，民族共和國的工業出產則增加三倍半。在最落後的地方之增加更快，卡沙克斯坦 (Kazakhstan) 大平原的工業出產增加四倍半，而中央亞細亞共和國則獲得六倍的增大。因有這些經濟成功的基礎，也就增大了教育文化。在五年計劃期內有七十個民族採用拉丁化的字母。許多民族在革命前完全沒有字母；他們由蘇維埃政權接了禮物：他們寫作的語言。各民族的讀寫能力及藝術書籍增加很大。數年以前舉行的全聯戲劇奧林比亞中，顯示許多民族已經發展真正民族的劇院，有些地方甚且已達到很高的

藝術水準。

蘇維埃民族政策之重要的一章是：怎樣把千萬的遊牧人轉變爲定居的農民。Kirghiz人，Kazakh，Ingush Gypsy，遠北的牧鹿人及中央亞細亞與高加索的山民（這些種族數百年以來在沙皇的官員，他們本地的酋長和樂商的三面壓迫之下過着半野蠻的生活）已經發展集體農場了。七百萬在平原，山中及濕原遊蕩的人已經安定了；計劃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安定其餘的三百萬人。蘇維埃政府給予他們耕種的土地和牧場；灌溉他們的農田；供給金錢，建築倉庫的材料，鐵匠店，家宅，住室，購買牲畜與種子。蘇維埃的農場專家教授他們墾田的方法。

北冰洋隕原的人民尤其活潑。這廣大的區域內有廿六種民族，其最繁殖的通古斯也只有六萬人。革命以前，這些民族沒有一個有字母可寫的語言或一個學校。現在他們多數已經獲得可寫的語言和印刷的書本了。沿北冰洋岸有好幾百個本地語的學校，有些和豢養馴鹿的遊牧人一起移動，另外還建立宿舍給兒童過冬。

北部牧鹿的一個Nentsi人寫道：「他們曾經把我們當作野獸過。Nentsi在沙皇時代被陳列在俄羅斯及外國的動物園裏，現在他們一定還活着。他們把我們叫做「Symayod」（食人者），沙皇政府製成法律，把這名字當做我們可恥的名字，但是現在我們開始唱新歌了。因爲我們的隕原是

新的呀。一個試驗農場中心在北極圈外建立起來了；我們已經生產蔬菜了！第一部拖曳機已在 *Povora* 草原出現了。當第一次有無線電到這裏的時候，我們 *Nentsi* 人是怎樣吃驚啊。但是現在識字的人逐日增多了。』

去年，民族共和國有許多慶祝他們的十五週週年。她們簡略地在蘇維埃報 *Daghastan* 上以三十多種語言登載各種消息。一切共和國中最苦痛的卡沙克斯坦克；北部森林與大理石山中『那兒每個漁夫都有自己的漁池』的 *Karelia* 人；有幾世紀文化和受苦的遠南的亞美尼亞人；每個共和國報告各自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的成績。

Alma-Ata 是黃種卡沙克人的新城市。卡沙克人曾是遊牧民族，遲至一九一九年他們的國家主義的領袖們之一還相信被『命定緩慢的死亡。』但這城却舉行了七百四十八個科學與文化的工人的大會，報告國家教育的發展。革命之前在這廣大地方的小學校裏有一萬三千個兒童；現在有五十萬兒童了。文化成績有民族劇院、歌隊、諧和的弦樂隊，十七個高級學術機關。他們擴大工業的基礎：*Karaganda* 的銅，*土西*鐵道，*Ridder* 的巨大礦業 *Emba-Ovsk* 的煤油導管建設起來了。

在 *Afghanistan* 邊界最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太吉克慶祝他們十週紀念。蘇維埃政府為幫助他們建築灌溉工程，建立大紡織廠，開鑛，創立技術學校，決定了助款一百萬盧布。科學考察團考察他

們的『帕米爾』高原，在斜坡上發現了金和其他貴重的金屬，棉場上現在有了數萬架耕作機，犁，耙和農業上用的現代耕作用具，這些棉場，過去是用着駱駝拖了木犁耕種的。在古代村落的廢址上，現在建築了新城市，工業中心的史太林那勃特，山裏村落中有了飛機場，那裏的居民在革命之前，從未見過有輪子的車過的。蘇維埃政府調查只有百分之·五的太吉克人識字的，而現在十分之九的兒童進學校了。

一百八十二個民族一個個展開着：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創立工業，現代農業學校與民族文化。這些民族也不僅由比較進步的俄羅斯人那兒接受幸福。他們都不斷以創造的力量，豐富他們共同的蘇維埃生活。有些小民族已經創造了紀錄：列諸蘇聯的先鋒之中了。亞美尼亞曾經被民族屠殺所蹂躪，現在是外高加索模範的共和國，慶祝她的繁榮的工業了。高加索北部山崖兩種回教人民的區域Kabardino-Balkaria 已經創立蘇聯最著名的集體農場。它展開建築家設計的『社會主義農業城市』的目的，而這『社會主義農業城市』的目的也是整個的蘇聯的目的；這一區還行着使老年農民做檢查的政策，它們使蘇維埃數十萬年老的人得能快樂和自尊。

被壓迫人民的熱心於建議，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正是蘇聯政策的收穫。卡沙克一個村子的十八歲的主席柯莫夫在蘇聯報紙上，曾經摘引卡沙克老年人的一句流行話說：『蘇維埃政權的開端』

卡沙克，猶雨之於沙漠。』太吉克詩人拉富底，當他伴着造成採棉紀錄的代表團來莫斯科的時候說：『列寧和史太林的黨，已使這些人們從死亡中復活了起來，這些人們從來是輕於塵埃的呀！現在他們由自己克服了這地球，來向他們的領袖報告他們的勝利了。』棉場工人之一，Avith Shakirov 說：『過去的歲月是一架滿是針刺的樓梯。烏茲柏克人怕沿亞拉伯的路走；太吉克人拿了手杖到烏茲柏克人那裏的。書也難得有人讀到。但過去是過去了。在過去的廢墟之上建立輝煌的新生活。誰要想把這新生活和我們分開，就對不起誰。』

當一九三五年八月土柯門的騎師由他們的首府 Ashkhabad 騎馬至莫斯科，沿途四千三百啓羅米達的城市都紫綵歡迎他們。他們這樣慶賀：『由我們偉大祖國之無限的廣漠那邊經過 Kara-Kum 的溫沙帶，Ust-Urta 的大草原和無邊的集體農場。』他們這樣說了：『現在以不可動搖的民族間的合作，代替了舊俄的民族的牢獄，牢獄的時代是過去了，將永不再來了。』這騎師團一個叫做 Chary Kary 的人，以前曾在莫斯科，他說：『那時，這地方是我們敵人的城池，城裏每一個人好像是私人的敵手一樣。現在莫斯科是我偉大的祖國的中心，我祖國的每一個民族都是我的民族。』

一九三五年末中央亞細亞工人的代表帶了他們的成績進克林姆宮的時候，史太林向他們中間一個說：『蘇聯人民之間的友誼是一種偉大的決定的勝利。只要這種友誼存在，我國的人民將是

自由而不可戰勝的了。』但是民族政策的影響遠至蘇聯之外啊。這政策甚於任何其他蘇維埃的政策，它摧毀了世界上的帝國主義。

第六章 領導的技術

「在人民大眾中間，我們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只有當我們恰切宣示人民所理解和要求的那時候，我們纔能治理民衆。不然，共產黨就不能領導普羅列塔利亞，普羅列塔利亞也不能取得羣衆的領導，這樣整個機構只有粉碎。」

列寧在第一屆黨大會的演說。

假設因爲某些戰爭的大變動，把蘇聯一部分由莫斯科割去，並且被迫得一時單獨存在，那末，這些孤立地方的政府除了會被侵略的軍隊粉碎之外，會繼續不變的罷。一個雅庫特(Yakut)的女人對於這給了我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她誇說她那區域自從一九一七年後已經繼續有了『蘇維埃的政權的』。那地方是森林隰原之區，南距外西比利亞鐵道一千英里呢。過去在這鐵道旁的內戰期內，也沒有越出鐵道到那末遠的地方。我問這個落後的小地方怎樣得知道，和追隨什麼政策呢。她回答說：是因爲幾個處流刑的布爾雪維克曾經留在她們那兒，他們不時由橫過那區域的大北電報局

獲得莫斯科的新聞。內戰期內，俄國有許多地方被隔絕了很久，都由此追隨了共同的政策的。

十八年以來共產黨在蘇維埃生活中的威信已經穩定地加強了；她保持政權的時期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內的任何政黨要長得多。在別的国家，積聚的不滿把政府推覆了，而共產黨好像沒有這樣的煩惱。黨本身爲着進步把缺點整理出來，不管暴露了鑽營，無效率，官僚政治和過度的遲鈍等等——真的，經過這些認真的暴露，共產黨的威信只有增加着。

管理世界上最廣大的共和國——佔全世界地面六分之一——的國務，在一個政黨看來可以算是很夠受了。但是治理這樣的國家只是共產黨的事業之一罷了。要計劃改造世界，僅政府的機構是不夠的。所以在蘇聯，在一個共同計劃的規劃下，有許多廣大的普遍的組織，如工會，合作社，體育會，文化團體和無數自發的社會機關共同負着這樣的使命。這些組織的活動，必須是自發的，鼓起會員們的創造性，要不然，它們的力量和生命就不能持久。

那共產黨怎樣領導這國家呢？這惟有由於她的黨員們的力量和紀律，他們和國內各種組織的接觸，和一再成功的信威。各種政府機關和民衆機關內的共產黨員，活動促使它們遵循『黨的路綫』。這路綫是堅穩的，然而不是刻伐的；黨本身的政策從黨員的活動的鬥爭和討論中產生，而黨員呢，每人都和國民生活的某些方面相接觸。黨員的作用就是黨與其他各種組織間的活生生的，有意

識的橋梁。他們和民衆結合，把民衆的慾望向黨解釋，和把黨基於民衆的要求所發展的政策向民衆解釋。

下級黨部設在工廠，公事房，國有農場，紅軍，大學，鄉村中，每一處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黨員。例如，烏克蘭的一個典型的鐵鋼廠裏，有一千六百人——工人，工程師，公事人員——在工場裏工作，其中有五十五個是黨員，八十五個屬於共產青年團和卅個「同路人」。這是本着或欲入黨的態度來研究共產主義的集團。黨把黨員當作一個終身組織者支薪；有的則散佈在普通的工作中，參加工廠的種種勞働組，他們每人都有指定的「黨的工作」。那裏有十六種由各勞働組辦的壁報，壁報的內容滿是那些勞働組勝利或失敗的消息和討論，有些共產黨員正是這些壁報的編輯。還有在吃飯的時候，報告有系統的新聞，指導他們討論時事。其他則發動勞働組之間的「社會主義競賽」，由此增進技術與生產。還有的則在工會內活動或者幫助有用的娛樂。每個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同路人都做這種無給的工作；那些不做的或者失敗的黨員會被黨當做「不積極」而開除的。

有一天，我參加了莫斯科附近一個工廠的共產黨部舉行的公開會議。不但是共產黨員，而且有許多非黨員，都出席聽取這工廠黨秘書的半年報告。當他坐下時，問題暴風雨般起來了：「我們爲什麼沒有關於少年先鋒隊的報告呢？……黨注意了我們工人俱樂部的問題嗎？黨知道我們沒有夏季

運動場嗎？我們爲什麼沒有衛生所？爲什麼我們沒有「航空之友社」？「合作住屋社」經常向黨報告嗎？假使經常報告了，那末我們什麼時候可有新住屋？由秘書的回答看來，這個工廠黨員之間有許多自發的組織的，如：『青年之友會』、『國際勞工防禦會』、『促進生產』的組織，『鄉區友聯會』及其他多種。這種種會社由黨的合作加以推動，起初常常是小的委員會，以後因爲非共產黨員加入而增爲大的組織了。成立機關的數目一部分視普遍的要求而定，一部分則有賴于黨員激勵與組織興趣的能力。沒有黨的批准而發動組織是困難的；這不是說明確加以禁止，但是許多困難會來挫折。另一方面，假使一般要求組織某一種東西——譬如戲劇團或防務會等——的話，那黨員可以自動或通過黨和工人們的需要加入這種組織，而且每個人都希望這組織能和鼓勵它的各種黨政策相吻合。

這廠的主任在工人看來不孚人望的；當他在集會上作報告的時候，有了好些諷刺和倒采。我那時偶然的知道，黨書記已經爲此要上級組織調換這廠主任到別的工廠去，使他因這裏的錯誤改進他自己，同時換地方工作可以減少周折。管理員也知道他已被呈請了調換。但在會議上，黨書記絕對不說一聲調換的事，只是對大衆解釋管理員的行爲，雖然大衆對他不滿，或主攻擊他。其實他與管理員兩個都是很有教養的共產黨員，他們不希望增加內鬨，只是爲工廠的前途而工作。

共產黨員在農業區域的比例較之在工廠中的少得多，這因為工廠工人是革命中最活躍的份子，而且文化程度常比農民為高。我這兒拿烏克蘭的『Pustshov』集體農場為例。這村有二百戶人家，村裏黨部有五個黨員，十個『同路人』，二十七個共產青年團團員。因為青年在農場比較的好，所以共產青年團團員在農場一般的比黨為多。

這村五個黨員中間，有一個，即 *Povlichenko* 是組織者，他全部時間從事于黨的工作。他生在這村中，在城市工廠中作過十幾年工，一九三一年奉黨的命令回來幫助集體化的組織工作。由農婦們的說話看來，我斷定他在那時期很橫暴的，為此曾激起了某種對立，這對立，他沒有能以行為來制住它。然而他是很有精力的人，一個曾經過半餓生活，一知半解的僱農，有着求知的熱慾，終乎大革命使他實現了這願望。他管理教授黨史與現代政策的黨務學校，教同路人的列寧主義和蘇維埃憲法的初級課程，編審特別事項如黨大會或者關於農場的新規例的談話和討論。在我訪問時，那些偏僻的村民正在研究地米特洛夫 (*Dimitroff*) 和其他諸人在最近共產國際大會中的報告，一般的都很勤懇。 *Povlichenko* 對於推進地方學校，鄉村俱樂部，活動影戲，地方新聞紙，及各式教育文化方面都積極地參加了的。

第二個共產黨員是本地的農民，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就做集體農場的主席，現在替農業學校

起艸了一個三年的課程。他的薪水是由農場支給而不是由黨支給的。第三個派到這村子的是一個電工，那是因爲『我們在農場每一組中需要一個黨員。』當他來的時候，他對於農務完全沒有認識，但因爲那時這村子正開始從特尼泊大電廠輸入電氣的緣故，他的技藝對於這村子是有用的。最近黨計劃把他調做城市工作，但當地人民選他做村主席來阻止這事情。他說：『黨常常重視民衆的慾望。』他爲着黨務工作加入農場第三隊；當共產青年團的顧問。第四個黨員是個婦女，她做合作社售貨員過活，她的指派工作是幫助鄉村婦女組織一個日間兒托所，一個互濟的組織，那裏婦女在生產期內得由集體農場支給費用。這權利在國營農場是當然的，但並非一切農民組織都給予這種權利。第五個黨員是當地合作社的管理員，因爲他每天到城市二三十次的緣故，所以黨之派他做事，與其說叫他做常規的鄉村工作，不如說叫他做的是城市鄉村間的聯絡員。

顯然，這五個黨員參與了鄉村的全部生活的，除了他們普通的工作以外，前三個每人各和四十或者四十多工人的農場小組接觸，他們希望能一個個都認識他們。Povlichenko說：『我必須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他們的經濟情形，和工作能力。這就叫做政治的注意。假使我們不知道這些事，那末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領導羣衆就不可能了。』

這一村子的黨組織，因爲黨員在當地政府中佔職位太多的緣故，它以基於黨原則的公開的嚴

格批判來糾正可能的錯誤。他們要在機關職員和『生產』份子間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鼓勵和訓練非黨員的人民來做些政府工作。黨員把持機關是最壞的事。因為這就表明他們沒有充分鼓勵起人民廣泛的興趣。Postishov 的黨部正在以他們的工作來改正這一缺點，他們的十個同路人和共產青年團團員也都負了這樣的責任，他們每個都有黨的工作，不過負的責任較輕。他們在農場小組中閱讀和討論新聞紙，組織旅行圖書館，象棋隊 (Chess)，足球隊，發起割禾打谷的競賽，幫助發起音樂會或戲劇團，或者在『鄉村試驗室』內幫忙，那裏有六十個農民在研究科學方法。

這些下級黨部和城市黨部發出關係(註一) 城市黨部則在省黨部之下，這樣一級級上去到全聯黨部。下級黨部選舉上級黨部，但得服從上級黨部的決議；這制度就叫做『民主集權』。每個黨部的最高權力在於大會，大會選舉常務委員會進行大會停開期內的事務。全黨最高的權力在於全聯黨大會，大會休會期內則在中委會。中委會組織一個政治局，逐日決定政治方針，一個組織部，總領導黨務工作，一個秘書處，史太林是黨的總書記，還有其他書記數人，分任這一工作。

唐納茲 (Donitz) 盆地是煤鋼的山谷。幾年前我看見在唐納茲的紅色 Lugausk 城內共產黨區大會的活動。四五百個男女集議兩天，礦工，礦場管理員，僱員，汽車廠主任，一些教員和健康所所員，

(註一) 『Rayon』一縣約等於一鎮。

都是共產黨員，由這地方的工廠和磨場的支部派來當代表。討論的問題是對於重工業和少數民族的政策。中委會已宣佈這兩個問題是很迫切的。關於它們的『論題』早由領導的當局公佈了的，本地的黨部也討論了幾星期的。

代表們不消耗時間在預備或和什麼致候。每人逐一熱烈地把他們所知道的礦場和工場重工業的具體困難說出，他們根據他們當地的工業預備報告，選舉代表帶他們最誠懇的批判出席煤炭中心地巴克瑪特（Bakmut）的省黨部，在那裏再選代表出席全烏克蘭黨大會的代表。再後是全聯的黨大會了。由察柯夫，蒂夫里斯，由明斯克，由中央亞細亞和西比利亞，產生代表到莫斯科去，全聯黨大會討論兩星期，製出『黨的路線』。然後由代表們再帶結果轉回到唐納茲，高加索，以至海參崴的遠東。代表們首要的任務是在各級工會，合作社，農場，政府，及他們所領導一切組織內解釋和實現決議。

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最廣泛而有組織的腦力動員。這實在是三百萬男女採集了他們千百萬同伴們的觀念後的精思熟慮，這在會議上一方面鞭策全聯大會，一方面影響大會的決議。這些觀念由黨的最能幹的經濟家，根據一切國家革命運動的經驗加以編審。通過的決議則由各種各樣發表機關向全國解釋；每一個農場小組和工廠支部都討論與研究這些決議，同時在全國執行這些決議。因

爲有組織的計劃需有有組織的行動來測驗。

共產黨只不僅像投票或者舉手那樣反映羣衆的願望。他們不但分析『多數缺乏』什麼，並且把缺乏交出來。領導和組織民衆的願望是他們的工作啊。無論何時，沒有未受命的兵士羣自由衝出壕溝的。而且事實這樣，蘇聯的工人，不必投命，不必督促，也無須推選，他們爲了五年計劃的迅速工業化，爲了沒有適當的機械和組織者的急速農業集體化的困難艱辛而自動減少其生活上的必要。但是共產黨當有所分析，督促和要求了之後，如說明了世界的情勢和蘇聯在工業上有爲國防好好準備的必要，或爲達到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必要消滅敵對階級等，他們能夠在羣衆的內心深處，找出組織和創造一種實行的意志，沒有這種深藏於千百萬羣衆內心的意志，那三百萬人也無所作爲。史太林曾對威爾斯講過如下的話：「如果要發動一個革命，一個少數人的革命，領導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它不建築在羣衆最低限度的消極的支持上面，那儘你是有一等的天才，積極而精勁的領導也將無所用其本領。」（註二）

關於黨，政府與自發的工人在行動上的相互關係，我來舉個例子。這事即是一九三一年春季莫斯科省的『動員』汽車和機械幫助亞麻播種，那年莫斯科開始集體農業，莫斯科全市發動了一個

組織和宣傳的活動，幾百架新的耕作機作它底後盾，擴充亞麻的耕作面積。在擴種的第一週內，新組織的耕作機站打電報到莫斯科，報告那裏有了『中輟』，全省的耕作機都停在田裏不動，原因還不得知。

在這種情形中，誰來推動呢？是莫斯科黨委員啊。委員會收到很多關於莫斯科每日發生的事情的報告，它決定亞麻播種的中輟是很嚴重的，所以召集了機械的『動員』。

這次召集及于成百的商店與工廠的黨部。召集是由工會工場委員會與工廠的新聞紙宣佈的。不但一個單獨的機匠需得去應這樣的徵召，任何工匠，只要他願意去一、二天替他們修理耕作機，幫助他們耕作，那他們可以得到管理員或同事工人的替代去的。他們由別人代替去做這樣公開的公共工作，是不扣工資的。他們爲的什麼呢？這就是參加播種的突擊工作。的幫助國家，過一種多樣的，有用的生活。一切汽車都『動員』着把機械帶到田場去，那些把汽車借給這種公共工作的人，可望減少汽車稅。我也發奮作了一次兩日的旅行。

我們到莫斯科北一百五十英里的拖曳機場去，那是給我們指定的。那裏時，普蒂洛夫工場的三十架拖曳機內，有十三架開不出火車站。其餘的，也都由農家男女小孩們折了放在田場裏的。這些農家男女們也只有在一個月以前才看見這種拖曳機呢。我們自動効勞的工匠整夜修理拖曳機。當地

駕駛拖曳機的全夜站立，熱切地守候學習。隔天我駕了車到莫斯科去，車裏一個工匠睡着。他們對於公衆的緊要事情已經接連工作了廿四小時，第二天早晨還得向莫斯科工廠內他們同事的工人們報告。他們並且預備一個技術的報告，指出 Putiloff 的拖曳機有某種嚴重的缺點。這報告兩天內在重工業機關報的「工業報」上印出，提醒工業領袖們開會改良 Putiloff 拖曳機。莫斯科省的亞麻播種在季初比起計劃來要落後百分之五十，但三個星期之後超過了計劃，爲可分之一〇八，成爲聯邦亞麻播種的最高紀錄。

莫斯科耕作機中央站說：『救我們的是社會組織的工作。』什麼是有關的組織呢？國家，黨，工會，汽車會都參加了。普蒂洛夫工廠是國家所有的，耕作機站也由國家供給資金的，指摘普蒂洛夫工廠的缺點的工業報，由在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管轄下，也可說是國有的。工會組織投效隊，在他們下鄉的時候，替他們代理公事。汽車公會組織汽車隊。但是發動這樣大規模活動幫助播種的意志，却是莫斯科千百萬工人的意志，他們由莫斯科的黨委員會指定和組織起來，其中大部份的工匠還不是黨員哩！

我們知道共產黨員甚：在假期內也常小心留意他們對於組織國家生活的責任。當我坐着一只大汽船下偉大的伏爾加河的時候，我看見一條標語，它要黨員們行旅時跟船上黨組織的書記討

論經濟問題。我知道旅行在船上的共產黨員，常被邀出席在船板上舉行的農民集會，甚至到水手共產黨員的政治學校裏去演說。有些城市的共產黨員利用這機會熱心批判船上共產黨員缺乏注意衛生。水上的共產黨員多數是沒有訓練的船夫，這樣就獲得他們現代衛生學的第一課了。

蘇維埃國有輪船航行的範圍是由革命決定了的。速率和每日每年的航程則由黨的中委會根據變動的風向和潮水決定。航程的確定可有積極的工人或農民參加。每個黨員和某些民衆聯絡。各個黨員互相影響，討論和比較結果。這航程就是三百萬黨員的經驗所產出的。經歷最長，履歷最好的共產黨員有最大的威信；但要注意他們不將其叫做『權威』。『權威』是在勞働羣衆的願望之內，『威信』是性情與智慧的尊嚴，有這樣尊嚴的，使他可能利用這種權威。

史太林所有的與其說是權力毋寧說是威信。他的地位雖比蘇聯任何人要高得多，他在一切大會雖當作崇高的權威者受着歡呼和證引，然而從來沒有人提及『史太林的願望』或者『史太林的權力』。却說『黨的絡綫』。史太林只報告但沒有創造『黨的絡綫』。黨的絡綫是允許人人研究，知道和幫助具體化的。人之偉大是在他能够做的範圍之大小。一個工廠管理員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能夠和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作一年的計劃。其他比我聰明得多的，爲我們中委的人們，就能夠爲更廣大的羣衆作更長時間的計劃。在這方面，史太林是頂能幹的了。他看出我們的路徑和國際事件

的相互關係和每一步驟的次序，就像由高空看地球一樣。

『由高空看地球』——說這話的人自己就是一個航空工程師。蘇聯的人們用他們技藝的觀念去看史太林鐵路工人叫他『革命的火車頭駕駛者』一個經濟學家當五月節日在紅場上提及黨和政府的領袖們的時候對我說：『我們的智囊是三巨頭。』割打兩用機的駕駛者說史太林是『朋友和教員』；工業管理員非正式說『監督』。沙漠上黃種的 *Kanaka* 人在他們的共和國十五週紀念時向他歡呼：『勞苦人類的偉大領袖。』

千百萬不同職業的樸質的人們，感到史太林在解決他們的主要的生活問題的場合那種分析的魄力。有時這是一條難於遵循的路，但確是達到羣衆希望的目的的一條明晰的路。史太林的意見常是迎合了客觀的變動的，譬如他對馬克思主義農業會議說，已經到了『把富農作爲一個階級來消滅』的時候。但是他又只宣稱了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所知道的綱領上的進行時間，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史太林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因成功的混亂』那裏他突然地要農業區域的共產黨員停止那時很普遍的狂熱，然而因此那時外國的一些通訊員和一般農民都以爲這是史太林的命令。史太林馬上否認這種個人得命令的什麼個人威權，他在報上這樣說：『有許多人以爲這篇文章是據於史太林個人的意思，那當然表示了他無意識。中央委員會根本不承認這種事情的完全個人的

創意。這是中央委員會所進行的一種考察。」

史太林不是一己執政的，他在集體行動的終生習慣以外，再加他個人卓越的分析情勢、人格、趨向之分析的天才。他的領導有像許多意志和願望的最高結合。當愛彌爾·盧德維希(Emil Ludwig)問他誰實在創製決議的時候，他回答說：『個人不能單獨決議……三次革命的經驗指示吾人：一個決議如果沒有經過集體的測驗和改正，就有九十個是偏向的。中委會指導各級蘇維埃和黨部，我們的黨在中委會的領導大約包括七十人。在我們這七十個中委之中有我們最好的工業領袖，我們最聰明的專家，和那些最會懂得我們各面活動的人。在這最高會議中集中黨的全部智慧。每個人有權向他同志的意見提出修正或反對。每人可以舉出他自己經驗的權利，不然的話，假設允許個人的決定，我們的工作就會有嚴重的錯誤了。』(註三)

史太林早先在結束他的文章『因成功的混亂』說：『領導的技術是一件嚴重的事。必須不在運動之後，因為這樣就會和羣衆隔絕了的。也不能衝在前頭，因為這樣就喪失和羣衆的接觸了……黨是強力和不能戰勝的，因為當其領導運動的時候，知道怎樣維持並增大和數百萬工農的接觸。』這可以算是史太林關於領導的分析。

在蘇聯還有着懶惰與暴亂的行爲，無定見和貪婪的人們，艱苦和不公平的事情，青年力和生活的消耗。人類本質底的進步需要經過許多苦難，這在蘇聯也不能逃出這定例。但使其得能這樣能耐的，正是這一事實，這決不是一個人或三百萬人的命令所能一蹴而成的，而是緩慢的進程中的部份，——歷史並不以爲它慢——由此千百萬人們完成他們有意識和有組織的生活計劃。

第七章 新經濟的建設

「不是毀滅就是趕上先進國家，而且超過它們……這就是歷史已經怎樣確定了問題。」

列寧

「數百萬人創造這計劃。」

史太林

在新到蘇維埃的人看來，他們生活之最動人的特點之一，就是一般公民對於新工業，現代設備，車輛的數字和經濟統計表示熱心的興趣罷。訪問蘇聯的好把它叫做俄羅斯人對於機械的一羅曼諦克的熱情。可是在他因為長期忍受了機械給與的苦痛，現在機械把他趕出了工作的緣故，他覺得難以了解這種熱情。他來看「革命」，研究計劃經濟的特質，或者人類概念中之驚人的改變。他找尋蘇維埃公民提供的革命背景，他們要給工廠給他看。

今天蘇聯的情勢是在驚人的鬥爭和難以相信的勝利之中，那裏個人的價值和問題在一個大問題的光照之前失色了。永遠增高的生產曲線，鋼廠的開設，耕作機廠，機器建築工程和紡織工廠之

管理的成功，分別把這大問題解決了。蘇聯成了這樣的情形，假使雨是表示收穫的話，那一個才識字的年青女僕也會不以雨水透進破靴而懊惱，她覺得這不是個人的事了。她從來沒有見過蘇聯處處遠地農莊有這樣的收穫。

我們不驚奇蘇維埃公民對於經濟事實的感到極大的興趣。革命以後國家經濟生活之改變是可驚的，在每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可感到這結果。當十五年前我第一次進蘇聯的時候，這國家正受着飢荒和時疫的摧毀。內戰和外國的干涉，把農業工業和運輸破壞了。莫斯科沒有街車行駛，街燈久已燒毀，沒有替換，兩個沒有燃料的冬季，把全城的鉛管破壞得這樣厲害，以致使水壓不能升至二層樓。

一九二一年我臥病（瘟熱病）在沙瑪拉（Samara）最好的一個醫院裏，那兒一百個病人只有兩支臨診的測溫表。長期戰爭和封鎖使無數種貨物不能輸入蘇聯而在空曠農業土地上的少許落後工廠又不能製造這些東西。測溫表電燈泡水管不過是無數種貨物中少許幾種罷了。

在我在那裏的十五年中間，進步之迅速太離奇了，差不多已經把過去記憶統統消滅了。在蘇聯居住的看來，戰前時期好像是前史期，甚至一九二一年也像一世紀以前。在這十五年當中，我們看見工業生產增加十倍以上，我們看見農業由十六世紀跳到廿一世紀。我們接連經過幾個世代，這幾個世代在規定我們的生活上，都有着很清楚的分別的。但是這幾個世代都有一種不斷的有力的狂熱

的特性。

對於剛剛脫出外國干涉和長期封鎖的人，奮勉的理由是很清楚的。列寧說：「戰爭是不可鎮息的問題是冷酷地放在面前。不是毀滅就是趕到先進諸國而且超過它們；不是全方向前，就是毀滅……這就是歷史怎樣確定問題了。」（註一）一切共產黨員都認定：在目前全帝國主義擴張期內，這是到了經濟落後地方被帝國主義列強分割的危機。蘇俄除非在經濟上使自身獨立，就怕要陷入與中國同樣的命運：「國外敵人分割的戰場，誰要存心啄食誰就可以這樣（註二）辦。」

而且假使爲保持國家獨立需要迅速地發展經濟，那末，爲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更需要了。社會主義對於每個勞工提供富有生活而這種生活是要求豐裕的生產的，在生產工具爲個人所有的國家內，是不能獲得富有生活的。美國今天存在着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物質條件，遠比俄羅斯所有的爲多。除非實在有了財富，分配財富是不可能的。財富公有必須有工廠公有的基礎。俄羅斯有首先建築工廠的問題。

列寧認爲社會主義俄羅斯經濟的迅速發達是決定地重要的，這不但爲了俄羅斯民衆的福利，

註一 史太林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成果」報告中的摘引。

註二 史太林「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果」。

也爲着將來世界社會主義。這個新興革命國家的工人們在這落後的半封建土地內，是僅有一種優點——他們是他們的國家及其一切生產財富的共全所有者。他們必須向世界證明：就是面前有着巨大的困難，這一種優點也是決定的。甚至在一九二一年經濟破壞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列寧還說：『我們用我們的經濟政策來影響國際革命。世界的視線都轉到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了：』假使我們把這問題解決了，那末我們最後一定在國際方面獲勝的。那就是經濟建設的問題爲什麼對於我們是絕對例外的重要的。』（註三）

蘇聯經濟進展中有一種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論調。這是每個留俄的所必須注意的。就是說：每一種小成功費去無限的努力，而極重要的成功則在短得太離奇的時間內獲得。俄羅斯過去的落後性的缺點，在無效率中間可以找到：它阻礙每種運動——坐電車買一軸線，找一間房屋都如此。甚至確當地管理一只鼓風爐也有困難，這在外國專家們感到極大的失望的。但蘇聯不管有這些困難，仍然前進，其速度的快甚至在最有效率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見得是未聞。

這樣的飛速是由于數百萬工農可驚的精力和創造性。這些工農們現在自覺他們自己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知道無論創造什麼東西都是他們永遠所得的。他們的創造性和計劃社會的制度互

相配合。這樣發生了上面那種似是而非的結合了。個人的無效率和可驚的社會動力。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千萬個人的效率互相抵消，使社會獲得的僅是很小的利益。但蘇維埃有計劃的機體內，的每一種新成績雖然是這樣辛苦艱難獲得的，有的却是百萬倍的收獲。

這些蘇聯社會計劃的利益近年來是這樣明顯和週知的了，使許多國家都夢想把計劃的技術和平地裝進資本主義的制度，想不要有革命的殘酷的衝突，和平地得到社會主義的幸福，尤其是在美國，有高度發達的生產機構而不能替全民產生富足，於是幻覺起來了，坐在紐約或華盛頓的一些天才，許許多多優秀的人們必須找出實行那種和平革命的魔術的祕密。很明白的，個人所有者能夠計劃他的工廠，並且把它的效率提高到工業時代以上。但是無論政府的智囊團怎樣能幹，它能夠計劃處置羅克弗萊爾(Rockefeller)的煤油井或J.S. 鋼鐵廠的內部組織嗎？問這個問題即是回答這問題——假使 NRA（復興運動）的歷史不曾給予回答的話。——只有所有者纔能設計工業和管理工業的生產品啊。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所有者的計劃碰擊着。

在社會主義的情勢下，政府最簡單和最基本的行動是由工人所有者設計擴展和改進他們共同所有的資產。這種形式的設計不但在莫斯科（外國的訪者在那裏通常尋求這種設計）那些中央機關內這樣，同時在工人的長橋旁邊也有着這樣的討論。工餘的出產集議討論工場問題，什麼阻

機出產，怎樣增加出產，並用什麼方法。這種討論全廠舉行着；所討論的從工廠一而再的傳到工業托辣斯的中央事務處去。中央機關對工場的答覆是國家需要某種新機器。那就問題來了：『我們的計劃能夠創造這種新機器嗎？』解決的辦法：各地工廠有同樣需要的，派代表集中討論，互相研究。某一地方工人的這種發見和提議常傳播開去成爲一個國家的計劃。

然而，計劃不僅是十分準確的藍底稿。由絕對和技術的意義而言，完全不能說這是最後的『計劃』。因爲雖然每個工廠，農場，學校和政府的學術機關拿計劃來核對每月間和一年間的成績，然而最值得驕傲的常是超過的完成，即所作多于所欲，把計劃打破了。所以，計劃是希望的標準，挑戰的旗幟，却不是限度。蘇聯是沒有限度的。目的是國家創造和出產力之完滿發展。出產越多就越好。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設計的概念，誰都知道不可能的吧。這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國家生產所有者的工人是能夠利用一切東西。留心一切事情增進國家的生產的。

社會主義不是一天創造的；社會主義不是由投票來完成，甚至不是由奪取政權來完成。奪取政權只是它的前提罷了。社會主義即是國家共同所有的財產的擴張和組織化，和建築在國家財富上的富足的人民生活確立。這是十月革命的目的；不管世界報紙上關於蘇維埃十八年來『改變的政策』有種種敘述，其實從來沒有稍微更改這目的。然而所採的戰略則受國內力量和國際關係的

限制了。

侵略戰爭終止了，工業也落到了戰前的五分之一，棉類貨物的出產只有正常出產的百分之七，鋼鐵出產差不多完全停頓了。穀物貯蓄吃空了，一九二一年之大旱直接造成了俄維斯歷史上最大的飢荒。那時採取的新經濟政策鼓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式經濟的發展。同時，共產黨每年領導國內勞動階級爲着一個又一個重要場合的勝利而集中萬分困難。有組織的鬥爭。勝利常常是耗費暫時很大的犧牲而獲得的。

一九二二年，我們看到在金融上的獲勝，那年建立了一個國家銀行，由銀行高貼息達到通貨的部份穩定。然而這些都是減少了國家工業的利益而獲得的。在一九二三年，注意轉到了需要品工業；因爲革命之後開頭時候，是以高價格維持了自給的平衡的。後來接着有了二年的努力削平價格；消費者的合作社作爲國家工廠與農民之間的鎖鏈而高度地發展了。到一九二六年，合作社與國營商業增加了三倍，勝利地超過了個別的中間人，這些人過去統制了農村投資的百分之八十的。在再後的二年中，注意又轉到工業的復興，至一九二八年總算達到戰前的生產水平。蘇聯工人再建了被大戰破壞了的國家，而沒有借助於外國資金的幫助，相反那些歐洲被戰爭損壞了的國家都借助於外國資金的。

但這裏到達的程度還是很低的。僅僅沙俄戰前的生產水平，舊工場都百分之百的利用了，但還不能供應工農們的需要，他們需要一個比革命前更高的生活標準了。每年都有食糧短少的增加。蘇維埃工業除非擴張基本生產財工業，新建築和增加機械利用程度是無從再擴張了的。每當戰爭威脅時，蘇聯感到不但商品缺乏，而特別是重工業的落後，這在我們這個現代機械化的世界，在平時是生產工具的基礎，在戰時則是國防的基礎。

蘇維埃俄羅斯，能夠迅速發展她自己的工業並在經濟上獨立嗎，還是同沙皇時代的俄羅斯一樣必須輸出農產品來生活，把她的未來冒着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危險？這個問題嚴重地引起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國建立社會主義是否可能，假使可能，又用什麼方法。俄羅斯的基本工業是國營的，但不足供給人民的需要。因為以前地主的土地分爲小生計的農田，原始的農業體制于是更原始了。這些小塊農田呢，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荒廢，對於供給日益增大的城市的糧食，日益不支了。一九二七年俄羅斯農田面積達到戰前播種的二百萬八千萬英畝，達到戰前穀物出產之八千萬噸強，但是市場上的穀物只達戰前數目之半。社會主義化的工業有像在中世紀農業『海』中的烏嶼，海潮常常威脅着挖掘社會主義的基礎。列寧曾經說過：『因為我們生活着的是一個小農國家，所以有的經濟基礎與其說有利於共產主義，不如說有利於資本主義。』（註四）

所以俄國農業有兩條路，可是，不過無論那條，總得把農業從中世紀救出來，加以現代化和效率化。第一條；我們知道地主即富農，他們已有了最好的生產手段和較好的農具，較多的馬匹，有時還有打穀器製酪器和磨坊等，這些只要給以耕作機，割打兩用機和更多的田作大規模的耕作，可以發展為現代農業的，即如歐洲其他國家從封建制中出生的現代農業一樣，但一面則犧牲了小農，使他們為無產的雇農了。假使蘇維埃俄羅斯真這樣發展的代價，那在現代這個世界情勢之下，不但是俄國農業上將繼續階級鬥爭，不但是失業將飛速增加，不但是切社會主義工業將被沒於一個擴張中的資本主義之下，而是這個青年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將絕對地屈服於帝國主義世界的金融寡頭之下。因此，最後在一九二八年，隨史太林和共產黨的如此分析之後，採取了現在有名的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建議了國家迅速的工業化，超于世界上一切已有的工業化速度的工業化。在這個要求之下，首先得建立重工業，製造其他工業和農業所用的機械的機械，相應於重工業的展開，建立輕工業提高生活水平。至於農業則必須工業化，不是加強農業資本家的活動，而是一切非剝削層農民的自願結合為集體的生產，由國家工業供給機械，從貧農做起。為使農業現代化，為要現代化的利益給與大多數計，這樣是必要的。同樣，為使俄羅斯社會主義化，或者至少為保持城市工人已經展開的

半社會主義，也需要這樣。最後爲國家的獨立，爲蘇維埃政府的存在，都需要如此。斯大林說：『我們不能不把落後一百年的國家拯救起來，它正由於其落後性的緣故，而臨了生死存亡的危險了的。』

(註五)

在不到五年的時期內，因爲五年計劃百分之九十六于四年另三個月內完成的緣故，——卽由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史大林能夠宣佈以前落後的農業俄羅斯已經成爲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國家。工業上僱用的人數二倍于過去，從一千一百万至二千二百万。工業出產數量也是兩倍，由一九二八年的 15,700,000,000 盧布升至一九三二年的 34,300,000,000 盧布（依照一九二六至七年價格計算）；這是三倍于戰前的出產。同時，農業的迅速工業化把二千萬塊小的沒有的好的經營的農田，聯成爲基於機械力，科學方法，分工之上的集體農場（一九三六年有二十五萬所），工業與農業出產之比例呢，由計劃開始之百分之四八至一九三二年末之百分之七十。這樣就把俄羅斯由農業國改爲優勢的工業國了。

史大林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共產黨中委會全體會議席上報告：『以前我們沒有鐵和鋼的工業。現在我們有這種工業了。』

「我們以前沒有耕作機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以前沒有汽車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以前沒有工程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以前沒有現代的巨大的化學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以前沒有出產現代農業機器的真實堅固的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以前沒有航空工業。現在我們有了。」

「電力的出產我們以前是榜上的殿軍。現在是位列一等了……」

「我們已經完成這些巨大的新的工業，從其規模的大使歐洲的工業規模失色而無足道了……」

…

五年計劃不可否認的經過了許多困難和有許多損失的，譬如人口的移動，青年的消耗，收穫的無組織和食料及其他商品合理化所引起的許多擾攘。不過在歷史中從來沒有一種發展這樣的順利，特別是這樣的快。它不是國外借款和什麼長期信用換來的。假使步驟慢了一些的話，假使共產黨員不是這樣毫不屏息地向完全工業化猛進的話，那他們相信俄羅斯不會有一不侵略協定一而是戰爭了。『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環攻之下，會早被解除了武裝的。』（註六）一九三一年日本向滿洲的

進軍，德國侵略烏克蘭蘇維埃的企圖，今天都警告着，要是沒有飛速發展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蘇聯會早被襲擊了的命運。

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結局之後，蘇聯投入于第二個五年計劃之中。一九三四年初史太林在第十七屆黨大會席上說：『我們已經按下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了……我們現在要做的種種是建立一所大房子——無疑地這是較易的事業。』工業與貿易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九社會主義化了；農業出產四分之三社會主義化了。在這樣建立的基礎上，第二次五年計劃建議廢除『一切私有生產手段，一切階級的區別，和人剝削人的種種。』（註七）第二次五年計劃建設新的建設比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多兩倍，並建議通過全國經濟的技術的再建，最現代的方法和最複雜的機器的應用，把生活標準二倍或三倍起來。

一九三六年開始時，事實告訴我們第二次五年計劃能夠不到五年完成。在一九三五年最後數月之內，重工業每月出產總數早爲一九二八年的五倍。（註八）穀物收穫已有三次超過集體化以前

註六 『第一次五年計劃之成果。』——史太林

註七 『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事業』——莫洛托夫

註八 從一九二八年每日平均輸出的四萬方零四百九十万盧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之二十一萬八千萬〇六十万盧布，（依一九二六——七年的穩定價值）。

幾年全部的紀錄。生活標準迅速增高——更多的食品，更好的衣服，擴展藝術與科學，全國內各地一樣的如此。棉田工人，糖原料生產者，兩用機駕駛員，木料工人，機械師和礦工勝利地降臨莫斯科，慶祝他們生產的成績和獲得當地的歡迎。

莫洛托夫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向中執會提出的報告，告訴了我們一九三五年完成的數字。那裏工業生產相對於一九三四年為百分之二〇、四的增加，超過了計劃的百分之十六。運輸載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原棉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甜業百分之四十三。穀物收穫差不多一萬萬噸，超出了以前的最高紀錄；馬增加百分之五，牛百分之十八，羊和綿羊百分之二十五，豬百分之三十八——這些都是一年的增加數額。

據財政人民委員格林柯（Гринко）報告，麵包券制度的廢除把貿易由 60,000,000,000 盧布增至 80,000,000,000 盧布。社會主義經濟的贏利為 7,800,000,000 盧布；計劃中的國家預算收入超過了計劃中的開支減少了，國家有了擴充的贏餘。但是莫洛托夫說，這年最重要的成果是斯大漢諾夫運動，『這運動把工業和運輸全部革新了，翻開了社會主義勞力生產偉大進步的第一頁。』

接着國家設計人民委員主席梅希拉克，以據於經驗的自信告訴我們一九三六年的規劃。『一九三六年的計劃，準備一個全國經濟的更高度更快速的高揚。』大工業方面規定增進百分之二十三，

卽十五萬萬盧布的增加，大於一九二七年全部工業生產的總額。農業爲百分之二十四，商品流通百分之二十五，鐵路運輸十九、八，資本建設三十四、八。人民的現金收入從一百〇一萬萬盧布增爲一百十八萬萬盧布。相對於物價的跌落，社會文化事業費用在中央和地方的預算中，從十六萬萬增爲二十一萬萬，單社會保險從六萬萬七千萬增爲八萬萬。在軍事預算上，爲了國際情勢的險惡，從一九三五年計劃的六萬萬五千萬，實用的八萬萬二千萬，增至一九三六年計劃中的十四萬萬八千萬。因爲在蘇維埃國家經濟的有計劃的勝利的增長之外，正存在着帝國主義世界不可預定的危險。

假使蘇維埃世界的地圖能夠圖畫般的畫出來，每年更換，那末這圖畫會展露由以前不毛之地興起的無數的城市。這圖會指出千萬塊小而非經濟的農地被開發了。這圖會展示數千個地理探險隊到沒有繪入地圖的荒野去發現和繪出國有的財富。隨着，那裏會突然出現地理測量員，工程師，新鐵道，鋼鐵廠，紡織廠了。新森林，新的煤田和油田開發了。——假使這地圖附一個發聲器的話，那可聽到對共產青年，對工廠工人要他們一同戰勝荒原的號召。蘇聯墾荒的遠征隊，現在北面已到了北冰洋，東面到了阿拉斯加的荒岸。那裏一百五十萬英畝的新森林帶，向南展開着，橫過堪察克斯坦荒蕪的大平原，好像一座大屏障，遮斷亞細亞沙漠的大陸風，保護南俄的穀田似的。

在過去兩年中，共產黨的領袖們已開始提及社會主義是「凱旋」了，它的經濟基礎穩當了。

第八章 維護和平的鬥爭

『蘇聯無須乎改變世界的國外戰爭』

——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大會席上曼努意斯基語——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爲發展而渴望着和平。當蘇維埃人民大衆底生活逐漸變爲更豐富，正在日益改進的過程中，頻臨着它的最大的恐怖，是戰爭底威脅。蘇聯的人民是永不會被這樣的幻覺——資本主義諸矛盾中最惡毒的——所迷惑的，即認戰爭可以帶來那瘋狂的，從血腥中換來的繁榮，叫人們用破壞手段來消滅失業的恐慌。社會主義的繁榮，是基礎於生產和需求底和洽的關係之上的，所以沒有失業的現象。蘇維埃世界認戰爭爲生命，自由與幸福前途的毀滅；即準備戰爭的需要，亦被認爲資源的浪費，因爲這些資源，反過來，是可以爲人民大衆謀福利的。

自有牠存在着的這十八年來，蘇聯已被廣泛地承認爲和平的柱石。即它的敵人亦承認蘇聯在

目下無戰爭的必要。但世界上對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看法，是這樣的混亂，——這種混亂狀態，是由外交家和政治家們攪起來的——在資本主義之下，一般直覺的認定，以為每一個興盛的國家，只有在戰爭底試煉中找尋發展的路徑。所以，蘇聯的渴望和平，有時竟被誤認為懦怯，甚至會以為是假仁假義的矯飾；他們難道不是正在守望地期待着，等他們的經濟建設完成，他們的能力充實嗎？蘇聯在國聯中正在營營不息地幹着的是些什末工作呢？他們為什麼要大量徵集紅軍呢？假定認世界大戰可以把世界革命引進的話，蘇聯是否在這一切之外，還祈望着世界革命呢？蘇維埃祈求和平，這希望是恆久不變的嗎？而且，就算是非常懇摯的來說吧，可是，這是能夠發生効力的嗎？

要接近這問題，有兩個方法，即由蘇維埃的歷史底詳細的研究，和明白在蘇維埃每一行動之後底理論的根據。對於這兩個方法，我們可以逐一的來細說。

在蘇維埃一切行動後面的，是馬克思主義底理論的根據。戰爭的原因，並非像軍事家們所說，是永存於人類底本性中的，也不是觀念論的和平主義者（Idealist Pacifists）所想的，以為戰爭是因為統治者缺乏理知，或者由於統治者本性歡喜戰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強調着，戰。爭。發。生。自。階。級。鬥。爭。戰爭在世界史底現階段，根據這分析去看，是由於資本主義爭取生存和爭取新投資市場，來擴張它自己的鬥爭。在起初，這誘發了主要國家壓搾殖民地底小規模戰爭，拿商品和投資來侵略尚未

開發的弱小民族更進一步，便使帝國主義國家間爲互爭爲已有領地而造成大規模戰爭。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那裏人民自己共有他們的生產手段，收取他們底勞動的成果，他們無需乎擴大市場增加剩餘利潤，只求能使商品相等的交換；相等的交換保證了和平。

因此，社會主義的世界將永遠接近和平。不過，只是一個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孤獨地生存在滿是敵人的世界中間，在這條件之下，能夠達到和平的目的嗎？如果資本主義一日不消滅，和平仍然不是永久的，仍然是無保障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制度，在它的先天裏，已胚胎着戰爭。斷無例外地，每一特殊的戰爭，都有特殊的原因，這種原因是很可以研究，分析，也可以限制它的發展和遷延它的爆發的。和平可以由明確的，非常審慎的行動，積年累月的努力中獲得勝利。正如那有才幹的調度，有特效的強制與壓抑底均衡，能遷延存在於不合理的機構中底必然的崩潰一樣。這雖是不堅穩的和平，但總比不能和平的厄運要好，因爲只要戰爭能盡可能的避免，人類的痛苦也就盡可能的減少了。

蘇聯將這分析應用於我們的歷史底現階段，她的政策強調着目前的經濟世界是一個統一體，不能分離的統一體，所以每一戰爭必然影響全世界。沒有那位政治家的動聽的文詞能使一個國家離開這個統一體；沒有一種孤立政策，能保證其自身的安全的。因爲不論是在這些文詞的後面也好，或在這樣的政策之下也好，經濟的壓力是一樣地無情的發生作用。軍火貿易是無微不至的，它參加

甚至很小的衝突，然軍火商人要的是更大的戰爭。

美國這樣的被捲入世界大戰的漩渦，推促它加入戰爭的是日益增大的金融關係，甚至最後，美國駐倫敦大使打海電到美國說：經濟恐慌將動搖了整個美國的國本，除非美國的青年人跟着美國的金圓一同加入英法的戰線。事實上到了這樣的階段，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置身避免的。所以那位要我們永遠維持和平的總統，也轉過臉來，朝前走上戰爭的路了。

即那些永久中立的國家，——由於戰爭情勢的嚴重，這等國家可說是大大的減少了——也不過是比那些參戰的國家，所受戰爭的牽涉，在分量上較為輕微些吧了。李維諾夫說：一切戰爭，不管是在眼前或將來，都足使各國陷於絕域，不論牠是參戰國或中立國。我們千萬不要忘了世界大戰的教訓，世界大戰的參戰國與中立國所感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整個世界的貧乏，一切勞働層生活水準的低落，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失業的高潮使人輾轉終日，朝不保夕；人類文化的價值底消失更不要說了，某些國家甚而倒退至承受中世紀的意識遺產。——這都是大戰結束後，在這十六年來，非常清醒地感受到的。這是戰爭給與人類的結果。

所以，維護和平是蘇聯底永遠不變的政策。蘇聯不獨是爲他自身而保護和平，且爲世界而維護和平。但和平並不是由期望可以得來的；即拒絕戰鬥的人，亦得不到和平。中國可說是拒絕戰爭的，但

也就因此而得不到和平。有準備或無準備不是一種和平的保衛，沒有武裝和武裝齊備的人，同樣都去加入戰爭。在資本主義之下，想可能地防衛這局部的和平，只有着實地研究世界的形勢，然後選取一個能夠避免戰爭或減少戰爭危機的政策，盡可能地團結各方面有效的力量，來作爲這個政策的後盾。每一個人都應該爲和平而鬥爭，這再不會使你得到相反的結果的。但在情形已轉化至另一階段時，鬥爭的方法也得改變才行。

蘇聯爲和平而鬥爭，已整整十八年了。爭「和平，土地與麵包。」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口號。在戰爭的氛圍下窒息着的人民，他們對於和平的渴望，是使布爾雪維克奪得政權的原因。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第一次公開行動時，即向「正繼續戰爭的國家底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建議，應立即開始爲正義的與德謨克拉西的和平直接和議。」作爲對戰爭的一種攻擊。爲消滅未來戰爭的原因，新革命政府當即布露了英法俄三國共同締結的，重分世界的祕密條約。他們廢除了沙皇壓迫波斯和土耳其簽訂的對外壓迫的條約，同時也把俄國的軍隊從波斯撤回來。

新政府的力量，還不夠實行它的願望。協約各國——英法美——斥責布爾札維克，說他不應倡議和平，更不應同情德國，而放棄他過去的同盟。德國軍隊則更向前推進到一帶無抵抗能力的城鎮，把布爾札維克作「強盜處置。」由於托羅斯基想借助一些聰明的字彙，企圖向前敵增兵的結果，蘇

維埃國家的地位，更趨於孱弱了，他拒絕在議和的條件上簽字，但他所藉以抗議的，僅是「不戰爭也不和平」——算是對德國人民作良心上的呼籲。但德國參謀本部並未如他們所期望的，有那個可良心，事實上也不會有一個德國人會實行來拯救俄羅斯人。侵入的軍隊已深入烏克蘭，並據有烏克蘭一帶，最後提出的條件，是比原先的條件還要來得苛求。托羅斯基的呼籲，觸發了觀念論者的良心了吧；還記得當我遠在西雅圖（Seattle）的時候，牠深深地感動了我，然而，感動我的是烏克蘭的農民和工人們所蒙的不幸，所受的痛苦。至於觀念論者的姿態，卻是戰爭中底最危險的戰術。

如果說德國給布爾維克的和平只是一種給強盜的和平，那麼，同盟國家就根本不給和平給他們。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日軍在海參威登陸，英法美等國的軍隊也跟着他們的榜樣侵入西伯利亞，聯盟軍在北冰洋海岸登陸，打算搶奪俄國的北部；英國攫取了南方煤油田中心的巴庫，協約國的代理人不獨是鼓動，而且還參加在捷克斯拉夫犯入底武裝暴動，使戰爭一直向伏爾加河流域開展，指揮這些犯人進攻布爾維克政府。從東到西，到南到北，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把革命包圍了起來，帶着戰爭的鐵鎖鏈，滿懷着阻止革命的瘋狂。

但這個新國家的饑餓的人民大眾，他們跨過這個鐵環，向拒絕他們的提案的各國政府再三地不斷的呼籲和平。但在這些國家中，只有威爾遜總總例外。從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起，由美國

駐俄紅十字會會長羅平斯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同時還由海底電報跟國務部進行交涉。在這時間，俄國新政府說明願意考慮如下的幾種和平條件：如承認債務，割讓領土和管理礦產和天然富源。但是事實上倒不是跟布爾札維克用什麼方式開談判，威爾遜和協約國政府在凡爾賽召集「全俄各政黨團體」在柏連西坡羣島上舉行會議。在這建議上，早已預示了把俄國照中國的那樣瓜分成各國的勢力範圍。布爾札維克雖然未在被邀請之列，但他們也同意了這會議；可是別政府拒絕了，於是這建議終于落了空；接着是威爾遜底半官方的代表 *William Bullitt* 在一九一九年二月間的訪問莫斯科，在重壓下的蘇聯政府，已預備承認 *Bullitt* 的提案，即承認過去舊俄政府所遺下的一切財政上的債務，和割讓領土給那些準備迫訂條約後武裝佔領的列強政府。然而條約沒有簽字，也永不曾簽字，威爾遜亦拒絕接受他所派的專使的報告。布爾札維克早已覺察到，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環攻之下，落後的民族根本沒有和平可望的。中國奴隸的屈服，沒有換得和平，俄羅斯的黃金和領土，也買不到和平。獲得和平與獨立底最後的勝利的，不是由於和平的呼籲，也不是領土的割讓，而是革命紅軍在無望的環境中的努力奮鬥和那無比的勇氣。和平一點一滴地獲得着：第一，停歇戰爭，再進締結商約，然後，經過非常遲緩的長時期，才獲得外交上的承認。在每一個階段裏，新政府不斷地受到資本主義世界刺激她的測驗，他們根本不願蘇聯存在在世界上。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蘇維

埃政府迅速承認波羅的海各新立國家，鞏固他的邊境。再後，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國際大會時，蘇聯被邀了。蘇維埃代表在那裏提出了一個強化歐洲普遍和平的提案。

齊齊林說：「只要戰爭的恐怖氣氛仍然瀰漫在歐洲和全世界的時候，復興世界經濟的一切努力，都將是無效的。俄羅斯代表即欲想建議一個限制軍備底一般的規定，和支持任何具有減輕軍事負擔的提案。」蘇維埃代表重又答應承認過去的俄政府的債務，但這回他們要求蘇聯被無故干涉所受的損失與破壞底賠償權。這兩個提案既然都得不到答覆，蘇維埃俄羅斯便和德國簽訂了著名的拉伯羅條約（譯註二）從此這兩個國家間便互相廢除了一切債務，在互相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創造一切關係。蘇聯是第一個療治大戰的創傷，和在爭取和平的基礎上，跟戰敗的德國開談判。如果那時別的國家都能以此爲例，那麼，在這十三年來，歐洲的苦痛的歷史一定有大大不同了。

自日內瓦會議之後，蘇維埃爲和平的鬥爭，是以緩慢而堅實的步調跟世界各主要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爲骨幹的，這種關係，由它本身的意義上說，固然是一個安定歐洲大陸的因素。但是因爲許多國家存着嫉視的心裏，常有假借某種理由，根據偽造證件和用挑撥行爲以致於發生侵害蘇聯駐外

譯註 1

Rapallo Agreement 是大戰後，蘇聯和德國間互相訂立的條約，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在拉伯羅簽字，內容大概是德國承認蘇聯政府，德蘇互相保障各該國經濟利益。

公使和領事的那種外交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所以那時蘇聯和外國的正常關係常在動搖不定之中。（註一）要是在過去，對別的國家這樣的攻擊，早成了戰爭的導火線了的，蘇聯對付這樣的攻擊，只是更堅定地和小國和被壓迫國家擴展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第一和土耳其，在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簽定，接着是德國、立陶宛、波斯和拉脫維亞、阿富汗和其他國家。不像過去的同盟和約，這些條約都是非排外的。一切的國家可以簽訂這樣的條約。

到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當國聯軍縮籌備會在倫敦召開第四次常會的時候，新被邀請出席的蘇維埃代表提議解除準備，這樣震驚了全世界。遠在五年前，蘇聯外交部長齊齊林曾在日內瓦提出同樣的提案，但他的提案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過後也就遺忘了。可是，一九二七年李維諾夫的提案，是由一個在這幾年裏已充分的證明了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安定了的國家提出來的。尤其這提案的提出，正當世界人民大眾，因對於這不斷地循環着但毫無結果的會議的懷疑，已開始明白了這是歐洲各國政府，意欲蒙蔽人民，想在人民的面前掩飾大戰後的混亂狀態的勾當。

註一

譬如洛桑會議上伏洛夫斯基的被刺，和英國外交部的最後通牒相國聯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中，蘇聯大

使被侵害，接着還有使館幾個中國職員被執刑，一九二七年五月倫敦商業代辦被侵害，和偽造齊齊諾

維夫破二英國選舉的信。這些都是拳拳大者，總之這些事使做一個蘇聯駐外使館成爲最危險的職務。

李維諾夫用要求實際解除軍備這提案來折穿那堂皇而莊嚴的「西洋鏡」。他表示蘇維埃政府無日不準備接受完全解除軍備，或者依某種百分率縮減，只要這里別的國家能夠同樣的接受。在世界人民大眾底面前，他一次三番的提出這個要求，但軍國主義者那種事事推諉挨延的態度，已明顯地顯示着：即使是縮減軍備，也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真真具有一點誠意，軍縮會議自身實在比一張舊的軍備競爭假面具還要小。

在軍備正日益增強的時候，蘇聯只有切實地擴展不侵犯條約的領域，開始廣泛地播散為國際上所同意接受的「侵略國的定義」。目的在動員全世界的公意，來反對戰爭的挑撥者。在資本主義各主要國中，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李維諾夫所下的界說，因為侵略國的定義，是指凡驅兵入任何別人國內的任一國家都是侵略者，十二個或比十二個以上的弱小國家都簽字承認了；蘇聯也便成了弱小國家權利的堡壘。在他加入國聯之後，更逐漸發展了這形勢。

蘇聯對於和平的願望，尤其是牠在避免戰爭的策略中底智慧，立刻遭逢了遠東不斷緊張的情勢的測驗。日本的侵略滿洲，已經被全世界公認為日本破壞了她所簽訂的一切條約——國聯盟約，華府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日本把牠的軍隊運到蘇維埃的邊境，武裝的軍隊更不時的越過國界劫掠，殘害蘇維埃邊境的守軍和農民。糾紛底最嚴重的因素，是在蘇維埃政府的那貫穿滿洲，為通

海參威捷徑的中東鐵路底所有權。由日人所收買的匪軍的襲擊，和日本軍部的隨意逮捕，使蘇維埃的鐵路職工陷於比在戰爭時期裏還要艱苦的命運。在蘇維埃該路路局主任的報告裏面，公布了武裝襲擊的案件超過三千以上，這些事變的結果，即被謀殺致死的也有五十多人，受傷的也有八百二十五人，鐵路幹綫被毀壞的長度達四其羅米達，被毀的客貨車更在數百以上。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蘇聯把四份日本祕密文件公佈了，這裏討論着他們攫奪鐵路的必要，暴露了事實的真相，使世人都知道：一切襲擊行動都由日本軍閥所一手發動的。

蘇聯對這些挑釁行爲的答覆，不是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強硬，早爲『保護其利益和人民』發動了戰爭；也不像中國那種無抵抗的殖民地國家無限制的屈服。蘇聯在遠東邊界全綫建築了堅強的砲壘，那當然是國防性質的；另一方面，她爲消弭衝突的根源把中東路以投資價五分之一的價格出售給『滿洲國』。那時我在東京，出售的事正在進行，我是目睹着這緊張的情勢的消退的。『到這時候，日本的人民大眾相信了我們所以要求和平的目的。在幾個月以前，他們的軍閥是很可以煽動他們來進攻我們的。』一位蘇維埃的外交家這樣告訴我，恰如共產黨員通常在政府與人民間所提示的那樣。但日本軍閥已安排了更進一步的挑撥：它企圖購買蘇維埃的北庫頁。蘇聯爲着要暫時減少情勢的緊張起見，也準備在相當的價格之下，將北庫頁出讓。

蘇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間加入國聯。這行動震驚了蘇聯的友人與敵人。其實，這不過是要改變歐洲的情勢，要使蘇聯的能力高速度的成長起來。底邏輯的結論吧了。蘇聯對於國聯的觀察，決不受感情的控制，而只憑事實去分析。國聯是什麼？國聯能給人什麼？國聯不是一塊有疆界的領土，不是一個國度，也不是一個超自然的太上國家（Superpower）；但至少，國聯是一種意識或一個公式，由這種意識或公式，也許會在某一個時候，像不可思議的奇蹟一樣地，爲人們帶來和平。國聯是一個外交的機構，一些國家通過這手段來互相週旋和互相締結協定。它的政策，是由參加在內的各國去決定，由那些國家底相對的力量和勇氣去決定。

在理想主義的「空調」的掩護之下，國聯的目的改變了。因爲這種「空調」在各個時期，使參加進去的國家都得藉國聯的名義去掩飾自己的行爲。威爾遜倡議組織國聯，是作爲在民族基礎上底歐洲的組織；但他的計劃，也隱含有「海洋自由」的意思。所謂「海洋自由」對於英國，意思就是要用美國的金圓來代替不列顛的艦隊去統治世界；同時要有一個在民族基礎上的歐洲，也使克里孟梭所不能安然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德國在歐洲有二倍於法國的人民，法國的利益正需要把德國分裂爲許多小數的民族單位。把美國除外的國聯，事實上已成爲英法兩國爭奪歐洲霸權的決鬥場，法國希望能夠斷然的將德國擊碎，把它割得四分五裂，而英國對於德國的發展要求，卻願意

稍爲予以援助，由此造成對抗法國底均衡的勢力。另一方面，華爾街又實行道威斯和楊格計劃來援助英國，決定貶低自己的要求來相就『德國的償付能力』，那爲的是他們要的償付數目，是德國資本主義能夠從他們的工業工人那裏榨出來，可是不能太多以致發生革命的危險。德國加入國聯的時候，曾被譽爲『歐洲聯邦的完成』，這是什麼說呢？這就是說世界資本主義有着這樣的企圖，他們爲撫慰德國在凡爾賽條約中所受的損失，叫她向東進攻蘇聯。

但道威斯猜錯了；世界經濟恐慌粉碎了德國的『償付能力』和等待的能耐。日本和德國都退出了國聯，用她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擴展她們底勢力。戰爭的危險增加了，而聯盟本身，由於他們的（日德）脫退，也成了不利於戰爭的幾個強國的組織。史太林說過：『聯盟可以成爲對戰爭傾向的一個阻力。』它還包含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強盜國家，和根基於凡爾賽條約的一些小國。蘇聯承認德國所受種種的不公正，但不承認爲實行其要求的戰爭權利。李維諾夫說：『由戰爭造成的不公正，決不能由新的戰爭來矯正，新的戰爭只有造成更不公正的事實。』蘇聯加入國聯，是要加強國聯的力量，抵抗德國日本和現在的意大利的戰爭企圖，阻住世界火藥庫的爆發。她所以暫時維持強盜國家剝削弱小國家的現狀，也爲的在增加世界和平的機會。

蘇聯爲和平不斷的努力，她一方面和法國和捷克簽訂互助公約，另一方面她以日益增加的紅

軍力量作爲歐洲現狀的保障。她聯絡那些『強盜國家』共同封鎖意大利，自己則首先贊同制裁。不過蘇聯的和平政策是現實的辯證的：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的人們，爲了在煤油制裁還沒有通過的時候，蘇聯繼續向意大利輸出這商品（註二）感到不解，這是什麼理由。那是因爲蘇聯看得很清楚：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爲，和國際貿易對戰爭的資助，是沒有更高的成規能夠制止的。蘇聯還根據布來斯·李托夫斯克的經驗，深深地知道理想主義者的做腔對抗軍部是一種危險的戰術。而且那時一成不變的單獨行動，可以使蘇聯因歐洲的分立，反而受到法西斯的進攻，即個別的立場，亦足以促成歐洲的破裂的。只有實力的對抗，才能制止冒險的法西主義挑撥戰爭的行爲——這裏的實力，是歐洲通過國聯組織起來的實力。蘇聯負起組織這力量的使命，她用簽訂安全公約和擴大安全公約範圍的方法完成她的使命。（註三）因爲現狀果然是不好，但戰爭是更壞。

爲增強這力量，蘇聯便加緊的增加她的紅軍，也只有紅軍才是她真正可靠的實力。英國和法國

註二

當時雖美國輸出增加占首位，總額是繳減了的。增加是美國的輸出。

註三

蘇聯首先企圖訂立一個『東方洛加諾』，一個反侵略者的公約，但因爲波蘭和德國的拒絕，沒有得到成功。蘇聯的政策，還是擴展安全公約到一切國家，即德國和波蘭也在內，就是現在的公約本質上也不

是排外的。

是利益衝突的兩個陣營，這一點共產黨看得很清楚，但在這兩個國家的內部，有着她們人民大眾的堅強的力量支援蘇聯和蘇聯底集體安全的政策，抵抗侵略者。而在另一方面，同樣有着幫助納粹德國去掠奪俄維斯的堅強的反動力量。這力量將以現成一切的破壞手段來毀滅世界。因此，現在在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內，反對世界大戰的鬥爭，成爲必需和反法西斯蒂的鬥爭配合起來。

這一戰爭如果爆發的話，不僅僅是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它將激起全世界的階級鬥爭，也許開頭不如此，但每個國家歸結必然如此。關於這一點，紅軍是全盤明白了的。他們的忠誠，不只是獻給俄羅斯，而是貢獻給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貢獻給地球上有些聯邦或快要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任何地方。所以，除非蘇聯干涉別的國家，對別的國家進行侵略，即發動戰爭或干涉內政，紅軍是永遠忠誠於它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告訴他們，這種干涉的戰爭只有阻礙別的國家裏面的革命的。發展；干涉會使工人在愛國主義的欺騙之下，轉到他們自己國內的資本家那裏去的事實。上若使世界大戰一開始的話，紅軍就應一只手裏抱着槍，另一只手裏捏着小冊子進軍的。他們有分派千千萬萬小冊子的義務，以全體勞動者的兄弟情誼，來號召別的國家裏的勞動者；在戰爭當中，他們也有更有效的方法。因爲世界上最富有政治意識的，最機械化的軍隊，受過多種語言的訓練的是紅軍。所以，他們也是最易於指揮，最適於在敵人底領域上作遊擊戰的軍隊。這就是說，紅軍是可以把犧牲減至

最低限度而獲得效果的。

我還記得很清楚，在一九三三年日蘇關係緊張時候，在莫斯科和一位蘇聯高級官員討論日本的一席話，這在我們很明白，蘇聯有的是優越的空軍，蘇聯空軍到東京，更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那時望着莫斯科河上的冰，討論着戰爭可能的前途。

他很慢地說：『日本人這優良的勤懇的人民，轟炸他們太可惜了。你想一個共產黨員會炸燬勞苦人民的城鎮的嗎？……如果在東方我們和日本間真的發生戰爭，那我們可以毫無猶豫的說，這會是資本主義日本的終結。革命將在『滿洲國』發端，向南通過中國，以至全亞洲都是共產黨的，這時候，世界上每一個帝國主義會攻擊它，但到最後他們本國的叛亂，會了結這一個進攻。那時世界革命成功了，可是留下的世界，也一定不堪設想了。這將犧牲一千萬勞苦人民的生命，全部亞洲將陷於天災和疫癘的危難之中。然而，如果和平能維持的話，世界革命的完成，可以不至這樣的苦難。』

『蘇聯無須乎改變世界的國外戰爭，』曼奴意斯基在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席上這樣說過。蘇聯爲和平而鬥爭，這不是暫時的口號，世界和平一年，蘇聯加強一年，不僅被作爲一個國家，她被作爲一個世界所追隨的光輝的榜樣。隨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她激起着科學家，工程師和藝術家們；她吸取千百萬忠誠於資本主義的士兵。世界和平一年——堅實地發展着的蘇聯即有利一些——世

界上國際關係的力量即更趨於蘇維埃世界的一面，也即更不利於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繁育戰爭，但世界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在世界上不再是不可超越的。假使爲和平的鬥爭能夠一年年一月月的堅持下去，牽制延緩和阻止那種推動戰爭的力量，那末資本主義本身可以先在煽動戰爭的國家，一個個崩潰，這樣就根本的阻止了世界戰爭。或者世界戰爭即使爆發了的話，也可以由那些不再能忍受戰爭痛苦的人民的反抗，縮短這一戰爭的時期。

這是存在於蘇聯爲和平鬥爭的後面的希望。但不管是在戰爭或和平中，蘇聯的日益增長的力量與繁榮，即二個五年計劃所完成的結果，確保着這個方針，而是全世界未來的保證，現在唯一的問題，在被無辜的人民大眾懂得和學得之前，這鬥爭將是怎樣的艱苦和堅持——即戰爭也如此。不過沒有那樣東西得能阻住他們力量在全世界的擴展，他們有的是力量，知識和一顆關心世界的良心。

第九章 工廠全體

最近在莫斯科，鑛工，汽車工人，紡織工人，工程師和車床工人來慶祝生產成績和領受爲增加了國家財富的獎賞的一切大會上，流行着一句話，那在資本主義之下所沒有的，因爲那裏根本就沒有這句話所表現的實際。甚至在蘇聯，這句話的被廣泛的應用，也是最近的事，可說是一種新的增長着的實際底自然表露。

『我以我們工廠全體敬候你。』『我們工廠全體保證它絕對的合作。』

工廠全體不是工場管理，也不是工會，公會或工廠的黨組織。這一切組織，都只是它底一部份，在工廠全體的生活，都有它們固定的任務。工廠全體是工作中負各種任務的一切人的總和，是蘇維埃社會的基本的生活細胞。

工廠全體的概念還沒有怎樣的固定和普遍。它以十八年來生產工具的公有爲根據。這是經濟實體；它才切實地決定人們的心靈，和決定他們社會生活的形式。一個工人之於機械，不是做它底奴隸，便是它底主人；在資本主義下，他是它底奴隸。在蘇聯，他知道自己是機械的主人，但不是單獨的

主人。工人負有主宰機械和從它得到現代技術能力所能給的一切的義務。生產物屬於他和他的切同伴。通過他在工廠中的工作，他聯結着社會全體。這恢復了環繞於生產過程的社會生活底固有的統一，這一統一，在資本主義下由於生產工具的私有被二分了的。而現在，現代機械比古代工具更有力了，所以這裏的社會生活的統一，也因之更高度更大規模的了。

一個曾經在一家蘇維埃工廠工作過幾年的美國人對我說過如下的話，他說蘇維埃工廠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工人對管理的關係，二是工廠裏的文化生活。『那裏管理員常問工人對於一切問題的意見；管理員和工人的關係可說二個朋友，不是什麼上司。在美國我的工廠正相反，工廠在工人是一個找尋生活的地方，也是爭生活的地方。而這裏它是你的俱樂部，你的文化中心，緊結你生活的東西。』

工廠全體的生活主要的可以分三方面：即生產，工人生活，和對於國家其餘各方面的關係。每一方面都有它自己的管轄範圍。廠長和廠長以下的一切人負責組織生產的事務。工會負責組織工人生活，包括工廠環境，保險，教育和社會活動等類。黨組織則負責工人的政治訓練，擴大他對於國家政策，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的工場底任務的認識。

這三者一起——即廠長，工會組織者和黨書記構成一個「三角」，為工場的最高機關。每一方

面都有固定的任務；凡逢到有關於工場基本的問題時，他們三者則共同討論解決。廠長的命令在生產上一定得無條件的執行，他負有廠內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責任。不過，不論那個廠長他不能跟黨和工會組織合作的話，即有被革除的可能。曾經有一個俄羅斯工人說過如下的話：『假使工廠全體不歡迎某個廠長的話，那你可以一定看到，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會撤換他的。』（註一）

工人和管理之間的關係，有一個美國工人對我講過；他說：『工廠裏工作的全體沒有一個不對生產有興趣。每一個都熱烈討論下個月的計劃。管理員召集一個會，告訴我們管理方面要我們下個月生產二千具碾磨器。我們將怎樣做呢？我們詳細地討論；我們每個人都報告他自己能做的分量。這樣加起來得到了四千的數目。於是管理員到管理方面報告提高計劃到四千具。假使我們完成或超出了我們的計劃，我們便能獲得獎賞，再根據每人所做的分量來分這獎賞。在分配上，爲幫助我們估計，每個人的完成的程度，工場統計員每月給我們每一個工人的工作表，裏面包括生產數，損壞數，工作勤惰考察和機械損壞等幾項。自然我們分配獎賞上，總是給最好的工人最多，因爲有他才能使全體獲得獎賞。工廠方面獎勵獲勝的工人小組，除了給獎賞之外，還給與一面紅旗，這樣的旗，到蘇聯工廠去參觀的人，都可以看見許許多多插在車床上飄動着的。最好的工廠獲得全國的獎賞和榮譽，因爲每個人和道愈是生產得多，愈是獲得的多。』

要是工廠裏管理方面和工會間發生了衝突的話，那有許多方法來解決。通常由工場中的黨組織，通過管理方面和工會的方面較大組織的共同討論來解決的。比較嚴重的糾紛則由工場委員會訴諸它所屬工會的總部，或者直接訴諸全聯工會會議，它可以有政府權力來維護工人的權利。至於個別糾紛事件，通常直接訴諸法庭。這些鬥爭也許消耗時間，但每個人都得信服他們案件的解決，很少有不滿意的。尼其尼汽車工廠廠主任在一九三二年被撤調，可是在撤換之前是經過了工會的詳細調查的，那時爭執的是由外國工人發動的關於生活條件的鬥爭。另外我還知道一件事，有一個工程師，他在廠內報紙嚴厲地批評了工場管理員，後來爲了他理由不充分激起了不滿。終於因工廠委員會解決不了他的案子，他提到城市黨組織去，結果經過調查之後，恢復了他的職務，和補給這時期內的工資。廠長也常有被譴責的。而且在廠內報紙的首要地位上，登載對廠長的譴責理由，正如一個工人所說的，這樣『可使廠長知道他不是上帝』。

更通常的衝突是地方的管理當局和工會聯合壓迫托辣斯中央機關的行動。工場委員會爲工人的衛生，要求某種安全設備和新的建築。而管理員則答覆他的預算不允許有這樣的設施。但是他不反對工場委員會儘可能的通過工會向中央機關提出，因爲中央機關能補足這裏的預算。同時在管理員本身也無需要反對改進，倒反通過他的工作能力維持工人的生產熱情，能夠得到更好的榮

譽和地位，事實上他的利益在於滿足他們的要求的一面。

至於工人的一面，他們也不希望有一個軟弱無能的上司。他們倒要有一個能很有效率地組織他們生產的上司。他們知道他們的繁榮直接的依存於他們工廠的成功。他們自己願意請求撤換不謹慎的工人，甚至逐出那些有偷竊和一再破壞生產行為的工人。他們認為一個工人，如果沒有理由，或沒有訓練好替他的人轉換工廠是不妥當的。不過如果衛生上或家庭必要如此的話，或者所在工廠不能儘量用他的技能或給以發展機會的話，那他得請求和得到「解放」的。但僅因為別家工廠比較組織得好，能給他更多工資和更好條件的理由而轉換的話，那是要被認為胆怯的勾當。

『許多人已替這工廠做了很多。他為什麼應得要這樣做呢？他走必然使我們餘下的更困難；要我們一定得插准新人來。為什麼他應該因為覺得這裏困難，就跑到別處別人做好了的地方去呢？』

生產其實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份。環繞在共同公有生產這中心的，建築着工人整個的生活。工人通過他的工廠全體，負起公民的責任和獲得公民的權利；這是基本組織。它選舉代表到地方蘇維埃去。通過工廠委員會，他獲得社會保險，教育機會，旅行、體育和休假等等權利，和參與各種各樣自動的社會活動，從政府委任的工作起至降落傘的競賽止。

我們現在舉一個工廠全體中的內部組織，莫斯科紅色無產階級工場的來作例。工場中最小的

單位是生產小組，它可以包括三十至四十個工人。那個工場中共有一百五十個小組，在一個工廠委員會的統轄之下，這些小組不但競爭生產，得到紅旗和獎金的鼓勵，同時他們還作社會工作的競賽。譬如霍米雅可夫的小組有二十九個工人，他們每個人都担負某種社會工作。有幾個查對生產式樣和另件的標準；有幾個管理社會保險。三個編壁報，在壁報上批評工人和工場的缺點。有一個中年的工人，不積極作社會工作，小組全體認爲是很大的恥辱，於是設法安置他某些事情來引起他的興趣。他們後來選他做赤色互助會支部的主席；在一個月之內，他簽得了大批會員，並且還有廣泛的積極的推展。

小組決定「突擊隊」的名單，即能保持殊優先權利的優勝工人；不過這名單經小組決定之後，還須經工會的查勘，也許名單所包含的過多，或者有某些不妥當的地方。其他有許多問題也由小組討論，譬如工人是否需要一個月內的療養假期這問題，小組允許討論，然後由它向工場委員會提出意見，它有一定地方的分配，而且還能夠爭得更多些。機械上的安全設備，提高每個工作者的技術知識，救濟窮苦工人等這些事情，也都以小組的討論開頭，然後向工會提出他們的意見。工會本身全體則積極地推進新式膳廳的建成，日間托兒所和互濟組織的擴展——這一切都以小組的要求開頭，而這一切工作都民主地由各級人員發動，組織，執行和管理的。

工廠生活中更有一方面不可忽略的，便是它的文化活動。教育機會，從蘇維埃政權開頭時候，爲新到的農民開設的讀寫班起，到現在已發展爲大學和科學研究機關了，一個工人對我說：『你到你的工廠去學習，再進大學。你可信？我做的工廠正在訓練我做工程師』這句話。工作之後，你可以洗一個熱水澡，到圖書館或滑冰室去看看書或玩一下。在吃飯時候，常有藝術家和歌唱家從戲院到我們那兒來唱給我們聽。還有有名的作家來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著作。假使你要寫作或演戲的話，你可以加入戲劇社或文藝會。或者你可以在某些時候離開工廠進戲院和報館做事，做了些時候，得再回到你的工廠裏去。』

蘇維埃工人在他工廠中所感到的所有意識：我在我底寄女杜西亞那裏得到最明確的說明，她在莫斯科附近的大工廠做工。有一次，她患感冒症好了之後，我陪她回到她工廠去，正當我們走到工場，她突然驚奇起來，她發現了她在家裏二星期前所沒有的東西，感到了非常的快樂。她一定要我去參觀和稱贊她做的那個工廠實驗室。電力工場，飯堂和那個偌大的工人俱樂部；她指給我看工場間通到公園和研究室的那條甬道。我即刻意識到杜西亞真的在想念她的工廠。

她的選在這個特殊工廠工作的理由，倒不是爲的工資，她選中它，爲的它很有名譽，爲的它是教育和社會的中心，這裏有一個非常堅強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第一流的大學。這使她可能一

方面勞動，一方面有非常圓滿的生活。她的工作時間，僅有六小時，但她在工廠周圍和工廠中的時候，通常在十二小時以上。她在開始工作前半小時到廠，先在「紅角」看報，或者其他女孩子們討論政治工作進程；她在晚上常因參加展覽會，上德文班或音樂會等的緣故，很晚才得回家，或者因出席什麼大集會的緣故，深夜才得到家。

在杜西亞認為一定要而且一定得要做到的，就是每一個人應該參與三種積極的活動：一生產工作，只有做這工作的才有權利分享國家共同生產的東西；二自動的社會工作，這是聯結整個社會機體的鏈子；和增強個人能力的學習。除這工作之外，三是體育。這樣多方面的生活，杜西亞在她工廠中過着的就是。

學習的東西一年年不同的。除了她選定的物理學、德文和政治科學之外，各種特殊的運動常要她做特別的研究。譬如她參加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會發動所有它的團員作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歷史的研究的。有一年就是「技術合格」的測驗，爲的是由此可以提高全國一切工人的技術。杜西亞被決定了技術上合格的，那是經過一個工程師委員會到她實驗室去考驗的，這一委員會依其工作的需要，常個別的跟工人討論各種特殊科目。她化幾個月研究這許多課目，一個義務教員指導她；這位義務教員是這工場裏的一個工程師，他認定幫助幾個女孩子研究，算是他的社會工作。杜西亞說：

『這整個實驗室像一個大學，六個鐘頭的工作，猶如我們專題研究的實習。當女孩子們在樓梯上碰到的時候，她們常問你可曾演出這一個化學公式。』

杜西亞像其多數同伴一樣，也做社會工作。杜西亞的社會工作，便是工廠中各工場青年們底十二個時事研究會的組織。她很得意，因為她所負的工作做得很好。沒有其他社會工作比杜西亞的更吃重的了。有一個女孩子組織一個航空傘跳躍隊，另一個做組織戲劇團的活動，第三個幫助設計旅行事務。社會工作不是一個人『替別人』做的什麼事情；這是他自己興趣的擴展，也是他自己所最歡喜做的某種社會組織活動。這種的社會工作一方面於社會有價值，同時也是參加政府工作的準備，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參與了政府的理由：政府即從這些自願的社會工作建起來的。譬如一個人做工會會計做得好，表現了他有理財能力的話，那他可以升做城市稅局的副主任，或者兼做。再譬如有一個女人，她在組織工廠日間托兒所上表現得非常熱心和有效率的話，那她就可以當城市兒童局之類的主任。

在蘇聯這是走到政治上去的一條正常的路。我把格里勃柯伐來作例，在十年前她是一個年輕的不識字的農僕。為想改善她自己，她在伏爾加河兩岸作碼頭工人，這樣她總算參加了公共工作，正如她想的，這是『通至生活各方面去的大道。』沿着河往下跑，她到了一家紡織廠，進了這廠做一個

練習工人。這裏她得到教育和發展的機會了。她學習讀和寫，上技術班，成了這廠的一個積極份子。再向前，她得選擇她的專門工作了。這裏有二個可能前途：一個經過技術訓練後，占一個工廠中較高的職位；或者通過社會工作和政治訓練，在政府中占一個地位。格里柯勃伐選了後面一條路；她自動的擔負了工廠檢查的工作，後來她同伴們選了她做兩年訓練班的學員，準備做職業的工廠檢查員。現在她是正式公務員了，當了城市檢查處的主任。像格里勃柯伐這樣的情形，蘇聯有着千萬萬人同樣地經過了的。這是工廠生活和國家公共活動間典型的關係。

大工廠的生活是繼續不斷的。正如它底生產活動一天三班換着，同樣它底社會生活也差不多一天二十四小時繼續不斷着。假使有人有機會在早上六點三十分到莫斯科史太林大汽車工廠去的話，他可以看見第四十一號日間托兒所，那裏開始着白天的生活。在工作前母親們帶着孩子到托兒所那兒去。每個孩子進去時都經過迅速的疾病檢驗；假使檢驗出有病的話，母親就得停止工作照顧她的孩子或送醫院。假使生了新小孩的話，母親可以每三小時工作後有一小時看顧她的孩子。這種日間托兒所，猶如其他國家的學校，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事業的。不過教育是強迫的，日間托兒所則不是強迫的。在蘇聯國外流行的那種形容蘇聯政府強迫母親交出孩子的圖畫，在蘇聯人民看來是莫大的笑話。蘇聯母親把托兒所看作使她能從看顧孩子中留出時間作工作的莫大的便利。看

作對她孩子身體作科學報告的唯一可靠的機關那裏保姆們能夠以適當的方法和最大的努力幫助她。她們不但要求日間托兒所，同時要求它底質的改善。假使工廠不能提出相當的資金擴大和改善它底托兒所的話，那那些勞動婦女們一定會向廠長提出要求的。

大概那些母親們離開托兒所的時候，工場內新聞辦公處便開始忙起來了。六千份莫斯科日報八萬五千份四百的工場新聞「追越」在八點鐘或九點鐘一定得分給各工場的訂報人。工場新聞充滿着五萬五千個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它組織生產，質量競賽，合作商店，俱樂部，學校，日間托兒所，住屋改良等等的突擊工作；它也登載工人們對於上面各方面的反對意見；這是這工廠幾萬工人互相構通的中介物。

在汽車工廠的大工場中間，有着一塊不大的廣場，廣場中間有一所大飯堂和一所中央療養處。中央療養處由莫斯科衛生局直接辦理，不過和工廠全體也有着密切的聯絡。每一個工場都有一間小藥房，藥房裏的名牌上記着每個工人的康健狀況，藥房裏有一個醫師，一個助手和統計員，經常的幫助他們做衛生工作，和留心它所屬工場的工人的衛生狀況。假使需要特殊的診察的話，那工人們使到中央療養處去就醫，那裏有五百個醫藥人員，包括各種疾病的專門家。這療養處有一種有趣的地方，即它和這工廠的廚房有直接聯絡，為工人的康健，療養處醫師可以指定廚房給某種食品，不

另取費。

這並不是對體力勞動者的什麼感情作用，使蘇維埃的一切機關都集中在工廠周圍。相反的，這是自然地依據於作爲所有者創造者，和享受者底人的統一，它在社會主義下替代了資本主義對人的區分的。甚至在資本主義之下，人們在創造和主宰中也感到一種深刻的人的快樂，而這裏人對世界的主宰，可因機械的應用擴大而深化。但是資本主義根本上就打消了這樣的快樂。有一次一個管起重機的工人告訴我說，當他高高地坐在那裏拖起載貨時，他看這樣的迅速而有力，他自己感到「像一個希臘的巨人和古代的神。」可是他突然想到起重機於他一無所與，只是每天早上對了這架機器，像主人那樣的要停要開，他感到自己從上帝一跌而爲奴隸了。

在資本主義下，人在生產中的結合，由於利益的衝突永遠起着分裂。他們向別處找尋真正的生活，每個人都抱住了世界的一隅，建起他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下，這個結合被無數相互間的利益強化着。成爲整個政治社會生活堅實地建築着的基礎。生活變得統一了，從工人到管理員，科學家和藝術家，沒有不可統一的。工人研究，就成爲一個工程師；工人在工廠委員會中積極從事發明，就成爲一個科學家；他於戲劇有天才的話，得成爲一個演劇家，他也可以致力於社會工作，在政府中提高他的地位。這樣興趣，無論那一種都可以成爲職業的，使他離開工廠，過一種更廣泛的或更專門的生活。不

過工廠還是社會的搖籃，不是在事實上，便在意識上以工廠爲生活的出發點，也常以工廠爲其歸宿處。

第十章 一個大陸的墾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百個割打兩用機工人在莫斯科跟黨和政府領袖們開會，工人們爲了已得的勝利和更光明的前途滿懷了無限的快樂，會上二百個工人從內心吐出了種種熱情的話。這裏我們聽到了一句對比了過去的非常動人的話。那是說：

『我們是農民的孩子們和女兒們——要是這裏沒有蘇維埃政權，沒有列寧史太林的黨的話，那我們的命運將是富農的奴隸，或者陷在小農經營的泥坑裏，有的只是不見天日的窮困。』

這些話說明了蘇維埃農民感受了在短時間的一種偉大的變更，而且爲變更得太清楚的緣故，過去的一切在三十歲左右的人們心中還清楚地存在着。割打兩用機工人卡普司太說過如下的話：『當我十四歲時在沙皇治下做雇農的時候，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政府的領袖，從未看見過我替他工作着的上司，……我也從未希望過要生活得這樣的幸福，這樣的快樂。』

五年以前卡普司太還是一個不熟練的工人，但也不俱卡普司太一個，差不多都是這樣。在行着小農經營的落後的俄羅斯，除了不熟練的工人，更有什麼呢？那裏十五年以前，耕作機被當作一怪東

西一拿石子來丟的啊！甚至五年以前，俄羅斯農民中間，有誰曾經看見過一架割打兩用機的呢？今天，不但千百萬農民習見了最現代的農業機械，而是幾萬人已經駕駛着這些機械，不斷的應用着這些機械，美國的私人農場也不如他們，爲的他們不利於應用這些現代機械。割打兩用機在資本主義已太好了。美國每架割打兩用機的收割面積平均爲五百七十八英畝，而蘇聯在一九三五年已是六百四十五畝。在莫斯科集會的優勝工人還小視這樣的平均數呢。他們在收穫季曾經達到一千，二千，二千五百英畝的收割面積，他們宣誓了在下次收穫前訓練起更多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工人來。

這一偉大的發展，經過得這樣的短，使他們都能回頭看過去正如昨天一樣，記得過去窮困蒙昧的日子，那時他們都做富農的奴隸，在中世紀的農場上，一步又一步的浪費他們十分之九的勞働。現在就是「農民」這一個字，也是過去了的字了。他們稱自己「集體農民」了，是集體經濟的一份子，他們工作着的大農場的所有者和享有者了。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沒有農業集體化的話，他們的奴隸和黑暗一定還得繼續着。因爲假使現代機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應用於俄羅斯的話，那也僅是少數成功的農民可有這樣的生產工具。使這些少數人隨千百萬人的窮困化暴發起來——直到他們自己反被城市銀行剝削爲止，正如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民一樣。

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三年的幾年，在人類歷史中將是世界農業史的轉換點。這幾年中沒有旁的

事情值得同樣的注意——不是國際聯盟的鬥爭，也不是美國的新政，更不是世界恐慌，這僅是無數恐慌中更兇惡的再來一次罷了。就是中國蘇維埃的升起和中歐的轉向法西斯主義，在將來歷史上的篇幅也不若農業集體化的可占得多，要知農業集體化是幾世紀人類夢想的實現，獲得了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保障。

土地上的保障！保障了水旱災的襲擊，保障了土地抵押，自然變動，人類剝削所加於農民身上的打擊，過去為獲得這些部份的安全，而且不是為他們自己，為了他們的孩子們，不知多少人鬥爭過死了。美國的家庭為了可固占有土地而得安全起見，他們寧可拋棄在定住地方的幸福，去墾荒住木屋過活。可是結果還是受災或押絕，這說明了在土地私有財產基礎上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市場衰落，土地在賦稅壓迫之下奪去了。但今天蘇維埃的農民，不但得到了賦稅，抵押和市場打擊之下的安全，而且得到對抗水旱災的安全。農業在現代機械和勞働分工基礎之上工業化了。由於「天意」的歉收，因耕作技術的改進，穀物保障，和耕作的互助已減少到最低數了，集體農場的管理是民主地組織了的；大會不但選舉管理員，還決定耕作的計劃和工作的分配。所以土地上的安全和自由的創造同時存在的。

蘇聯一切耕作技術落後的農民層中間，都有了這樣的變更。十年前俄羅斯的中央產穀區域，每

三架自製的木犁中間僅有一架鉄犁。三分之一的農民沒有馬。只是替人家耕種了來耕種自己的土地。土地都在中世紀小農經營下被分得另另碎碎的。普通一家人家二十畝田分作十幾處，相隔到幾里以上的。科學的輪耕制和種籽選擇根本不懂得，原始的耕作方法耗盡了地力。據基爾薩諾夫區穀物收穫的研究，顯示着一般有了很大的跌落，從一八九六——一九〇五年的每畝十三布賽爾，到戰前五年爲十五布塞爾。在同地，自從集體農場在一九三〇年組織之後，由於耕作的改進，平均每畝的收穫，升至一九三〇——三三年的十七布塞爾，和一九三四——三五年的二十布塞爾。

在這驚天動地的四年中間，蘇聯從一個小經營的耕作落後的，用木犁和手鏟耕作的國家，一變而爲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農業國家。（註一）貧農和雇農開創着，共產黨員組織着推動着，政府的信用借款和機械幫助着。由於五年計劃迅速增加了農業機械的生產的緣故，使新的集體農場證明了能引起更大多數的農民體集化起來。我們知道集體化運動是受到了小農業資本家即富農的殘酷打擊的，這些人雇用勞工耕作，依着高利貸生活，或者開有小磨坊製酪店等，用了這些手段來剝削他們

註一、英國一千畝或一千以上的農場僅占全部耕作面積的百分之七·五，蘇聯在一九三五年十分之九的耕作

面積組成了農場，平均每農場有一千三百畝。

的鄰人的。(註二)

在集體化過程中，國家對農業上的貢獻和城市工人在技術上的援助，可說是決定的。從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的幾年中，蘇維埃政府對農場放出了一萬萬元貸款，作購牲畜和用具的用處，又通過耕作機站放出三萬萬元作爲購買農業機械的費用。(註三)另外還有一萬五千七百萬布塞爾的穀物放給情形比較壞的農場，給他們作食料和種籽。在共產黨的號召之下，有幾萬熟練工人，會計員，機械修理工人，教師和組織者到農業區域去幫助組織農場。最困難的時期，是從一九三二年到三年的中間那時富農怠工，加上組織得不夠，以致發生了穀物恐慌。全國食糧分配不得不相當的減少。到一九三三年的收穫成功了，總共穀物收穫達九千萬噸，算是俄羅斯空前的收穫量，再後的一九

註二

不熟悉俄羅斯農場生活的作者，常把富農和一般農民混爲一樣東西，所以集體化運動在他們看來，成爲一種對付農民的攻擊。但半世紀來俄羅斯農村問題的研究者都說及了富農。在一九三五年斯坦普尼克這樣的寫着『殺人不乏眼的殘酷』正是他們的主要的性格。一九〇四年希爾亨把富農寫作『穿着農民大衣的壓迫者。』一九一八年狄博士在俄羅斯之崩潰一書中說『在我行旅所及的地方所遇到的一切人類冤怪中，記不起比俄羅斯富農再奸猾古怪的了。』

註三

耕作機站貸出·五萬萬羅布，直接放款一·九萬萬，這些都是硬幣，可以依五角計算。

三四和一九三五年兩年，有的沒有增加，有的增加了些。這幾年的收穫的成功，使政府預算在一九三四年有了四萬三千七百萬盧布的盈餘，這些錢使用來償還過去農民集體化時所欠政府的債款，總計償還了未償債款的百分之五十三。所償的包括一九三三年前所舉的各種債項。

集體化的經濟的結果，第一是耕作面積的增加，增加了三千萬英畝，從二萬九千三百萬英畝增到了三萬二千三百萬英畝，第二是收穫量的增加，集體化後的三年比了，集體化前五年的平均數增加到十五百萬噸至二十百萬噸。（註四）甜菜耕作面積二倍於戰前或即任何過去的記錄；棉花耕種面積二倍半於戰前的或集體化前面積的數目。生畜生產在集體化開頭的幾年，遭到了很不幸的結果，但在過去三年中也飛速地趕上了，根據耕作技術的改進，肥料的增加，蘇聯農業是有更光輝的前途。

註四 集體化前的平均數為七八至十八百萬噸，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為九百萬，一九三五年近一〇

〇百萬噸。

棉花耕作面積在一九一三年為六八八，七〇〇海京脫，一九二七年為八〇二，〇〇〇，一九三三年為二〇五一，〇〇〇海京脫。

甜菜耕作面積一九一三年六四八·七〇〇，一九一七年六六五·一〇〇，一九三三年一，二，二二二

〇〇〇。

的收穫可得一年年增加起來。(註五)一九三五年末，史太林在割打兩用機工人會議上，這樣的宣稱了：『在最近的將來。在三四年之內，』我們可望有一年二十百萬至一百三十百萬噸的穀物收穫。

到一九三五年，集體農場的新形式，可說到了絕對穩定的地步了，因為至少兩年內沒有一個集體農場的份子要退出，再回歸為個人耕作；輪耕制和田場的分界也確定了。因此蘇維埃政府頒布了一條法令，准許集體農場得『永久利用土地。』今天全國進行着土地測量，記錄契紙，作永久利用的根據；鄉村裏都慶祝着這一運動，全國的人們稱頌着近幾年的偉大的變動，回憶過去大部份土地在地主手裏，佃農們在債務的奴役之下耕種着，自由的農民也爲了付稅一塊一塊的出賣。一個韃靼農民說過如下的話：『從永久的負債到永久的利用，就是我們所做下的變革。』

廢止了的邊界的驛站上，不再是沙皇的鷹和寫着的 *Each for his own* (每人爲他自己的)，而是鐮刀斧頭和『*USSR*』(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縮寫)的幾個字了。這些說明着一切土地是全國工農共同所有的；勞動農民的特別組織永久應用這些土地。所以從作爲蘇維埃

註五

這裏舉一個例，一九三五年春季在冬麥田地上播種的百分比，相對一九三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爲百分

之四十五，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夏麥田地上播種的，相對於一九三〇年的百分之三十爲百分之七十五，

其他播種，肥料，科學設計輪耕法和其他等等的應用都有了同樣的增加。

的公民而言，農民是絕對的所有者，從作爲勞動農民而言，是永久的享有者。所有和享有兩者，都民主的地組織了的；工農小集團對整個國家的關係，一部份由永久的法律決定，一部份由每年各別的規約決定，這些規約的目的，在於鼓勵生產的增加和保證勞動成果的權利。因爲土地的永久利用，和土地不再由出售，租借和抵押轉換的緣故，農民在土地得到了永久的安全，再由於農場和國家的民主組織，他們得到了自由。

然而這成爲永久享有者的，是什麼一個集團呢？『農場突擊隊員』大會通過，（註六）經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核准的章程中，認這是『勞動農民的自動組合』，他們爲的要以共同的生產工具和共同組織的勞動來建設一個集體的，也即社會的農業，爲的要從這樣的組織獲得消滅富農和一切剝削者的絕對勝利，獲得克服黑暗和貧乏的絕對勝利，也即要獲得克服個人生產小規模經營的落後性的絕對勝利，創造高度的勞動生產性，和由此保證農民全體過一種更好的生活。

『過去分別農場場員土地的界線全取消了。』

『一切耕作的牲畜，農場用具，種籽，飼料和房屋，凡是農場生產物的集體耕作上所必要的，都社

註六

這是有最好記錄的農場代表會議，他們的提議表現了最好的農場的實踐。

會化。』

『住屋，家畜，家禽和他們必要用的建築物，則不社會化，仍舊留作場員家庭的私用。』（註七）

十六歲以上的人，凡在農場上工作的都有同等的選舉資格。農場大會選舉管理人員，通過和開除場員，與國家專門家會議決定農場生產，穀物輪種和新改進等等的計劃，另外大會還決定田地留作私用的範圍。它和耕作機站訂約租用機械；耕作機站可說農業機械化的中心，它在十五英里田地內，供給他們機械和技術知識。這些站開頭都是由國家組織和投資的，不過現在也有部份由國家和機站所在地農場合作經營了的。農場對國家需要提出若干收穫物給政府，數量很低，由一個國家委員會決定多少。在耕作機站也得以穀物付租用的費用，這兩種支出總計約平均收穫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不過假使耕作機的需用程度高，因而對耕作機站支付費用大的話，對國家的提供可以減少，少到國家所收入的，即是農場對耕作機站租用機械的費用。

農場提出了這兩種支付之後，再除掉種籽和飼料。其餘的則在場員之間，依照所工作的勞動比例分配。「工作日」是分配的單位，但「工作日」也因工作的質量而不同其價值。耕作機駕駛員的工作

註七

最多得保存的一頭乳牛，十只山羊綿羊，兔和子家磅棉不限，穀棉菜和甜菜的生產區可養二十箱的蜜蜂，但專養畜生的區域，留作私用的數目可大一些。

日可比通常的兩天，晚間看守的則只能作通常工作目的四分之一。假使可能的話，工作日還以規定的勞働量爲標準，——譬如耕一畝或收割一畝——再以標準增加或減去其未完成或超過的分量。農場大會除了上面種種之外，它還決定提出部份收入，作擴展農場和公共用途如農場廚房和日間托兒所等的費用。開頭時候，有些過分熱心的農場管理員，爲急於籌集一筆基金的緣故，曾經太苛求過這一點，但現在不這樣，都有了限制了。在過去兩年中，因爲大豐收的緣故，農場除了提給政府和場員食用之外，還有很大的盈餘。盈餘的穀物得自由出售，出售不論個人或集體都可以，同樣出售給城市市場或通過鄉村合作社出售都可以。

離鐵路五十里，在北方亞麻和黑麥產地的加里寧集體農場，曾經給我看過他們的「農場計劃」，這是長長十八頁的一件文獻，很精細地訂了的一本小冊子。這是農業人民委員會頒發的一種格式，裏面由當地組織詳細填了的。在這裏面，關於加里寧農場一切，你所要知道的，如耕地面積，草地，可墾土地，園地，輪耕穀物，農場用具，耕作牲畜，牛，豬和家禽都有着記載，不但全部人員都記載着，即沒有生的都算進了的。估計每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二，但不管人口生出增加，生活程度必得相應着提高。農場計劃着供給人和牲畜的食料。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穀物，建築新房屋，開拓新土地，創造一種不斷增進的幸福生活。爲着這一目的，工作必得指定起來，儘一切可能來利用百多個身強力壯的場員們。

的勞働時間。

農場場員在他們通過這個計劃之前，他們化幾個月討論這個計劃。城市測量員幫助他們作耕田上的設計，城市土地局和蘇維埃新聞紙報告他們國家生活標準到一九三七年需得有加倍的增加。他們需要共同負起這個任務。這就是說代替黑麥的生產，需要小麥的增加，加倍他們馬食的燕麥限量，增加脂肪和肉類。他們知道國家希望他們能供給相當的亞麻，這是他們這一區內最主要的工業原料。基於這樣認識，他們計劃着下一年，企圖由增加機械利用和肥料施用的程度，和由方法的改進，不斷的增加收穫量；另外再由場員間工作的合理的分配，增加農場全體的繁榮。計劃還包括有勞働組織，耕種和收穫所需要的工作日總數，和多餘的勞働分量，這多餘的份量則計劃着建築一所新的圖書館，開闢一個運動場和體育館，或裝置電氣設備和無線電話。沒有一個人可以不做事，因為一切勞働可以被利用在各種方法中增加鄉村的繁榮和文化；一切人都得依照所作工作的質量分享共同收穫的東西。

整個計劃得到全體大會通過之後，便立刻由城市當局登記起來，成爲全國經濟計劃的一部份，同時在另一方面，它統制所由構成的許多小計劃；播種和收穫不僅是個別農民的事；而是國家生活依存着的偉大的律動。整個國家知道這個計劃，而且意識着它和農民計劃的直接關係。科學的會議

討論着害蟲和選擇種籽的問題；重工業計劃着增加耕作機的生產。政府和黨會議提出討論鄉村生活改進所要求於耕作上的許多變動的要求，譬如耕地面積和收穫的增加，或穀物比例的變動等等。農民間則有城市的、省的、和全國規模的種種集會，討論耕作和農場組織的問題。俄羅斯的冬天過去在冰雪的封鎖下是蟄伏的時期，現在則是全國農場最活躍的計劃的時期了。沒有一個偏僻的鄉村被遺忘了的；專門家的下鄉和新聞採訪隊使它和國家生活緊結了的。

當春天在南方到來的時候，幾百個報紙通訊員出發下鄉了。單新聞報一家派出十二個主幹通訊員，特約六十個當地的通訊員，集中在農場消息的採訪，農民報爲了同樣的使命，有幾架小飛機忙着做這事。新聞採訪的組織，蘇聯幾家新聞紙爲採訪農場耕作和收穫消息所組織的，超出了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最大的日報的範圍的。各省的報紙也增加它底報告員，這是世界上最廣大的記載，它有了世界大戰時更多的報告員。

這些報告員不單是觀察而已。他們的報告是計劃着幫助收穫的。我認識的一個新聞記者，曾經爲報告北高加索的收穫消息，在飛機中過了四十四天，他到過一百個農場和四十個耕作機站，他睡在田裏，沒有一天睡過床。他的報告是爲着一個具體的目的，即他到每一個農場，用他的碼尺，計算每一方碼收割地方浪費的稻穗；他比較各農場，找出那一個農場收穫最好，和其所以然的理由。然後他

和其他做同樣調查的新聞記者集會三天；他們討論這時間收穫的主要問題，和他們所見到的最好的方法。討論的結果立刻由無線電話廣佈到一切農場去，由全國報紙發表出來，給其他農民參照。每一季都有幾百種新的觀念，於農民的經驗中汲發出來，再由報紙和無線電話廣佈給其他農民。

列寧格勒工場學校主任瓦維洛夫說：『集體農場制度的基本特點，在於其能溶化新的技術方法，和發掘新的科學的經驗。』

廣大農民羣衆在科學底領導之下的組織，我們可以拿一九三四年對抗旱災的集體的鬥爭來作例，這是一個奇蹟。那年旱災的範圍差不多，歐俄全部在內，包括着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大部份的土地。有許多地方，從四月起直到收穫期止，始終沒有下過雨。要是在小農經營的時候，那農民一定得殺生畜充飢，上城市求生，便農業因此倒退幾年。可是集體農民則迅速開代表大會，宣布『對抗旱災的戰鬥。』他們利用一切物力，設計適應於各區的計劃。靠近特尼伯河的地方，他們在水灘草地上播起種來。在高加索的斜坡上，卡伯狄尼人掘了引水溝，他們這樣說：『我們有山，我們無需乎雨了。』其他農業則組織引水機引水，或者墾拓濕原和林間隙地。孩子們組織了隊伍，到田裏拔各種水草。科學家們忙着研究，考慮各區第二次種些什麼最好。報紙指示關於第二次耕作的一切問題；政府用最快速度載運必要的種籽到各地去。結果這年蘇聯獲得了和一九三三年大半年同樣的收穫，甚至在旱

災最嚴重的區域的農場，都有充分的食品和飼料，組織也加強了。

蘇維埃農民又經跳出了過去孤離的圈子了，他們站在世界的大道上了。像工人通過工廠全體一樣，農民通過集體農場，他們也過着科學藝術的生活。烏克蘭七千個農場，在過去二年中，已經建立他們的「實驗室」，那裏農民們以他們田間的生活經驗作基礎，作種種科學的實驗。在一個最完備的實驗室裏，我們可以看到有；在各種條件下生長的穀物，新穀物的標本，各種害蟲的標本，和氣候記錄的說明等等。他們告訴我：「我們和查普洛茲實驗站交換材料；參加實驗工作的有六十個人。」這些過去不久還是一無所知的掘着田的文盲，而現在已是農民科學家了，收集着種種有用的材料，幫助爭取收穫的勝利。

蘇聯農場裏，作自我表演的劇團不知有幾千百個。各種競技和體育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着。農民們學習滑冰，跳航空傘，甚至學習駕駛飛機呢。小的農場飛機，可以停在收割後的田場上的，真是常見的。東西。溶雪時空中播種，在許多地方已發展為惟一對抗旱災的手段了。

決不是說一切蘇聯農場都組織得夠好了，但效率是真的增長着；也決不是說它們都很富足了，但他們真的一些些繁榮起來了。改變得最明顯的要算在農民們的臉上。他們不再那樣的髒，那樣的一副農民的呆木頭的嘴臉，他們更活潑更熱情的了。一個蘇維埃農民對我說：「過去甚至收穫最好

的農民也只能像一只豬的過活，他多下的錢的唯一用途，就是吃酒。而現在他有一間讀書的房子，一所醫院，一所學校和實驗室了；他看報紙，他懂得世界了。他的孩子離開鄉村去建築工廠了，去開礦了，去征服北極了，成了『蘇聯的英雄』了。

每年農民寫給莫斯科農民報的信，總有二百萬封以上，像山樣的疊在幾張桌子上面。我問一位編輯，要他告訴我這些信的內容。他說：『我們這報在集體化以前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們收到的，儘是些個人艱苦和要求告訴些他們農業技術的信。裏面不外『我的稅太高！』『我怎樣留心我的牛？』等等。

而現在寫的些什麼呢？是兒童教育，婦女地位，農場戲院，和外國的經濟恐慌了。我們收到五百首弔基洛夫死的詩稿，和七十首關於高爾基號飛機出事的詩。他們解釋世界大事，不論是中國的和意大利的。你不能把他們跟十年前的他們比了。現在不再是『我的牛和馬』，他們的興趣和世界一樣的廣闊了。

在高加爾山北麓，曾經被壓迫的非俄羅斯人的一個小小的區域裏面，住着卡柏狄尼人，他們誇耀着他們創造了一個『明日之農場』。它底集體農民曾經投票表決，把收穫盈餘的大部份，捐給政府作學校基金，和爲他們自己山區建立一所『最完善的學校』。他們往莫斯科請建築師去幫助他

們設計「農場城市」這是企圖把專門耕種，和城市文化，高級學校實驗室，圖書館，有聲電影合併起來的。四十里長的一條大道橫過着整個卡柏狄尼山區。去年夏天，許多旅行的，走過了這條大道，那裏每隔五里一個，共有七個休息站。那是漆得亮亮的瓦頂的亭子，裏面裝着洗滌的盆，放着清清楚楚的拂布；桌上放着大盆的瓜，準備給行旅的解渴的。有一個老年的侍者，吃了他不要錢，他說：「這農場叫『社會主義的黎明』我們爲行旅的特別另外種了兩畝瓜呢！」

第十一章 澈底解放下的蘇聯婦女

「每個廚下婦女也得學習管理國事」

列寧

一個爲婦女的平等自由的鬥爭在全世界展開着，那是有着各種不同的方式和步調的鬥爭。最通常的方式就是那些幾十年來不斷地增大的地爲婦女種種權利鬥爭的種種組織。這些組織得到了種種勝利，我們看有些婦女得到很高的職位了，有許多權利慢慢的得到了，譬如選舉的權利，參加工業生產的權利，繼承財產的權利，離婚的權利，和婚後個人某種自由的權利等。

她們知道真的獲得了些什麼，也知道了事情的真實是什麼。有一位英國婦女，她最近告訴我說：『她爲要在她國內作一個詳細的關於婦女勞動的調查，』奮鬥了三十年，她說：『在下次大選中，她們會連已得的勞動權利被剝奪去的呢？』職業婦女的提高職位對於婦女一般的命運根本沒有

什麼改進。從克萊亞拍脫拉起至美國的女公務員，少數例外的婦女偶然地走進了統治層，然而她們並沒有比男子更多地爲一般婦女謀幸福。全世界上婦女與男子還是不平等的，還是被千百種區分束縛着。在東方落後的地方，千百萬婦女還是從屬於男子的附庸。就是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與男子真正平等。譬如美國全國婦女協會正抗爭着許多對女子的限制，就說明了這一點。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國一切大學都開放給女子，一切工業中男女雖同樣工作沒有同等的工資，沒有在各樣職業中同等發展的權利，婚姻上和兒女監護上也沒有同等的權利。甚至那些已經獲得的權利，今天也在法西斯蒂進攻之下，它正在用欺騙的口號，把婦女拖轉到中世紀的狀態中去。

所以蘇聯婦女這樣迅速的獲得了全世界所沒有的真正平等，難怪要格外的覺得驚奇。她們得到同等工作同等的報酬，一切職業都開放給婦女，她們在政府中和教育上有同樣的機會。她們對婚姻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生孩子與否，是她們的自由，她們在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上，絕對的平等，她們今天是一個人，一個十足的公民了。十八年中蘇聯婦女得到的是這樣，但在十八年前，俄羅斯的婦女，不僅受着歐洲式的壓迫，而是在過着亞洲式的女性生活的。沙皇的法律使俄羅斯婦女成爲她們丈夫的財產，「束縛着奉承他，尊重他，一切都得順從他的意旨」她們沒有權利要求分離，假使她們跑了，警察們會把她們歸還她們的丈夫。農民野蠻的習俗加重執行了這些法律。高爾基曾經寫過一

個『不貞節』的妻子的故事，她被赤裸裸的綁在載貨車上，一面被許多看的吶喝譏嘲，一面被她丈夫打得死去活來。在沙皇時代的中央亞細亞千百萬黑種的回教婦女，在黑色的面幕中過着蟄居似的生活。

蘇聯婦女這樣迅速的得到自由，那是因爲這不是婦女單獨的鬥爭的緣故。這是人類解放的一部份，在蘇聯人類由於國家生產工具，不分性別，顏色和種族的公有，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列寧夫人克羅波斯卡亞說過：『婦女的解放，不單是女共產黨員的工作，也是男黨員的工作，那正因爲爲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一種相互關聯的鬥爭。共產黨認幾世紀來婦女解放上之有所獲得，主要在於生產方法的變動。現代工廠把婦女從家長制家庭中解放出來，但又以它自己的方式奴役她們，它用婦女爲要減低工資，因此增強了兩性間的對立。經濟的奴役是一切其他不平等的基礎，是問題的關鍵，只有首先在經濟上得到自由平等，其他才能有自由。』

世界上沒有不戰鬥獲得的自由。十月革命創造了婦女在經濟上，法律上，政治上平等的基礎。國家的工業化，是使婦女和男子平等的意識地用着的武器。但在鄉村和工廠裏面，婦女還得進行克羅幾世紀來的習俗的鬥爭，這些習俗，在婦女與男子心靈上還都有殘存着的，不過這些過去的殘留，不再舊的法律，和私人工業爲獲得婦女低廉勞動的需要所支持了。

婦女第一個確立他們的自由的，是那些和男子一起參加革命的女工。我記起杜尼亞，她起先是個不識字的紗廠工人，跟丈夫孩子們和另外一家住在一間屋子裏，一起九個人。杜尼亞在革命第一年，就執管了一所日間托兒所，所以她的孩子也有住的地方。她學習讀，逐漸的在政治社會工作中提高她的地位。她曾對我說：『過去的生活沒有我們工人的份，更沒有我們婦女們的份；父親把她交給了丈夫；她做男人和工廠的奴隸。而現在我不再是誰的奴隸了。向一切生活之路開放着。』這句『生活大路』的話，我從勞動婦女那裏，不知聽到了幾千百次。

農村婦女的解放，比了城市工人的慢得多。許多做鄉村主席的婦女告訴我她們的困難處，農村男子常以「裙帶主席」嘲弄她們，『他們嘲笑她們第一次選出出席鄉村蘇維埃的女同志，笑她不會做事；但在第二次選舉中，我們選進了六個，然而現在是我們笑他們了呀！』這是一般的情形。

一九三〇年農場的廣泛的集體化，給了農村婦女解放上所必需的經濟基礎，在各處集體農場中的農場婦女，覺醒着她們獨立收入的意義。醉酒的丈夫不再得管家庭了。一個農場女人，在鎮上一面展示着買的東西，一面這樣的說：『我自己買了一件新大衣，一件上裝和一些襪，替孩子也買了些衣服，我男人把錢化在吃酒上，所以我不替他買什麼。我告訴他假使他還是吃酒，我將不客氣把他趕出去，亦不再供給他了。農場可以幫我的忙，除非他真的戒酒和能勤懇的話。我一個人，沒有他也得在

集體農場裏過下去。』從列寧格勒到海參威的三千萬農場婦女都覺醒了這樣的事實。她們沒有她們的丈夫經濟上也得過去了。

在婦女解放鬥爭中，最殘酷和血腥的，可說是中央亞細亞的婦女爲自由的鬥爭了。那兒幾世紀來蒙在黑紗裏的婦女，被當作奴隸出賣作回教徒的妻妾，那裏更有地方宗教和習俗支持男子們殺害他們犯不帶面巾的罪的妻子們，曾經有過一次這樣的事，青年們乘假期在塔希干學校裏作婦女解放的宣傳時，一個女孩子被載在貨車裏押了回去。人被亂刀砍死了，還這樣的寫了：『這是你們婦女的自由？』在中央亞細亞其他地方，發生了九件謀殺婦女的事；一句話，無論那個婦女，只要有爭正義的行動，必然的遭到當地反動者的迫害。

但中央亞細亞的婦女們，在新政府希望她們的督促之下，在新工業的鼓勵之下，還是不斷的爭取自由。犧牲者的血激起了她們作更大的鬥爭；五萬婦女在塔希干女學生的墳前集會遊行，在布哈拉，回教的聖城，當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的一天，舉行了大會和遊行，大會上，遊行中，婦女開創了回教婦女的新歷史，她們把面紗都扔了。在無可形容的極度的興奮中，她們扔去了面紗，撕碎了丟在馬路上，丟在演講的人的脚下。那時有一個女子爲了不戴面紗被殺死。於是在羣衆大會上舉行公開的審判，兇手立刻被判決執行。從那時起，婦女在神聖的布哈拉也得不帶面紗走路了。今天，一

個十二歲時被父親爲十五羅布的債務出賣的女子，叫阿比特伐的，當了烏茲倍克共和國的副主席，和烏茲倍克在莫斯科的永久以表了。

這些東方的婦女，也深深理解她們新的自由對生產工具公有的關係。

工廠的怒吼在我這裏響着。

它給予我人類活動的音節。

它給予我人類創造的偉力。

國家製絲廠裏的烏茲倍克女孩子這樣唱着。工廠把她們從回教徒的淫威下拯救了出來。另外還有更明白的喊出她們要求的歌如：

東方的花朵兒，這是時候啦！

撤去你的面紗和『拍拉揚』……

一千年來，你被鞭着，你睡在黑暗裏。

當你醒來的時候，當你從沉夢裏醒來的時候，

世界的勞動者等着你們哪！

蘇聯婦女參加工業生產和公共生活的數目已經大大地增高了。婦女在工業工人中的百分比，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每年有百分之三的增加，現在（一九三五年）已占全部工業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二了。在高級技術學校裏，有百分之三十六是女的，在醫藥學校則有百分之七十五；沒有一個教育機關，有什麼對婦女的限制。婦女參加選舉的百分數，從一九二六年全部合格婦女的百分之二十八，到一九三四年增為百分之八十三。婦女在城市蘇維埃中所占的席數，在一九二六年為百分之十六·二，到一九三四年增為百分之三二·一。在農業區域中的變動更大；鄉村蘇維埃中婦女的比例為百分之九·九，一九三四年增為百分之二六·四。在一九二六年時候，村蘇維埃主席女的僅有百分之六，而且這樣的數目，還是幾千婦女鬥爭的結果；到一九三四年，數目超過了百分之八。今天，一百萬以上的婦女管理了各種各樣的蘇維埃機關，其中包括四十萬選出的各級蘇維埃委員，四十萬地方政府人員，十一萬二千法庭中的陪審官，這是比我們的陪審員更專門些的職位，和十萬個合作社管理局的職員。

現在改名為加里寧的脫威爾城給了我們婦女在各樣工作中最完全表現。脫威爾原初是一個紡織業城市，它底人口在革命以前就包括着大部份紡織女工，這一事實說明它為什麼在今天是一個進步的城市，為什麼它得在第一等的蘇維埃城市中自誇，在它那裏婦女占了市政府中十足半數的地位。（其他城市也緊趕着，婦女通過創議和教育，依他們合法權利獲得平等。）脫威爾底兩個

最重要的女人是安娜·加里基娜，共產黨的市委祕書，算是居於城裏最高的地位了；還有一個是法奧特洛伐，她到最近保持着蘇聯最優秀織工的獎狀。其他千百個人跟着這領袖的步伐走着。

女警察麗萊曾爲捉惡黨，毫不畏懼地穿通城四週的黑暗的樹林。有一次，她押送一個因縱火燒稻田被捕的囚犯，在樹林裏受到二個同謀的襲擊，然而結果，她捉住了謀襲擊的同謀犯，押解回牢獄的不是一個，而是三個了。就在發生這事情的當夜，她在當地戲劇團的演出中，扮了一個嬌柔的女英雄的角色，穿了淡紫色的衣服，我們知道麗萊還是一個非常熱愛藝術的業餘劇人，她特別長於演嬌柔的女性角色。還有電車售票員，黑眼的喀脫雅，她是脫威爾二十七個女售票員中有最優秀成績的一個。她同時是工人大學的二年級學生，正研究着屠格涅夫和幾何學。駕駛員莫洛索夫曾寫了關於她的詩呢。

年青的男人們都稱頌着尼娜，一個十八歲的滑翔機駕駛者，她每一星期三天駕了滑翔機在空中航行着。她正常的事是在車廠裏做火車上用的窗簾。但是她底業餘的興趣則在航空俱樂部裏，她希望有一天成爲一個飛行家。查亞是一家服裝店裏最優秀的機縫工匠，也是工場委員會的主席，執管着五百六十個女工的事。餘下的時間，歡喜滑冰，曾經在五省服裝工人聯合舉行的滑冰比賽中得到第二名。馬羅西亞研究着，準備做一個醫師。陶尼亞過去是一個紡紗工人，曾經幹過很好的壁報編

輯工作，現在是一個十足的作家了。杜西亞是城裏第一個駕駛汽車的女人，孩子們老歡喜在她後面用『女汽車夫』叫着跟着。總之，脫威爾的婦女一個一個地征服了各種各樣的職業，不論普通或專門的。但不僅脫威爾，整個蘇聯的婦女是這樣的展開着。

外國人到蘇聯去的也許會看到婦女做着笨重醜態的勞動田間工作，清道和挖掘地道等工作，感到奇怪的吧。但蘇維埃的婦女還是農民這世代的婦女，她們在田裏工作。她們知道在無論那個時候，婦人都做了笨重的工作的，她們沒有得做精細的工作的呀！她們知道同等的參與勞動，在蘇聯就等於同等的參與管理各種生活。因此年輕的女孩子們，反對工程師和礦工們不要她們到地下工作，她們爭取做挖地道工作的同等權利。她們和有經驗的男人們一起，在水浸到腳踝骨的地道裏工作，她們還和那些男人們工作成績的競爭。而且還時常勝過了他們呢。一個得獎的女孩子說：『地道是我生活的最豐富的經驗。』

不過，規定婦女勞動的規程也有的，它禁止那些經驗證明對女性危險較大於對男性的工作。婦女不能做有中毒危險的工作，和不能拿重到某種程度的東西。還有依醫學證斷規定的對於懷孕期的規程，在生產前後的六月至八月可以不做工作。（註一）許多勞動方法不斷的被調查研究，決定是否有害於婦女。假如經驗證明有害的話，那就得禁止。這不是性的區分，而是公共衛生當局正常的

工作它嚴密地調查各種職業的結果把那些不適合於做某種工作調換開去。譬如電鍍，青年人就不能做，因為年青人比老年人容易因此生肺病。可是沒有說那種因女人不配做而禁止的；要禁止，那末在於公共衛生的立場，不論那個團體，那個個人都可以在調查之後受到禁止的。

蘇聯婦女勞動區別於其他地方的，不是在於她們得參加作笨重勞動，而是在於參加精細的專門職業。安娜·柯發諾伐以一個割打兩用機駕駛員出名，她在一季裏收割了一千五百英畝，創造了城市的最高紀錄。納塔利亞·豐海洛伐是一個機器耕作機站的主任，那裏全由婦女執管，担負三十二個集體農場，一萬五千英畝的收穫。希采蒂尼娜，輪船船長，在海裏航行着。蘇維埃的人造雨就是由一位女化學家計劃的。依蘭納·羅西諾伐是第一個北極探險家，在北方冒寒耽了好幾個月。接着她有許多其他的人，其中尼娜鄧美，在北地耽了兩年，管理着那邊的科學站。迦利納娜·美特夫尼克在沙皇時代是個八歲的孩子，種着烟草，內戰期內她在紅軍裏作戰，曾經有幾次被判了死；她逃脫了，今天她是莫斯科蘇維埃主婦的代表，那裏她監督着工人住宅的建築。

工作的平等即給婦女生活各方面的平等：不論是教育、政治、和婚姻上都如此。蘇維埃婚姻法的

註一

公務人員規定生產前後休假六星期，體力勞動者生產前後八星期，依醫師的診斷可以隨時延長，工

資在延長期內不扣。

立法根據，在於在兩個人決定夫婦這最親密的關係上，認定兩個人身份絕對的平等——政府沒有權利干涉這一決定。政府的行為限制在保護兒童和阻止發生強迫與欺騙的事情。所以年青的男女們到結婚登記局去，必需清楚地交代出姓名、住址、職業、過去結婚的經過、有無兒童、和他們未來擬取的名字。兩個人被問的問題完全一樣的。有時有兩個人取同樣的名字的，但不是常有的。財產在結婚以前的，仍屬於個人，結婚以後的則為兩人公有。已婚的誰都可以提出離婚，政府沒有問你的理由的權利，不過兩個人都負有供給養育兒童到十八歲的責任，和對任何一方必要時暫時在經濟上幫助的責任。最近公布了許多離婚法上的變動，其實還不過是一種更好的計算罷了，無非使兩個人都切實地知道離婚這回事，和切實地負起養育子女的責任。

最近蘇聯領袖討論了的關於充實家庭生活的一點，正是一般注意於更豐富的人類關係的相通的部份，我們知道由於空餘時間的增加，人類關係可能豐富了，家庭生活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的輕視。對婚姻的輕忽，在開頭時候，就被取締了的，列寧對於這一問題曾經非常的注意，不過壓制的方式倒是社會的，不是法律的。工會、集體農場、黨組織都責罰那些由性的混亂破壞社會的人，甚至到強制執行的程度。不過他們考慮的是具體的事情，不是傳統，兩個人公開的和不斷的同居，不管他們有沒有登記。一樣的被尊重，所以婚姻的確立，在這裏不單是在法律意義上的事，也得從社會意義上來

看，相反，不管用什麼方式，只要是利用人家都得被責罰。有些農民爲貪多一個人幫他收割，利用結婚法隨便弄一個女子來工作。可是一等到知道這樣收穫物將被分去的時候，馬上中止了。曾經有過一件很著名的事，那是在幾年前，有一個男子假言結婚誘姦了一個女孩子，到隔天他把女孩子丟了，他被判犯強姦罪，這是法律規定了的，由強迫欺騙發生的性關係，被罰監禁了起來。婚姻登記這事實不是好，而倒反更壞了，他用蘇維埃機關幫助了他的欺騙勾當。

還有從男女兩個都有職業這一事實，也不時發生許多問題。我碰到過一個在西伯利亞的女的耕作機駕駛員，她和另一個田塢的駕駛員結了婚。他們倆沒有密月，有的就是相隔幾英里的照樣的生活男的是一星期一次，趁他的休息日子，走十里或十二英里到那女的那兒過一天。女的也從來沒有到半路上去看他；她是優勝隊的主管，根本沒有這樣的空時間。我曾隨便的問他們爲什麼不到一個場裏去工作，兩個同樣的說了：『這樣得在播種期內離開我的一隊了呀！』

一個婦女對國家的關係常是個別的，絕對無需通過她底丈夫。就是大人物的妻子，也不以夫貴而輝榮。當史太林妻子死的時候，訃告上寫的是她自己的名字和她在人造絲工業中的職業，僅在這後面，再加說了她是『史太林的親密的朋友和同伴』。加里寧的妻子，自從她創造一個國家農場和在阿爾夫山的文化中心之後，才被國人知道了她，那裏人們也只叫她自己的名字絕不用主席的名字。

愛是『女人整個生命』這個傳統，在新的認識之下，在否認一個人的幸福絕對依恃於別人的認識之下，被粉碎了。土克斯克的一個年青女子，薩里瑪，當她進塔希干念書，她丈夫要她回去，由於她拒絕了這樣的要，便離棄了她。這位丈夫寫信給她大吹他已另娶一個，『不識字却順從的妻子。』但薩里瑪決不當這一件事，她覆信表示了她的性質，她說：『我接到了你告訴我你已經另有了妻子的信，我當然會有我的怎樣對付你。我書念成之後，回鄉來教你的第二個妻子讀和寫吧。』薩里瑪這樣的唐突，在上一世代的人看來，也許會吃一驚吧，但蘇維埃新世代的人將稱揚她是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公民。

蘇聯法律根本上承認女子有處置她自己的自由，她結婚也好，不結婚也好，不管結婚與否生子或不生孩子，都是她自己的自由，即使有限制，那是社會意見而不是法律。中央總醫院婦科分部主任米拉希凱維支告訴過我，那醫院三百個醫藥專家替史太林汽車廠三萬五千個工人服務，在那裏工場中工作的女子經常的到她那裏作康健檢驗。她說：『假使她們結了婚的，那我問她們，『可要孩子？』然後我根據她們的意思再給她們醫藥上的指示。假如她們不要孩子的話，醫院就給他們避孕的東西。』她再告訴我她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避免墮胎的發生，有時以康健的理由來勸，有時派看護甚至請鄰居的去勸阻想墮胎的夫婦，不過不絕對反對。米拉希凱維支博士說：『強迫一個女子一定

要生產，或一定不生產，那在我們覺得這是一種有損人權的行爲。假使她決定要有，那國家給她一切幫助，有醫師醫院替她看護診察，有特別津貼買孩子吃的牛乳和衣服，有日間托兒所在她工作時替她看顧孩子。」我們從平均每年人口有三百萬的增加，可以知道蘇聯婦女是決定着要有孩子了，這是任何國家所沒有的人口增加率。在過去昌盛的兩年中，有了三百五十萬的增加的呢。（註二）

蘇聯每年都有許多民族英雄的產生，他們都由於某種特殊的成就和某種被廣泛應用的新方法的發明而出名。在一九三五年最出名的是史達哈諾夫，一個礦工，和一個農場婦女，瑪麗鄧青珂。瑪麗這個過去甜菜耕作區的農僕，由農場的集體化，她跳了出來，她在農村實驗室裏得到了許多知識，在一九三五年她壓過了所有甜菜耕作者。『讓我們把糖來舖滿這塊大地，我的一隊要種到每畝生產二十噸甜菜。』爲此她收到了幾百封信，幾百個參觀的到了那裏，調查她們九個女人種的田，她們曾經有過八次在晚上用火清除菜蟲。她們用滅火機打水和八月的旱况鬥爭，她們拿二萬桶水，征服了自然的打擊，最後獲得每畝二十一噸的收穫，她們到了莫斯科十二月的慶祝大會，在全國的喝采聲中，她們接受了列寧獎章。

這些出類拔萃的婦女是那些人呢？她們是不惜深入泥地掘甜菜，不惜弄蟲弄水爲改進甜菜收

礎的女人們吧，她們的成就又爲什麼被這樣稱頌呢？這是爲的她們的甜菜，不是爲私人利潤的商品，而是爲一個國家勞動者的食糖。她們是一個大陸的墾種，這公共事業中的領袖。到今天還被忽視着的農場婦女的勞動，由於它成了一首英雄的集體的史詩，它的價值，和在北極洋探險的探險家沒有分別，和在同溫層中探險的科學家沒有不同。

第十一章 科學的民主化

『俄文現在在美國大學裏認爲是一種科學底語言了。』一個加利福尼亞青年這樣說，他曾經跟我一同到過列甯格勒工場安全協會，他還說：『四年以前，大學裏不把它當作一種有科學地位的語言，但是現在我的一些教授告訴我，在我專門研究的病蟲學上，它是最重要的語言了。在蘇聯出版的專門研究書，比了別地方都要多。德國和法國的研究，已經老了，而且在幾年前已經翻譯了過來。可是我們的大學，現在沒有錢來翻譯在蘇聯出版的一切新的研究。』

這位美國青年在他心裏，不會把德法研究的衰落，美國大學缺乏基金翻譯書籍，跟世界經濟恐慌連結起來吧。他不十分知道蘇聯農業的集體化，和其給與科學部份的刺激。但蘇聯集體化的結果，跨過了兩個大洋，兩個大陸，到了加里福尼亞一個大學的大廳裏，說：『俄文是一種科學底語言了，俄文的基本研究書，還沒有翻譯過來。』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列甯格勒舉行的第十五次國際生理學大會上到會的科學家，對於蘇聯政府的重視科學，和在蘇聯近年科學的超速的發展，表示了異常的感佩。紐約報紙也有如下的那種稱

頭，說：『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像蘇聯這樣的抬高科學。』『甚至美國人也驚奇，有這樣多的國家富源，能夠由政府依照全國規模的計劃，放在一個科學的處理之下。』哈佛醫學院的康農教授在大會告訴我們科學在今天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遭逢了怎樣的厄運，他還說：『在蘇聯科學底社會的重要性是被看得很重的，那裏有一定的基金，大於一切國家的基金，來推展科學的研究和應用。』後來在科學雜誌發表的大會報告上，這個美國科學促進社的官方組織提及了『科學家在那裏的待遇，』『科學不論是純粹的或應用的，在國民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和『青年科學工作者的熱情。』

蘇聯人民認為科學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定比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有更自由更充分的發展。其實這在馬克思之後，馬克思主義者早就認定了的。資本主義在其開頭一世紀以上的擴張期內，曾經展開而且自傲過它底科學，可是在現在，科學已到了成爲它底尤物的時候了，科學所顯示的人類發展的可能性，在私有制度之下不可能實現了。科學本身在資本主義之下也沒有了目的。英國有一位世界上最老的農業實驗所的主任，告訴一位到英國去的德國科學家，說他止不懂得，自從英國農業衰落，印度埃及反對拒絕應用他所發明的東西之後再研究什麼好。在美國科學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還只在開頭，只表示着新知識對利潤的壓力增大着。在德國，那裏沒落的資本主義已採用了法西斯主義的形式，那裏不信任人類的理知了，那裏正掀起着一種反對科學的宣傳。

在蘇聯，科學飛速的展開着。共產主義要求科學的百分之百的應用，根本的改造人類生活。它認定人類智慧能夠不斷的理解自然，能夠依其集體的意志克服自然。恩格斯說：『當人們和他們的工伴將進步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即一切過去的成就將只作爲一種微弱的光照的時候，將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莫斯科有一張報紙說了如下最能代表一般意思的話：『我們相信在我們這時代，將是科學空前發展的世紀。』全聯科學研究院院長卡平斯基，在以幾百個研究機關的代表資格向到會生理學家致頌詞的時候，說蘇聯是『一個尊重科學的國家。』甚至著名的生理學家巴夫洛夫，雖然他過去常反對布爾希維克的許多思想，但最近他說他願作爲一百人的那樣活着，因爲『蘇維埃政府爲我的科學工作給了幾百萬金錢，我的實驗室從未這樣的充實。』

有許人怕這樣的事，說國家補助科學，將比私人資本家的補助，更多妨礙科學的自由，還有許多人，則積極的誇張蘇聯「迫害科學家」的觀念，其實這些人都不懂得這樣的事實，即尊重科學和對個人科學家的懷疑是不相衝突的，在蘇維埃政府和某些用他們知識攻擊革命的科學家之間，無須否認的有過衝突。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時候，科學家和工程師大規模的怠工，已是過去那些幾千怠工的承認了的事實。只有當第一次五年計劃確立勝利的時候，這些動搖份子才轉過來認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給它們科學發展的機要要大。

科學院從革命前創立的三部——數理、自然科學、歷史語言——大大地擴大了。這是全國計劃和配合科學活動的中心，它有二十六個部門和經常的分部聯席會議來担負這一個任務，它跟國家計劃人民委員會合作進行各種工作，這說明了發展國家需要許多特別的科學的探究。它也是一切科學家伸訴的法庭，只要他們覺得對於政府或研究機關在他們工作問題上有不同意的地方，或者要求某種研究的援助的時候，都可以向科學院提出來。科學院還解決研究問題的衝突，它在全聯政府的直接資助之下的莫斯科市最近劃莫斯科河旁一千二百五十英畝地方給科學院，那裏現在正在建築着四十二所院用的房子。

據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阿柯洛夫在生理學大會上宣佈，在蘇聯科學研究機關有一千以上，雇用的科學工作者有四萬一千人。這些機關很多是有着很大的規模的。譬如全聯實驗醫學研究院就是蘇聯一切醫學研究的組織中心。科學家醫師和工程師爲這新的機關的建設工作了二年，那裏有五千五百人從各方面研究『人類的病理和生物學』。研究院的醫院不斷的研究各種疾病的特殊徵象，它還研究康健的人，作爲研究上的『約束』。

最大的科學機關之一的全聯農科研究院，連結着近六個研究機關共同工作，如土壤化學、作物免病、畜牧、微生物、農業氣象學和相通的科學部門的研究都在其內。農業研究院的工作，以二百個實

驗站和一千五百個以上國家的或集體農場中的較小的研究站所得的材料爲根據。每個附屬的機關本身都是一個重要的組織。譬如作物免病研究院就有二百五十個科學工作者爲其主幹，全國有十二個分院。

蘇聯科學的擴展，不但由於社會主義在科學設計上的需要，同時也由於人民的廣泛的興趣和合作。科學院不是專制政治的御用機關，它是國家科學家和人民大眾的統一物。科學在蘇聯是接近着人民的，因爲每一個人民都知道它底發見將是他自己的所有，不是少數特權者的財產。農科研究院副院長，世界著名的發明家和新作物的創造家瓦維洛夫說：『我們科學家覺得自己倒不怎樣的重要，因爲我們已經發明了這樣的多，而人民還不能應用，但現在集體農場要求我們的科學，我們看見我們的工作爲着幾千百年的了。』

蘇聯人民對於科學的廣泛的興趣，表示着它不僅僅在於尊重科學家，而且在於多數人民的積極的參加科學工作。每一個科學機關都得到工人，農民甚至孩子的熱心的合作。我們記得全聯地質調查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內派出過二千以上的遠征隊七千到八千的隊員，到各處測繪蘇聯的富源，那時這些調查隊就成了更廣泛的羣衆運動的合作中心。幾千個小學校的孩子也成了「我們國家的發明家」，他們跟教員們一同研究地質學上的發現。千萬個徒步旅行家向地質學家學習，作山

行時候，需要注意些什麼，他們真的也曾有過很重要的發現呢。第一次帕米爾大遠征隊的出發，其動因之一，還是由於一個基爾吉茲的牧人，他曾經走了二天的路程，打破了許多官僚機關的阻止，帶了一塊金子到薩馬爾岡，因為他『想政府應該知道帕米爾的金藏。』

每個大工廠都有它底工人發明委員會，有發明天才的工人通過它和外面連絡。工人和農民常有被請在科學大會上用非術語的話來報告他們的發明。反轉來，科學家常在工廠裏作有用於工場工作上的演講，譬如在機械廠裏，則有用分光法的鋼鐵分析術的演講，在橡膠工廠裏則有科學家們來作有機化學的討論。

工人對於科學的興趣這樣的深入和普遍，使勞動者和科學家之間的分別一些些的減少，預示着馬克思所認定的勞心勞力間分別的消滅已到了實現的地步了。科學院在莫斯科納斯珂契尼宮舉行的宴會上，有好些工廠領袖工人也到會作了客人。有一位外國新聞記者，他原初想看科學院研究員柏哈教授，可是因為遠指不正確看錯了一個。他們兩個談了好久關於文化革命，新生活創造，在社會主義下的新人類等等的問題。分別時那位通訊員要求拍一張科學院研究員的照，這使那個人吃了一驚，才指了那個注意地聽着的人說：『我的名字是依凡諾夫，柏哈是坐在隔壁的一個，我是工場的一個製鎖匠呀。』

科學民主化的最顯明的事實，要算是「鄉村實驗室」。這是前兩年在集體農場中發展了的。據報告單烏克蘭一地有七千這種實驗中心。實驗室的主任有時是鄉村小學的教員，但通常是自學的農民，他們有科學的嗜好，他們以他們的熱情來組織其他農民，在他們田塲裏作實驗和科學機關通信。

曾經有過一位編輯說過：「人類的這種科學的傾向取着許許多的方式，我們簡直不能分別它們。在過去，這些科學的嗜好由於貧窮被湮沒了不得發展。今天我們經各方面可以看到它得着發展了；譬如我們的農民報就說明着這一點。今天一種新的實驗家增長着，他們不是祕密的試驗，而是組織羣衆在他周圍來發現或提出新的觀念來。這樣，果準在試驗中常是多消耗時間和損壞機器，但這些在我們並不覺得重要，重要而有價值的在於我們人類努力改變和增進我們自己。時間的消耗和物質材料的損壞，不關什麼事，只要我們從此能獲得即小到一點的知識，能使我們人類增加理解 and 克服自然的能力就得了。」

阿柯洛夫就是一個這樣的自然科學家，他是格尼契斯克區的一個農民。當大戰被囚在奧大利時，他看見一棵穗特別大的稻。他就不在意的把它帶回去種在自己的園地裏，到一九三〇年他的村子組織集體農村時，阿柯洛夫有四袋這樣特別的穀籽給了他們。於是這樣種了出來，直到有幾十

英畝都種了這種稻。後來樣子送到全聯作物研究院去調查，證明這是世界別處沒有的。一種新的變種。

七十五歲的不識字的巴拉希夫也是這樣的自然科學家。他差不多化了二十年的功夫，研究產生一種耐寒的麻種，今年他的集體田場裏就收穫着這一種麻。列寧格勒區的柏區蒂里夫曾經在他同伴中發動了一種興趣，研究爲什麼同一農場的兩塊田場，有這樣不同的結果，這使他們整個的村子成了一個大實驗農場，在幾千畝田上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耕種，然後再比較各種耕作方式的結果。柏區蒂里夫出席農科研究院大會，要求科學家設法製造一種麥的新變種，要使一種粉量大的變種和另一種硬性的併起來。還有一個集體農民阿洛索夫曾經要求科學家研究出播種和耕作的方式，這種方式要保證各種穀物的各種成熟期，這樣使收穫機的應用在相對的劃一之下縮短到最小限度。

新科學觀念的溶化，在新的集體農場制度之下，比了在舊的小農業經營中要快得多。有幾處整個區域，已成了農業實驗站。譬如近契里亞平斯克的查特里奧斯克區，單在一個夏季中，做了蕎麥、大麥、綠豆、向日葵和其他作物的幾十種實驗。他們有經鄉村實驗室裏來的幾百個代表舉行特別的會議。這一切民衆的實驗，不斷的和農業人民委員會的科學組織相連絡，而且得到政府的作物保險政

策的保護，防止不必要的損失。

蘇聯農業科學的許多成就，已有其世界的重要性的。譬如『春季化』這方法，把冬麥變成了春麥，晚棉變爲早棉，二年生的作物變爲一年生的作物，使阿爾格里麥能夠在北極圈外緯六七·四度的安平納地方生長起來。世界上極北的植物園在柯拉半島上，那裏六百種作物的試驗，找出有二十五種能夠適合於北極。由於土克斯坦山新發現了「橡膠」植物「Tur-sagin」和「Koksauriz」之後，蘇聯已發展了其自己的橡膠工業，新發現的植物，現在北至烏克蘭也種了的。密邱林創造耐寒果物變種的光輝工作，不但使他著名於世界科學界，同時使他著名於蘇聯千百萬農民中間。他們每年有幾萬個人到他果物實驗園去報告他們應用他的變種的結果。

蘇聯也創造了許多新的機器，譬如分麻機器的發明，根本革新了製麻工業，還有爲適合於濕地穀物的收穫，也有了一種所謂「北方」的割打兩用機。其實就是普通從美國買進的割打兩用機，也經過了六十次的改良，據專門家說是世界上最好的了。依瓦維洛夫說，對於土壤微生物學的研究，已經使蘇聯農耕上有充分把握法除作物的蟲害。此外有生畜的人造生殖，這裏的方法，是從實驗室把精蟲經郵局和飛機送到鄉村實驗室去，現在全國半數地方應用了這樣的方法，迅速的改良生畜，不像過去那樣只由公豬公牛來負生殖任務了。在集體農民和科學中心間不斷的合作之下，國家生產

區域的地圖迅速地改變了。現在甜菜的種植到了烏拉爾。棉花在南烏克蘭出現了。伏爾加河外的空地種起樹和灌溉起來了。麥的耕種伸展到了北極。北洋蒙孟克區有幾千畝田墾種了，已不是幾年前
的僅十二畝了。

在科學的領導之下，人類有計劃的展開的最明顯的例子，要算是北極區的征服，它曾經激起了整個蘇維埃的熱情。全聯北極研究院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個公布了大北海航線的建議，雖然有其他科學家認為『在目前這冰河期內，歐亞兩洲北岸的通航還是不可實現的事。』然而蘇維埃政府支持了它。大胆的科學家建立了北海航線管理處，給他們船與基金，一步步的急速地展開着，開頭有幾十個遠征隊到那裏去測繪海岸和海水，接着三十九個北極科學站，備着無線電話和飛機到那兒去，再後在破冰手的率領下去了商業艦隊，先從西方，後從東西，再後沿整個北極海岸，從大西洋到太平洋。

全世界記得留斯金的史詩的吧，在白令海峽的西北破了他的船，他們巧妙地登在圍在他們周圍的冰上，在冰塊上過着那個「正常的」也是英勇的組織生活，那裏史密斯教授穿了鹿皮的大衣和皮的鞋子，講着辯證法、唯物論或佛洛依的理論，接着他從莫斯科帶去的蘇維埃百科全書，寫了一篇高等數學書的序言。北極遠征隊的歷史上有着許許多多勇敢的例子，然而從來沒有在非正

常情形下這樣英勇地過正常的組織生活，像在『冰上的蘇維埃共和國』那樣的。它出着它底壁報，壁報上有卡通，有自我批判，有對莫斯科共產黨大會的評論，這是却留斯金從無線電中接得的。

現在蘇維埃船廠根據却留斯金的經驗，造有征服北極用的船隻，飛機和衣服也適應北極的氣候被設計了的。一九三五年夏天有四個普通的探險戰士週遊了歐亞的北岸，一九三六年將跟着有幾十人去吧。英勇的科學家們的探險工作，在二十九個科學站度着冰雪的生活，現在得到了礦工、木工甚至農民的支助了。隨探險家和科學家之後，現在有北極的工程師、技術專家和建築家等新的人類出現了。在薩特科的遠征中，科學史向北推至緯八十四度·四十的地方——這是過去從未到達過的最北的地方——那裏遠征隊發現 Gulf Stream 暖季的復現，說明北海路線可航時期的增加。在過去半世紀中，到達過緯八十度地方的，全世界一起在內有八隻船，其中美國的有二只，斯堪狄那維亞的有二只，還有的四只就是蘇聯最近幾年中去了的。

這是整個蘇聯國家的支持，加強這些人們的力量去征服北極。整個蘇維埃的人民把這些北極的探險工作者看作他們自己的代表和勝利者。他們通過無線電話知道他們的生活，莫斯科有整個六個月的晚上和發北極消息的狄克桑島通着話。那時有一個年青的犯罪者送到遠北去，算是贖罪的，爲的到北極去，全俄都震驚着，可是他的在廠裏的愛人，當他走了三千里冰天雪地的路程之後，還

鼓勵他要他在那裏好好的幹呢。在北極，假如那個站在冬天生孩子發生困難的話，那他的同居的人們便會用無線電向狄克桑外科醫師請教，醫師也不憚煩的告訴他們一切。要是孩子和母親都安全了的話，那從幾千里冰天雪地裏有許多多慶祝他們的。

在資本主義下，科學已經打破了國家的界限，增強人類的力量。在社會主義下，科學則成了整個人民意識地用着和急速地擴張的力量，它爲人們征服他的世界。

第十三章 藝術的民主化

「英雄的民衆要求英雄的藝術家了」

蘇維埃文學評論編者

倘若科學是人類支配自然的工具，那末，藝術就是人類自我表現的方法了。在蘇聯地球上最落後的諸民族所屬的民族數千萬民衆已由沉睡中醒過來了。他們正在尋覓自我的表現。他們自己寫作，歌唱，繪畫；由他們自己的階級中產出小說家，詩人與戲劇家，他們愛這些詩人與戲劇家；他們批評他們，向他們作嚴懇的要求。蘇維埃的藝術不是私人的財產而是國家的財富。國家對於這些財富是自負而且關懷的。

當一九三四年八月全蘇作家大會第一次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時，由聯邦各地寄來數千封信，慶祝，道賀，並供獻實際的提示與忠告。工人，集體農民，學生，少年先鋒隊，科學家，工程師與藝術家在會上

表示他們的興趣。單在莫斯科，就有兩百以上的工廠舉行作家與讀者間的聯席會。代表幾百萬讀者的代表們出席大會講演。每天會議散後，作家都可以看到總有無數不能進場的工人集羣等在門口，候他們出來，向他們歡呼。全體無數民衆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學的問題，詩的功用，最適于現實的文學形式，報章上所詳載的題材。文學工作在蘇聯成爲一切勞工的事情了。

那裏沒有對任何種文化慾望的什麼限制。蘇俄在其起首十五年中，出版了五萬萬本書，和沙皇最後卅年間的二百萬本比照起來，是年有增加的。第一次五年計劃臨了，蘇聯出版刊物比英德法三國出版的總數還多。弱小民族間文學的增加尤其驚人，這些弱小民族的自我表現在沙皇之下是被壓制的。自一九二九年以後，烏克蘭每年出版本地文學的書物比較革命以前一百一十八年出版的總數還多。單是莫斯科國際書店一家就是出版了八十五種語言的書本：小說，課本，民間故事，技術著作，古書譯本，短篇故事及字典等；有些語言以前是沒有字母的。

蘇維埃世界自己覺得是一切世代的繼承者。各國的藝術家，科學家與詩人的紀念日是受着廣泛的慶祝的。羣衆集會和報紙各欄都尊重古代波斯詩人費度西（Firdousi）英國莎士比亞，德國歌德，法國的著名的作家福洛貝爾（Flaubert）梅里美（Mérimée）英泊桑，雨果，馬克·吐溫，和賈克·倫敦等最好的作品，都銷售到幾十萬本，而且銷售的快，常使書店的存書沒有到幾星期以

上的。俄國的古典作品更普及，萊蒙托夫，納克拉索夫，柯洛倫珂，果戈理，屠格涅夫，契珂甫的版本，多至七萬到十萬種。可愛的詩人普希金的著作，在九年之內重行了二十萬冊，訂購他的全集的也至三十萬冊，批發給書店尚不在內。托爾斯泰可算是最普及的了；革命後，他的作品共賣了一千一百五十萬本。

蘇維埃的讀者，不但需要過去的藝術，他們還要求現在的藝術。最普及的小說，是像蕭霍洛夫底『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了的處女地』的那一類。這些小說都廣泛地描繪了目前蘇維埃世界的人格，困難，鬥爭和勝利。蘇維埃作家潘菲洛夫在一個巴黎開的大會上曾經說過：『過去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有這麼多的材料給他處理，有如蘇聯革命後十八年的驚人事跡所提供的那樣。』他再說：『勞工階級在特尼泊建築了水閘，同時也訓練了勞工階級的堅強的水利人員。它使烏拉爾的濕原，轉變成了工業中心，征服了荒野僻遠的庫茨巴斯……在改造國家的中間，勞工階級同時也改造了它自己。』僻居山中的落後的一切人民，如孤居的夏枯特人，北方的倫茲人，野蠻的巴希基爾人，有顆同情心的喀拉烏斯詩人，以及詩人卡爾莫克人……散居的幾十種民族的千百萬人民，都投入了內戰的洪爐，奮力再建國家，征服文化的堡壘，帶給全世界以新的生命……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無產階級新世紀的必然現象，——積極，樂觀，勇敢，果斷，正如無產階級革命這世紀本身一樣。』

這幾千萬人民，不但是藝術的題材，他們也是藝術家，讀者，和觀衆。他們對於各種藝術的表現，顯示着廣大的興趣。我們看在蘇聯，戲院常是濟滿了的，藝術博物館不斷的有參觀的人去，通常的展覽會，常有幾排人等在門口，候裏面空了再進去。工廠工人和集體農民，對於各種藝術作品，在表示他們的意見上，一點也不落後。假如，他們覺得需有表現，或表現了什麼的話，難道不就是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演劇家嗎？他們不但是藝術的享受者，他們中間已有幾百萬是業餘的藝術創造者呢。

過去兩年中間，蘇聯產生了十萬以上的藝術團體。單戲劇組織有一百二十萬會員，若把歌唱，音樂舞蹈和木刻等藝術團體的會員併起來，那有五百萬以上，至於地方報紙和壁報上的作者，漫畫和攝影作者那更不堪指數了。蘇聯新人的主要特點，可以說是他們表現自我的一種動的活力，而且常用着集體的方式。

大多數人最直接而最普遍的表現，取着在報上發表的方式。他們寫關於官僚腐化的，農場管理的無效率等的問題，用手寫了貼在工廠的壁上和農場裏的樹幹上。他們常常由許多人簽名送比較重要的消息，送到有一百五十萬讀者的都市報紙「真理報」和「新聞報」去。莫斯科「農民報」每年收到二百萬封信，反映農場的生活和各種問題。雖則發表的只有一部份，但全部給了答覆的，而且作爲小說，歷史，和國家立法的材料而小心地加以編審研究的。

在北方，離開鐵路線五十英里的一個鎮，在革命以前，這鎮全體僅有六個人訂報，但現在怎樣，他們有了幾百個通訊員了。我曾經參加過那地方二百個農村通訊員的一個大會，討論準備一個播種競賽。這些通訊員還只是那地方的一部份呢。它的集體農場有四百七十個田場小組，當競賽時候，各組都辦了一個壁報。一個十七歲的活潑的孩子，穿了古紅的綢緞衫，外面罩了一件黑的短衫，很自負地報告由於他的論文和社評推翻了他農場的腐化的管理當局。他在會議上解釋着說：『我們共出了九期，後來因為缺乏紙停了。但是我們已經喚起了農民，使大會調換了主任和兩個管理員。』

九期拿很粗糙的紙頭印的單張紙，接連在樹幹上發現了幾個星期。為避免給雨打碎，在報紙上面做了一塊擋雨板，它曾經彈劾了一個農場的管理當局，可恥的懶鬼，它促進了播種工作，使工作得到了勝利，它催促完成犁土的工作，它使各田場小組按時完成收穫。據『農民報』的估計，蘇聯全國的農場小組壁報共有五十萬種，每種至少有十個鄉村通訊員。在工廠方面，有三千以上的工廠壁報；三千種中間，有幾百種週報，和許多銷路在二萬以上的大工廠日報。這些報紙，一方面是工廠和農場生活的組織中心，一方面是青年作家的訓練學校。有這樣廣大的讀者，和作者大眾，那在蘇聯當然有一萬一千種排印的報紙，和三千六百萬以上的銷路——即十三倍於革命以前的數量了。

工廠和農場的報紙，造就了無數的作家，他們都進入了文學的園地，他們熱切地希望每一個最

低微的工人在最適可的範圍內用他的筆。文學團體在烏拉爾和唐納茲這樣中心地方像雨後春筍一般的起來，有的則繞着幾個爲附近鄉村服務的耕作機站，許多唐巴斯的作家團體，每在白天做了輸煤工作後，開始作文學的工作。他們的雜誌『唐巴斯文學』已經產生了許多可貴的小說和詩歌了，這些小說和詩歌被礦工廣泛地讀着。

在伏洛諾伏（Voronoovo）村耕作機站的一個集體農場的文學團體，它的團員是兩個馬夫，一個鐵匠，一個割麥夫，一個耕作機駕駛員，一個司賬，一個繕工，四個日間托兒所助手，三個教員，二個集體農場的主任，一個鄉村主席，二個農場新聞的編輯，十六個農場婦女。這些作家們，在一年內，由他們自己的印刷所，刊行了兩本詩，劇本『算錯了』和一本人物速寫『撲里托德爾的布爾希維克』。他們宣稱下一年將出一本『依據功績』的劇本，一本『全毀了』的小說，『一個耕作機駕駛員的日記』和『耕作機站之歷史』等。

各種業餘藝術活動的範圍的廣闊簡直以想像的。蘇聯到處，甚至最僻遠的地方，都有着叫做『Chayyshki』的通俗短詩，慶祝着婦女的自由，耕作機駕駛員的英勇行爲，集體生活的日益增漲的繁榮。這些詩，有的僅是給牧人和割柴夫以某種韻律上提示的，不是什麼好的詩，但有的則是真正美麗的短詩。單唐納茲一地報告有八百以上的銅樂隊，三百個音樂隊，二百五十個合唱隊，幾千個

戲劇團體，甚至還有四十二個歌舞學校呢。最近在倫敦跳舞節引起了注意的幾個蘇聯舞蹈家，就從這種戲劇團體出來的。繪畫團體也佈滿全國，在各地舉行展覽會，常顯示了驚人的天才。

在專家和非專家團體之間，常常舉行團體意見的或個人的交談。蘇維埃報紙，在這裏建立團體間的關係的一點上，盡着很大的任務。「文化和遊戲」這一種新聞，從有名的展覽會裏選取最好的藝術品翻印，它鼓勵未成名的藝術家，把作品送給他們請著名的藝術家批判；那些被發現了有藝術天才的，便送到藝術學校去。雜誌「集體農場劇院」每月發行八至九次增刊，裏面登載的都是旅行劇團的節目，鄉村集會，節日和歌唱的節目，和獨幕劇的說明書等。它使那種業餘團體和最相近的職業劇院聯絡起來，這樣使它們在技巧上得到職業劇院的幫助。現在職業性的鄉村劇院也有一百所。

一九三五年夏季，在蘇聯發生的許多運動中間，有一個在兒童中間選拔音樂天才的運動。那時有幾百個音樂會在各地舉行，爲担任評判，有許多教授從莫斯科音樂院特地乘了飛機到各地去出席。結果有七百十五個最有天才的孩子送到了特殊的音樂學校去。二十五個最特出的則送到莫斯科音樂院的特班去訓練。

不僅音樂，在一九三五年夏天，還舉行詩歌的戲劇的和舞蹈的全國競賽會。譬如在列寧格勒。藝術家的裁判員們，到各工廠去選拔選手，從一萬五千業餘音樂家，歌唱家，舞蹈家，理論家，演說家，運動

家以至幻術家中，選出一千一百個出席全區競賽會。斯莫倫克的集體農場，有一個六十四歲的不識字的老農婦，由一個較輕的女人筆記，寫了一本戲劇；農場的年青的人們還把它在斯莫倫克競賽會上搬上了舞台。競賽會之外，還有許多『文化遠征隊』出發到基爾吉茲人、布爾泰特蒙古人、節命克人、烏茲倍克人住的荒僻地方去，去找尋和保存在原始文化上照耀着的詩歌和音樂。最近組織的一個合奏音樂隊，舉行了它第一次的旅行演奏，用現代格式演奏舊哥薩克的曲子，直到了不久以前還是半野蠻牧人居住的大草原。集體農場派代表走幾百里路去請這音樂隊到他們那兒去。

從這無數萬生命中的藝術酵素中，生出了蘇維埃藝術的活力，它覺得它自己需得找尋適當的表現。今天蘇維埃的作家，假使他們真要普及於大眾的話，他們不能再浸沈在個人心靈的泥坑了；他們必須描繪變動中的社會關係的各種姿態。他們得化許多時間打入工廠和農場中去，深深的理解他們。譬如蕭洛霍夫就常期耽在鄉村裏，它底整個生活，即是他全部小說的題材。

藝術家的人物也不是被動的；而是那些人物活生生地在背後存在着。凡唐哥夫劇院邀請觀眾和演出者討論戲劇，他們的討論是這樣的，當在上演時候，在閉幕開幕的休息時間中他們跟觀眾討論，當演終之後，他們和演出者討論。這些討論有非常精采透澈的意見。作家和讀者間的集會上工廠中已是常事了。像蕭洛霍夫和特萊察珂夫這樣的作家，對工廠聽眾讀講未成作品，已成了習慣了的。

工人對作家處理一個工業角色時提出意見，也是常見的事了。蘇維埃作家伊凡諾夫曾經說過：『我們的讀者，當成了朋友時，也是最嚴厲的批評者，跟讀者交往，在我們是最好也是最有價值的學校。』

蘇維埃的讀者，要求簡潔和生動的作品。他們不喜歡被壓迫者的什麼心理的錯綜的分析，他們整個的生活是外向的。他們的興趣在於那些工作着的，變更着社會關係的人民。在革命後最初的十年中間，文學和戲劇中典型的主題，是死在集體活動展開着的勝利中的英雄。這英雄可以是一個胡派也夫，他在他的得勝的同志出現於舞台前被打死了的，或者一個被富農打死的鄉村組織者，他的屍體在新到的耕作機的光榮的行列中，被帶到他的墳墓上去。勝利是集體的，由英雄的個人的犧牲得來的。這是革命和內戰時期的自然表現。

最近幾年來，蘇聯文學和藝術中有了新的主題了。英雄不再死了；他鬥爭，活動，學習，改過，而不是由於反省，却由於行動的衝突。他是樂觀主義的建設者，創造者一個光榮而快樂的未來。民衆向作家所要求的，也向木刻藝術要求着：這是目前存在在蘇聯的一種心情所激起，也是轉向激起這心情的一種藝術。史太林格勒工廠工人曾經給過藝術家們一封有名的公關信，裏面說：『不要再給我們彩色攝影了吧，我們討厭這些東西了，我們希望你們給我們一種有勇氣的熱情的藝術。』

假使這廣大的新羣衆的合時的要求，是對蘇維埃藝術的一種經常的刺激，那和藝術羣衆的合時的要求，是第二種刺激了。作家，演出家，繪畫家——一切都有他們的組織。他們有會所，作對外交際，討論，和展覽的用處。他們有鄉間別墅，給會員們作休養和創作的地方。他們用借款和津貼鼓勵新進作家。他們修養，提高水準；他們幫助會員出售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家組織發行文學雜誌，爲新作家編制計劃，指導和批判，爲工人們建立文藝大學。演出家俱樂部舉行特別的中夜表演，那裏它底會員們和有名的藝術家來賓碰頭，看最優秀的音樂，舞蹈和戲劇。

四千藝術家的一個合作社，它不僅主持全國的展覽會，它還有許多工廠生產藝術家的用品，刻石，塑像，鑄金的工場，和刻石雕刻的商店等。這合作社每年有四千二百萬盧布的交易額。交易的來源，主要的是它會員跟城市蘇維埃，大工業和工人俱樂部爲裝飾用的定貨。這些定單中有的在百萬盧布以上的。當莫斯科十年再建計劃提出了對建築，雕刻，設景和紀念物種種藝術的要求時，藝術家團體便佈置雕刻建築的討論會和參觀團，發動大規模的壁畫實驗工作。蘇聯藝術家不是孤立的專門工作者，而是一個充實而有權威的組織的一部份，它使他們和政府計劃機關和國家有組織的生活聯繫起來。

由於藝術家間和藝術家和大眾間的密接，產生了一種集體創作的方法，這方法正在普遍的展

開着。我們看這方法的應用，已有十幾個作家甚至整個工廠來寫一本書的了。三十個專門的作家聯合寫了『倍洛莫爾』，一本波羅的海白海間運河的開鑿故事。伊凡諾夫說：『我們企圖告訴怎樣在這僻遠寒冷和多石的地方開鑿了運河和怎樣赤卡隊員把犯罪者變成了新人。我們這些作者在趣味和年齡上都各不相同，但我們都竭力使這本書統一多方面而有力。這本書即在今天我覺得還非常可愛。在寫它的時候，我深深知道了我們作者真不是如我們自己所稱的都是個別的個人。』那本寫烏拉爾鐵礦的『The Event of High Mountain』是一百多個礦工寫了的。這些礦工共同商量，起草和修改正如他們共同創造和修改他們自己的一樣。這是一本偉大的政治和藝術的紀念碑，有力，新穎而活潑。

『內戰史』、『工廠史』和新提出的『俄羅斯鄉村史』都包括大套的著作，每種都準備集聚幾百個甚至成千個人民的經驗。性格不是由別人描寫的；他們描寫他們自己，每個人和別人商量找尋一種合式的藝術形式。那個我曾經參加的二百個鄉村通訊員的集會，決定了發行一本書，提出城市史的藝術形式，他們從每二十五個鄉村中選出最優秀的作者，去和從莫斯科來的專門作家一起工作。每個地方作者，在他們所屬鄉村幫助之下，選定某種活潑而重要的事件或人物，作他寫作的中心，暴露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變動。譬如有人把他父親家庭的親密的家庭關係，對比着他自己的蘇維

埃家庭。另有人則描寫人民的習俗。這些結果，雖然缺乏格調和結局，但寫下了的是真實的生活，活潑的自由，這還不是藝術，但它奠下了堅固的基礎，在再後的幾十年中，將有最偉大的藝術從這裏產生。

在過去偉大的藝術運動總是跟了經濟上的擴張來的，後者刺激了前者創造的新生命。一位蘇維埃作家曾經對我說過：『我們已處在一個偉大的世代中；有永久價值的藝術品也已出現着，但仍不是偉大的吧了。可是世界上那兒更有更高的藝術品呢？』在文學方面，有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在電影方面，有『波丹金』、『夏伯陽』和『瑪克辛之青年時代』。這些都是蘇聯不朽的藝術成就。莫斯科地道則是建築上劃時代重要表現之一。我們這樣說假如市公所和廟宇是表現了古羅馬的精神的，教堂和宮室是中世紀精神的表現，摩天樓是金融集中的力量，那末這美麗的地道表現了千百萬工人在高度工作中的律動。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喀爾珂夫國家工業廠，許多新工廠的房屋，還有兒童園療養院等的建築，也都展示了新的建築。那蘇聯藝術家是『一律』的嗎？這只有在他們缺乏反應他們社會環境的智力，和爭取某種表現形式的意志的時候。藝術家，凡心靈受舊世界薰陶的，都覺得新的實現是阻止了心靈衝動的，他們在新的出版家和新的機關人員方面找他們的去路，但不論出版家或機關人員，只要是新的，都或多

或少地保衛了新制度的。常有許多新興的藝術家集團，扭曲了革命，組織集團排斥同人，譬如拉普（革命作家同盟）就這樣維持了好些時候，把持着他們狹隘的標準，直至後來其他作者在新環境的新認識下，才始擊落了拉普。社會環境也變動着，藝術作品在觀眾前的判斷下自然的會得到最確實的批判，譬如『Days of The Turbines』這一出色的劇本，在戰前的觀眾前面，由其把沙皇的官僚寫作了一個英雄，當時初生的資本家們稱頌他，共產主義青年組織反對那些腐化的官僚，戲劇結果被禁了。

一切作家，到處都得改正他們自己，適應編者，出版者和讀者；這些正如字和圖畫一樣，是不可少的中介物。即如在英國，除非有了新讀者的需要來推促它生產，誰也不能請『無產階級作家』突然出現。蘇維埃社會同樣對藝術家有着各方面的限制，我們作家們跟出版家談論紙張限額的困難，他們的標準是『重要性』，可不是利潤，我們知道任何種好的書都擔保可以銷售的。他們一方面還依據『政治編輯』即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決定，因為教育方面的需要和作品的政治意義都由教育人民委員會通知和提示的。我自己跟這些政治編輯談過話，他們都不歡喜審查員這名稱，却像那些美國出版家的讀者。他們有許多提示，有些非常有價值，有些相當有用，有些是我所不贊同的；他們自己只依順理論，偏愛那些熟知他們做什麼的作者。但也只有那些粗劣的作者才把他們當敵人看待。

作品經相互的討論總是改進了。假使差別太大的話，那可以找另外的出版者；在蘇聯儘可作更廣泛的請求，根本沒有那一個獨裁者審查一切，政治編輯在現在日益變為高級的專門家了。重要的戲劇總是先由領導的批評家和與它們主題相關的人先看過，同樣如果一齣戲劇或一張影片是為兒童的話，那先看的總是兒童和教育家。只有軍事情形和有害於蘇聯對外關係的東西，才在被禁之列。（註一）其實這些東西，也已出了藝術的範圍了。

假使藝術在封建時代小領主的妄想和美國出版家營利動機的審查之下出版，那不應該在教育當局和有經驗的批評家的批判之下出版嗎？他們也正為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估計它們的重要性。在蘇維埃環境內生長起來的藝術家看來，藝術是千百萬人民集體生活在作家特殊天才所選擇某種形式下的自然表露。這樣的藝術家在這新的環境裏，根本就不感到壓制，有的就是它的創造的衝動。千百萬農場新聞家，幾千個戲劇團，幾萬個農場和工廠音樂會供給了一個廣泛而熱切的大眾。現代大機械的公有所提供的餘暇在蘇聯已被廣泛的用在藝術科學的研究了。勞心勞力間的區分

註一

最近最顯著的例，要算一九三二年這一難期內新聞報道這限制的事，曾經引起了某些美國新聞記者

反蘇聯的反感；但蘇聯有具體理由相信，他們困難的詳細的佈露，會促起不住在威脅中的日本進行直接侵略的。

源，不再受戰爭阻礙時，還有什麼不能做呢？假使地球長老了，我們不把它改造適合我們嗎？假使太陽系終止它的轉動，我們不設法給我們的太陽以熱嗎？當地球是我們公有的工作場和家的時候；我們還需要設定什麼限度嗎？

這是他們確信的哲學。他們討論到這的時候，總是這樣的答覆。一種新宗教嗎？那是一個被丟絕了的字。他們將說是一種擴大的科學。他們對終極實在的認定，不是信仰的，也不是皈依的，猶如一切宗教所依據的那樣。這是通過智慧和意志的征服和挑戰的認定。奴隸和奴隸主，農奴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間的衝突終結了，無階級社會達到了，再來的便有意識的人和無意識的自然的衝突。不是由於信仰，而是由於分析，不是由於皈依，而是由於挑戰，我們得在那無終止的戰鬥中增高起來。無終止嗎？只相對的如此，不絕對的如此。不過終止在目前甚至還在我們想像的能力以外的。

第十四章 改造人類

一九三五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行的全聯歌舞大會，結果舞蹈的優勝獎，由一個在資本主義世界將列在犯罪者的舞蹈班所得。這舞蹈團所屬的人們，都是被判了的囚犯，不過還在勞動公社第二號內住着，那裏是他們被送去改過的。他們表演的是一種烏克蘭民間歌舞名『暴飛雪』的，第一次表現有了五萬的觀眾。這裏每個人覺得奇怪的是蘇聯的處置囚犯，我們要知道這一個犯罪者組成的歌舞班在大會上表現倒還不覺得怎樣的奇異，奇異的是他們日常還自由的在各地歌舞節上和其他藝術家團體聯合了活動，這些活動最後纔把他們送到莫斯科去。

改造囚犯在蘇聯，僅是那裏整個人類改造中的一部份。他們不像那些把持了『你不能改變人的本性』這個公式來辯護古代的胡說，馬克思主義者深知人的本性是不斷的變更着的。中世紀的農奴和現代熟練的工業工人是絕對不同的二種人，他們間的不同，不僅在於工作的方法，同樣在心靈上，神經的反應上，甚至身體的動作都不同。今天，在蘇聯全國或大或小地進行着人類的改造。不識字的，拙笨的農民，現在也已熟習於集體勞動方法中的迅速工作了。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醫師，過去

都習於依賴資本家生活，現在也習於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的統制下作一個雇員了。有許多歡迎這樣的變更，有的則恨這變更。但不管怎樣，這一切人，過去殘存的習慣都和現在的要求鬥爭着，而這鬥爭正是改變他們人本身和他們的環境的。

這一變革的過程，有些人只是半自覺的，所以便覺得迷惑苦痛。而在最幸福的看來，這却是意識地等着的過程。因為不論那個時代的人，都需要變革，變得更好些。道德的說教者，要他們從情感的修養來達到這樣的目的。然而這是一個在黑暗中和人類所不知道的力量鬥爭。他底情感的轉換，如果他能集中意志和注意的話，是可以維繫的。但如果舊的環境一天存在，舊的習慣也會把舊有的心理恢復過來。

在某種限度之內，人可以在任何社會制度之下改變他自己，可不是由意志的努力，而是由於平和的分析他自己和他的環境，把自己與可能改變他的其他許多力量結合起來。人可有這樣的自由，但這些個人的努力是受着社會可能性的限制的。一個妓女能改變她環境，不再要立馬路嗎？這只有當社會允許她們做正當職業的時候才可能。做綁匪的能改善嗎？這也只有當誠實是真的最好的生活手段時才可能。在資本主義下一個人要繁榮發達，誠實要得，但卑鄙無恥也要得，那些犯罪的，僅是不幸或笨的結果，原因在於他們無恥得不得其時，不得其法。要真的產生誠實的人，只有這樣的社會——

制度，即那裏能保證一個最通常的誠實的人，能優於一個最幸運的不誠實的人。

曾經有過一位新聞通訊員，從烏拉爾金鑛寫來一件關於社會標準的變更的故事。依作者過去鑛產私人所有時，大家都稱贊能偷金塊的人，以為這是聰明的勾當。這樣的態度在鑛產國有後還繼續了好久。但現在不同了，最近在為慶祝訂婚的一個宴會上，一個青年正忙於舞蹈時候，拿手巾帶出了一塊金塊掉在地上。於是全場突然的靜下來，宴會也沒有什麼話無形的停止，就是女孩子們也離開那個青年，作者這樣寫，說『每個人都把他當作敵人看了。』

意識的改造人類本性底最顯明的例子，我們在蘇維埃處置破壞法律者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蘇維埃犯罪學者不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監獄制度所根基的那一種理論。他不相信有『天生的犯罪者』。要知犯罪者的意志一定受到了某種殘酷的壓迫；同樣他也不祈求犯罪者感情上有所刺激感。應而改善，因為他知道這種優良的人性還只是開始存在而已。一位蘇維埃有地位的刑法學者告訴過我說：『我們不承認朱古力糖，精緻的浴室和溫和的話可以改好一個反社會的人，人們須得由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來改善它，特別是需要由他們集體地工作來改善。』

蘇維埃法律的目的，在於克服種種社會的缺點。不使社會受到它們的攻擊。在這樣一個目的中間，等於報復的刑罰，根本沒有它的存在餘地；報復僅僅激起循環的報復而已。使囚犯靜靜的坐着，反

省他自己的罪惡，結果什麼呢，決定了犯罪而已。斷送一個人的意志，或用各種方法減少其人的權利，結果也無非減弱了一個創造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所以蘇維埃的司法，在給犯罪者以一個新的環境，使他在這中間像平常一樣的活動，猶如一個很負責的蘇維埃公民，愈少監禁愈好，愈是不覺得自己被判罰愈好。蘇聯司法在開端時，爲的在內戰緊急期內壓制犯罪，所以起初用了非常嚴酷的刑法來對付反革命陰謀了的。檢察長維興斯基曾經跟我談起這事，說過如下的話：『我們有兩種不同的處置，第一，如果我們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積極破壞我們，而且被證實了的話，那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粉碎他們。第二，但這些敵人的同盟份子，如貴族，地主，沙皇遺臣，資本家們，即我們已奪去了他們的私有財產的這些人中間，我們可能找出一些可以轉變爲有用的工人的人。事實上我們不能拿乾淨手和新的磚來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爲新的建築，我們也得用舊的磚頭。不過假使拿人道主義的觀念來對付我們兇惡的敵人，那我們今天也不會在這裏了。』

在蘇聯有許多通常的犯罪，都沒有帶進普通法庭處置了的。工廠，學校和公共宿舍裏都有『同志法庭』，它們非正式地審問那些干犯人家的人們。這些法庭有權判定小數罰款，充當地俱樂部或圖書館的用途。它們不能處理的案件則移交公衆法庭。在蘇聯甚至還有『兒童法庭』，在兒童法庭中兒童們在成人面前互相審問。曾經有過一處公共宿舍裏一個這樣的法庭，審判一個孩子，爲了他

殺了一隻貓，結果判定真正的罪犯不是這殺貓的孩子，而是這公共宿舍的監督，他沒有供給他們一個玩的地方。這位監督，他到了的，也承認這樣的判定，並且接着和孩子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糾正這宿舍的缺點。

一個村區法官告訴我說：『不僅在法庭裏面，而且在法庭外面，我的工作為的保障社會。所以我在我一切可能範圍內，得盡量的消免法庭案件。』他告訴他在最近的一位聖誕節上，怎樣的消免了犯罪的發生。『人們在這天總是酒喝得爛醉的；他們醉後打，互相用刀觸。所以我召集了集體農場的主席，和黨員們，聚集後我們在他們喝酒前到他們那兒去，拿去了他們的刀和棍子。後來他們喝醉了，可是沒有人受怎樣的傷。』

我曾經旁聽過一個鄉村法庭的開審，他們在鄉村裏樹下舉行的。那裏我聽了十二種案子的審問，如偷稻和私運烈酒一類的事，審後在一個下午中間全部得了解決。最普通的判決是『強迫勞動。』這種勞動無需罪犯離開家庭，只是沒有薪給，要他們做些有益於社實的工作，如修路建造學校，和辦理村蘇維埃的事。只曾經有過一件很嚴重的案件，那是一家集體牧場死去了一半奶牛，事情顯示了牧場的管理員，除了輕忽之外，似有比這更壞的地方。法官認為他『至少犯輕忽的罪，』但還展期調查他是否還犯其他如意圖破壞農場的陰謀的罪。在這裏，他將被從鄉村送到勞動營去，會有三年

的強迫工作。

勞動營是處理各種重要犯罪的通常方式，不管是刑事的或政治的。大部份舊監獄都取消了；我曾看見過在鄉村中的都改了學校。蘇維埃全體對勞動營都看得很高，那裏有幾萬人被改善了的。不過近年來勞動營却成了好多攻擊蘇聯的中心，外國報紙常有登載刑詢和酷刑的消息。當然我們無法禁止別人作這樣的誣蔑，可是曾經參觀過勞動營的人，任何人都會不同意這樣的謾言吧。英國刑法學家卡爾考脫博士，她曾經研究過全世界的監獄，到過蘇聯大部份勞動營去看過，除在她著的『蘇維埃司法』中說了之外，曾在和我的談話中也說過蘇聯勞動營中的『可驚的正常的』生活，使它根本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監獄。

她注意監犯活動的自由，不管地方怎樣的大，而且沒有怎樣的看管，完全在正常的情形下工作——工作時間從七小時至十小時，如果所作的工作，像拖拉貨車之類，能夠時常休息的。她不看見有什麼催促的勞動保障的法律和在工廠裏的一樣。工資也和外面的完全同樣，而生活費用則比外面的小。尤其這些監犯能夠把錢寄到家裏去，儲蓄起來或是依他們自己的意思化用。『他們心理上不受什麼壓迫，身體也不受刑罰。除了特殊的情形外，不分離他們，特殊的權利和獎勵代替了特殊的刑罰。』所謂特殊的獎勵，即得有二星期的假期，其間監犯可以離開勞動營，和允許家屬不僅有看他

的機會，甚且得延長時期和他住在一起。那裏有的是正常的人類社會，男人與女人在刑罰執行期內，就是所在地方不同也得見面甚至結婚哩！

但最使卡爾考脫博士感動的，倒是那些負責這些勞動營的人的樣子，和他們對監犯的關係。她告訴她跟一個主任參觀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勞動營的情形。監犯們快樂地豪不拘束地向他歡呼。一個女孩子衝出來，牽住了他制服的帶，留住他，要他在她告訴他某些事情前不要走開。一個快將滿刑的教員，表示了願意留營在他指導下工作。這勞動營中總管理處只有一個辦事員，可是全營的人却有好幾千，一切工作，即大部份看管的事，都由監犯自己做的。卡爾考脫博士說，『真的，除非他們願意留在這裏，我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看守了他們。依我所知道，那裏假使真有誰要逃跑的話，可說絕無怎樣的困難。』

關於這問題，卡爾考脫博士，問過監犯和辦事員；她和監犯不在辦事員前很自由地談的，所得的答覆，却是同樣的說，他們之不逃跑，因為要是跑了再回來，『勞動組裏就會沒有人再理睬我。他們將說我侮辱了他們。』不過也有些怯惡不悛的一而再的逃跑，這些人終得加以相當時間的看守。她說政治犯和一般的一樣的待遇，只有那些曾經頑強而嚴重地攻擊了政府的，才送到遠地去，使他們不能和和其過去同謀的有接觸的可能。她和這些政治犯間所有的談話中，她找不出有那個僅爲了不

同情蘇維埃而被判了罪的。判了罪的則都曾經有過反政府的明確的行爲的。

有一個實爽到這樣的人告訴她說：『能夠毀滅政府的事，我都做過，最嚴重的要算怠工。但這兒他們這樣的待我，使我相信了他們是對的。』

還有一個監犯，他曾經被監在星星，桑吉打，德國，西班牙和英國的監獄也都住過，後來爲犯了鉅竊案被蘇聯逮捕，然而這回波羅的海白海連河的工作改善了他。他年青時曾經做過一些工程的事，所以蘇聯司法當局根據他有這樣的專門技能，便給了他這一工作的機會。他獲得過一次獎章，繼續了他的研究，當卡爾考脫博士跟他碰面的時候，他正担任着莫斯科伏爾加連河的重要工作。他答覆了卡爾考脫博士關於他轉變的問話，他這樣說：

『別國把我當作犯人看待，監在牢獄裏，叫我知道我的情形。而這兒呢，他們撫我的背，老跟我說，「我們什麼能夠使你變爲一個有用的公民呢？」卡爾考脫博士和許多現在在蘇維埃工業中占很高職位的人談話，這些人都是以前由勞動營改善過來的。他們的態度和別人對他們的態度，絕對不因過去牢獄生活而有什麼輕蔑的意思。曾經有過一位對她說過：『自然，事情過了，也就忘了。』卡爾考脫博士說：『那是真正的再生。』』

許多從其他方面的報告，和我自己的觀察，都和卡爾考脫博士的完全一樣。在一九三五年八月

裏，我到過熊山的一個鎮，那是波羅的白海連河的管理中心，在蘇聯大家都知道它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建設事業，而且是千萬人爭取新生的地方。也是這區勞動營的分配中心。

替我駕駛汽車的汽車夫就是一個監犯，他很自由地和我談，說他不愛北方，但這裏至少有研究一種行業和做個工程師的機會。十幾種工業已被建立起來，這些工業利用和訓練一切種類的工人。他們很誇耀他們的現代裝置和他們生產的貨品的優良。每當節日慶祝時候，你到公共場所去，根本分不清誰是監犯，誰是自由工人，誰是「看守」。全場儘是國家某種新建設的空氣。真的，這裏的企圖只是這麼——創造一種正常的建設生活的空氣，根本的撇棄一切的舊的牽連。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那個很有名的劇院，那裏的導演很自負他曾經著過樂劇〔Eugene Onegin〕歌劇〔Red Poppy〕和許多最近莫斯科上演的劇本。後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莫斯科有名的作家，可是也爲了一件嚴重的犯罪案被送到了北方去。勞動營當局爲充分利用他的能力，便立刻決定建築一所劇院。劇院由犯法的，政府官員，自由工人和他們一切人的家屬組織起來，民主地親密地形成一個戲劇團。這位名導演對於他自己的作品，我們正不知他將怎樣的判斷，認莫斯科時的工作好呢，還是以北方築在熊山的劇院工作爲好。

許多過去波羅的白海連河的罪犯，雖然因爲他們工作好，得到了特殊的獎品和很高的榮耀，而

且得到自由，却都自願的到莫斯科去做開鑿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監犯工作。這裏，他們得到了特別的重視，因為他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知道罪犯的種種心理狀態，尤其是他們善於幫助他們改變和糾正自己。與其他蘇維埃建設營一樣，這裏的工人，也有他們在專門家指導之下的藝術習，他們的音樂會和文學刊物，和他們的發明局，在發明局裏，曾經由罪犯們自己提出過四千件改良運河工作的提議，有好多罪犯爲有發明得到了自由，可是不願意離開要等運河的完成。

蘇聯改造人類的方法這樣的有名和有效，現在甚至有罪犯要求給他們改造的。我在牯林村就碰到過一個這樣的人。他偷東西，常常喝醉，當地都知道這個壞蛋，曾經犯過十二次案，最後他到當地當局去說，『我是一個敗壞的人，但我要改變過來。』他們便把他送到一個勞動營去，到回來已是一個很好的工人了。被爾雪伏公社，即最有名的罪犯『療養院』，那裏進去很不容易，聲請後還須得大會的通過。因爲等着進去的實在太多，它只能收容最難感化的罪犯；這公社能夠改好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勸化的罪犯。它底力量在於它有許多已經改善的過去的罪犯，他們能用深切的犯罪心理的知識來對付新進的罪犯。

今天，在蘇聯，犯罪迅速地縮減着。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兇殺案的判決減少了一半，性的犯罪則減至四分之一。原因全在乎蘇聯改造人類的客觀力量增加了的一點；刑事政策僅是一種次要

的力量而已。娼妓數目的減少，可說是這種原因產生的最好的結果。在戰前，莫斯科有二萬五千到三萬個妓女；到一九二八年減為僅三千左右（註一）。這種減少顯然是由經濟的原因，到一九三一年，五年計劃廢除了失業之後，娼妓數再減少到只有八百個左右。最後為根本消除那些習性最壞的，創立了許多豫防病院。在一九三四年時，全蘇聯豫防病院增到三十四個，後來為已盡了所負的使命，迅速的減少只有十九院。現在為住院治病的沒有，已剩最初辦的五所留在莫斯科了。沒有那個女子被迫了進豫防醫院的；她們犯規的最主要的責罰是驅逐出去，那些進去的底十分之九，不僅身體上的病，即連舊的惡習都治掉了的，她們無需人的指點，都參加了城市正常的勞動生活。

蘇聯根據在蘇維埃生活中已樹立了由社會主義制度所產生的新意識，希望着根本消除犯罪。因為犯罪從馬克思的觀點看來，是由一個階級剝削的社會底衝突所產生的，階級和剝削一天消滅，犯罪也一天不會發生。在新制度開首的幾年中間，因為消滅特權的緣故，階級鬥爭非常的尖銳，所以那時犯罪和國家所用的嚴刑，都有了決定的增加。那時富農們縱火，殺害牲畜，暗殺，所以大批的被放逐了出去。反蘇聯的工程師和官吏怠工，被送到了勞動營去。今天呢，富農們已得到了大赦，這不但因為他們因光榮的工作而恢復了他們的公民資格，也因為鄉村中的集體農場，已經能夠對付他們的

攻擊和吸收他們。代替監獄的勞動營也自動的減少着，這一半爲了它們已治好了它們的病人而更要的爲的蘇維埃社會的正常的自由生活，日益堅強和繁盛，足夠有一種直接的感化力克服殘留的缺點。

蘇維埃作家阿夫台尹柯曾經用非常動人的話，向蘇維埃大會講過一件事。他自己在幾年前也自認是『兩腳的惡獸』，曾經當過一九三四年的蘇維埃大會的代表。事情是一個青年墮落，和從犯罪者改造爲名人的歷史。他說：『一九二六年時，在莫斯科·達西旨的快車車廂裏躺着兩個小旅客，一個我自己和一個我的同志，乘客們要我們讓到靠太陽那面去，我們便找和善的，我們奪了不會發怒的那些人那兒去。』可是他告訴那賣票的怎樣把他們推出去，推到了泥潭裏去，他們怎樣在雨雪中飄泊，找尋些熱氣和光綫，然而到處碰壁，他們疲乏了，他們恨，失望，至於恨人類。在憤恨中間，他們把幢在一所房子旁的柴堆放了火。』我心理充滿了溫暖平靜的感覺。眼眶裏全是報復快樂的熱淚。我們擁抱了，笑着叫着，接着的半個夜晚全在公共盥洗室裏耽過了，我們緊靠那溫暖的牆，先暖我們的背，再暖我們的胸，直至我們站着睡了過去。

『我一生中許多年數，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生活，所以只有憎恨，報復，殘酷，全是在這車站上種下的根。自從那次事情之後，我只知劫掠恐嚇人家，不知有所謂悔恨。』他告訴他怎樣偷人家的皮大衣

和奶油瓶，怎樣的在黑暗的小路上刼奪醉鬼的錢，怎樣把流氓驅開偷他們的衣服。他逐漸變成「——只人獸。那是最可怕的二腿的吸血東西，沒有愛，沒有仁心，沒有感覺，沒有憐惜。今天我想都不敢想起這樣的人。

『今天在這歷史底的大廳裏，我站在講壇上，算是政府的一份子。我是一個權利完備的公民，我有力量。我有人類最好的感情，仁愛篤信，誠實，自我犧牲，英雄主義。我寫作書。我想着創造一種不朽的作品。我很大方地愛一個女孩子。我繼續着我的行程——這將是一個幸福的前途。

『我快樂，有着一切生之快樂，不可動搖的充實。我不願睡。我常願醒着。我將活一百歲。我能飛到月球裏去，到北極去，做一種新發明出來，因為我的創造力量，自由自在，不受絲毫的壓迫的呀。

『今天我最後一次記起我的過去。我填請求書的空格時，在「工作地方」一項下，我這樣寫「爲害社會到一九三一年爲止，我從一九三一年起開始我的生命史。」他們回答我「就這樣。」所以你們知道我還只有四歲，我是這裏最年輕的人。』

岡夫台尹柯還講了其他過去犯罪而現在已改善了的人的故事。他認他們過去反社會的根源，須歸之於資本主義剝削的殘留。他在新社會工業和環繞於新工業周圍起來的新生活中間，找到改變他們的力量。『你們大家都知道那些機關，那裏這些人們被再教育了的。至於我們整個蘇維埃制

度，那是一個再教育人們的大工場。我知道兩代的人民，他們的生活遠不如我們的。我們是工程師，作家，飛機師，新聞記者，機師，城市管理員，科學家，北極探險家。我們國家的工業再造了我們，而這些工業是史太林國家工業化政策的結果。莫洛托夫同志說了新造的工廠，城市和整個的工業區，但他沒有說及生活，人的生活的給與，那些我才說的二只脚的野獸得到了人的新生了呀！

第十五章 自由空氣中的青年

「十五歲的那一代定可見社會主義的實現，同時也由他們自己去建設。」

——列寧語——

生在這樣的國家裏面，生在這樣的時代裏！人生是有意義的，生活也是有意義的……國家的青年主人們，我們快起來去征服空間和時間！』以上這幾句話，是一個蘇維埃青年學生安那姆里尼克說的。他是一九三五年六月時，莫斯科舉行新十年教育制度第一屆畢業典禮席上，對會衆致告別辭的代表。他這幾句話，使全世界千萬顆心靈都驚覺起來，使全世界對於社會主義的領域裏面青年的前途，有了更深一層，更明確的認識。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青年，他們的前途是極爲慘澹的。在社會的外表上，他們所見到的，只是到處泛濫着的失業的洪流，在他們自己的內心上，又只覺得前途的沒出路。他們都是合理的孩子，他們都有前途，但理被推入這不合理的社會的駭浪裏去。這種理由是

連他們的父母和教師也不能對他們解釋明白的。所謂最愛顧他們的人，只在他們的面前刻劃着無數的幻想，教導他們注意過去歷史上的事物，要他們也守着過去的法一往直前的做下去。可是，現世界的青年，他們是需要和這因循不變的黑暗的傳統鬥爭的。這就正吻合了著名的精神病學專家威廉博士（Dr. Fran woods Williams）所說的話，『他們現在正需要在黑暗裏作劇烈的鬥爭，……

：即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給與他們的一切情感上的紊亂和疑慮作英勇的鬥爭。』

蘇聯的青年也沒有逃避過鬥爭：他們是在內戰的烈焰裏生長起來的：他們在幼年時代忍受着連年的饑饉；他們的青年期又已貢獻給建設國家這偉大的使命，在那連年的戰爭和建設的時期裏，許多青年，有的是因之而喪掉性命，有的是因之而在神經上或心肺上受了重大的斷傷，致成爲殘廢。就是現在，他們也感受着世界大戰在他們的前途上的威脅，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衝突日益尖銳化的今日，大戰是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的。同時，他們也知道在這戰爭裏面，他們自己的犧牲是避免不了的。

那麼蘇聯青年在文字上，在遊戲和慶祝上逐漸顯現出來的狂歡的情緒是怎樣發生的呢？這就是因爲他們都是「青年的主人翁」啊。在過去，人民不是帝王的臣屬，便是民主制度下少數權貴階級隸屬之下的附庸。要不是到了社會主義時期的現在，他們是不敢承認自己是土地的所有者，人民

有了主權，然後才有計劃的自由。目標的認識，知識的調和以及開展生活的願望。大眾主權的聯合產生了保障自由的友愛精神，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新的，征服空間和時間的廣大的意志。

在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召集委員大會的時候，有三十一個男女青年由集體農場方面寄發了一封慶賀的信。這封信就把上面所說的那種意志充分的表現出來：『我們走上了富有生活意義的大路。我們也認識了自己的目標。我們要用正確的意識來從事於一切的工作。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必需的，偉大而光榮的事業。我們知道我們集體農場工作的目標，我們也知道明天的情形，因為明天就是要我們自己去創造的。今天是好的，明天將會更好，後天更有說不出的好處。使我們時常懷念的，是我們的農場，我們的村鎮，我們那可愛的全部國土的將來。同時，我們也想到人類完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光明的將來。』

並不是什麼神秘的迷信，使這三十一個青年對於自己的前途，懷有這樣的希望，而是由於日常的生活裏面的瑣屑的事所啓示的。初次看來，這些瑣屑的冗事，似乎是不足以表明他們的愉快的。他們說荒瘠的土地可以變成肥沃的土壤。『我們的村中是從來不知有麥的，直到布爾札維克才把它帶到北方來。』他們報告說：在他們收穫業已激增的穩固的經濟基礎上，不論是音樂，戲劇，遊戲或科學等，都有了飛躍的發展。他們看出農場的成功和國家的成功有密切的聯繫，根據這一點，就引發起

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希望。他們的生活，從農場以至世界，完全是整個的，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形成了他們，使他們日漸的成長起來。

蘇維埃學校對於這些青年主人們懇切地要求開發的德性是什麼呢？當然不會是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戰爭和侵略，相反地，却是一種初步的科學興趣的高漲，一種和社會直覺聯繫着的個別變化的高度發展。蘇維埃學校的目的不是在造成一種標準國民，來切合造就未來的領袖人物的需要，而是在輔導青年發見和發展他們自己的意志和才能。學校方面常常千方百計的探問：你最喜歡幹什麼？同時，他們更用盡方法，使這種健全的選擇和與此作同樣選擇的別的人發生密切的聯繫。

一位在蘇維埃學校裏當過多年教師的美國人告訴我，他們接近兒童的機會要比在美國時特別來得多。他們也竭力設法要找到兒童的特性和興趣。在初初裏面有兩種教師——起初由幾位教師和這一羣兒童混在一起，經過好幾年工夫，隨時訪問他們的家庭，等到完全了解他們之後，然後才報告專任教師，再由專任教師來啓發特殊的才能。但到了第七年級時，——大概相當于美國的中學二年級——就得用心理學上的測驗方法，來決定兒童的特長。教師就在那時候告訴學生他自己的才能，但這並不就是強迫了他，限制了他選擇的自由。

夏季的露營和旅行，也是輔佐兒童發現他們自己那時特殊的興趣，和擴大他們的選擇範圍最

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最著名的營場，是在克里美亞的阿爾的克的營場。在那裏，各種各樣高年級課外實習的設備都有，比如對於地質學，植物學，禽獸保護法，航海生活的體驗，以及飛機汽車模型的製造等等，不一而足。兒童們就在這種營場生活裏渡過他們的暑期。往往可以發現，並且發展他們所愛好的工作，甚至可以就此進展而為他們一生的事業，即不能發展自己的兒童，在這種生活裏，也包含有決定的意義。此外，兒童也可以在新開張的討論上得到表自己的機會；有一種先鋒真理報（*Our Pravda*）是特別屬於兒童的，報上執筆的作者，幾乎全都是兒童。

去年夏天，在開到北極區的穆爾曼斯克（*Murmusk*）的火車上，我曾經遇到二十個少年「北極探險隊員」，年紀都在十六歲以下。因為他們對於地理，北極探險，北方民族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得到教師的推舉，所以才能夠組織成功這一個北極探險的旅行隊。他們快要和成年的探險隊員們會合在一道，也可以受到溫和而有禮貌的看待，因為這些成年的探險家都把他們認為未來的同志呢。另外，研究植物學的，可謂最優秀的十個學生，也受到同樣的待遇，由政府供給經費去遊歷阿爾太山。他們在那裏抓出涉水的跑了二十公里的路程，搜獲了二十七種黑醋栗的新種，另外還有一種能抵抗四十五度凝霜溫度的玉葱。當年探險隊員推舉出來的兩個代表，把植物去交給高年的植物學祖師米邱林（*Michurin*）時，那老人問他們：「你們白天要涉水，晚上要在森林裏挨夜，難道真的不

覺得害怕嗎？」這兩個代表回答說：「有時候我們覺得害怕的。我們就憂自己的遠征得不到新的植物種子，就憂會玷辱了我們自己密邱林的孫兒這個身份。」

對於優越的天才者，這種旅行可說是一種褒獎。但全體兒童多少都有參加進這種國家的「成人」活動的資格。在莫爾維諾這個村鎮裏，有好幾個農場兒童帶着驕傲的神氣對我說，他們曾經堆雜了好幾十噸鳥糞和木燼去肥田。當一九三四年「抗旱運動」時，南方在收穫上最成問題的，就是那稻幹的枯萎和穀粒的太易撼落。那時候就有成羣的「兒童拾穗者」跟在刈稻者的後面，拾滿灑地上的穀粒。蘇維埃的兒童裏面，沒有一個是不知道米西亞的英雄故事的：這是一位曾經當場捉獲三個偷穀賊的英雄。我在阿爾的克的營場遇見過一個孩子，他曾經向路局報告鐵軌脫輻的消息，使火車不致遇險；另外還有一個孩子，他用燒烽火的方法，救了黑夜迷途的飛機。所以，這兩位小朋友在別的兒童羣衆裏，便得到無上的推崇，他們便把他倆送到阿爾的克去過夏，作爲一種酬報。蒂弗里士鐵道工人的孩子們在文化休息公園裏築成了半哩長的一段鐵路，架駛火車的人也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火車可以載運遊客，每逢星期假期可以有一千盧布的收入，這千盧布可以用於蘇聯最普遍的「開闢道路」這事業裏面，所以，這的確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事業。

有一個時期，這種種兒童的校外活動，竟因過於狂熱而影響到他們的學業和健康。青年先鋒隊

「救助了收穫，」感化了酗酒的父母，清算了鄉村裏的騙子。因而，大家就發生了「他們的第一任務是到學校去呢，抑或是去幫助國家」的爭辯。現在，兒童們都牢記着「學習，學習再學習」是列寧所宣佈青年應守的三大原則之一。學校是統制着，組織着兒童的一切其他活動的，但是從不擯斥他們。在全部學程裏面，他們都有用各種方式參加活動的自由。

初期的兒童訓練，大部份是在集體的壓力之下，由兒童們自己的努力所促成的。他們時常向教師提出疑問，要求解決疑難問題的方法。他們也把足以妨礙兒童的學業，或足以妨礙兒童的團結的家庭情形報告給教師。他們組織了委員會，跟教師一道到各個家庭去。兒童們願意自行去揭發破壞兒童勞工法的行爲，或者在報紙上發衣別的兒童給父母毆打的事實。天分優越的兒童，把自己學習的心得，去幫助別的比較落後的伙伴，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光榮。但他們對落後者的幫助，並不是要用謙遜的態度，而只要以團體合作的精神，正如在籃球比賽裏，幫助他的比賽同伴共同獲得勝利一樣，無論在那一個學校裏面，如果有一個兒童的行爲妨害了多數兒童的工作，經過大家的要求，把他排斥出去時，他便要受到最嚴重的懲罰。

所以這些兒童活動，不獨直接的反映着兒童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在準備着未來的成年生活，爲大衆的利益而奮鬥的個人情緒的激勵，這在青年的內心裏面展開了，成爲意義更確切，範圍更擴大

的個人興趣。在十年學校——大概相當於美國的由小學至中學畢業的全部學程——畢業之後，大多數兒童對於工作都躍躍欲試了。有好些青年人去工作的時期，比這還要早些，大都在十四歲到十八歲之間就到作坊的工業學校裏去，實行半工半讀。但也有些直接的由中等學校升入大學。可是通常的都是在十年學校畢業之後，經過幾年工作的訓練，然後才決定專修那一門技能的。

這些並不是像在美國所普遍見到的那樣，叫人們勉強的幹着短期的工作，來維持他的大學生活。相反地，却是蘇維埃的青年們在生產的現實世界裏面自覺的自學生活的一個分野。是按照他們所已經發現的興趣去體驗和發展自己的一個方式。據說有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他自願在夏天時到農場去工作。因為他已發現了他自己的興趣是在昆蟲學那一方面，他已決心要做一個昆蟲學家，所以希望農場能夠把科學的工作給他做，他挑選着需要治病的蘋果，在菜葉裏蒐集昆蟲標本，要不是就憑他本人那特殊的興趣，注意農場的生產，在這工作的實踐上來促進自己的科學技術。倘若有了什麼意外的變故發生時，各方面都可以盡量的不幫助他。但所謂意外的變故，因為它會使工作陷于停滯，使青年們白白的耗費掉他們的時間，在蘇維埃的產業上，是被認為名譽上的污點的。另外，還有和我熟悉的四個女子，當她們到西伯利亞一個化學實驗廠去工作，發見廠內不獨凌亂不堪，且沒有實際工作可做時，便向黨提出抗議，說這是浪費了她們的時間的工作。於是這個僱用她們玩視她們

的實驗廠便被解散了，這四位女郎也就被安插到別的廠裏去工作。青年們的光陰是社會最可貴的財富。任何一種職業，只要它對於青年無益，不能使青年從它到得更多學習的機會，那青年人就有自由放棄它的充分的理由了。

在整個生活過程裏面，在青年們的工作和學業間，是從來不會發生些微的衝突的。教育並不是一種可以用金錢去購買得來的商品，更不是跟着兒童時期的完結而結束，或在四年美滿的大學生生活所能完畢的。它不單適應個人的要求，同時也適應大眾的需要，任何人都可以無限制地，由童年以至耄耋地，自由去享受它。至於一切課程，更不是在某一個時期，草率地把牠裝進了腦袋便算完事，一定得在工作餘暇時隨時隨地的去鑽研。無論什麼地方的工人，只要他們決定了研究化學，學習音樂或航空跳落傘，他們都可以要求所屬的職工會支付教師的薪金；在蘇聯，工人的教育經費全是由國家或職工業去供給的，當青年們覺得他們所選定了固定的專科，確需要數年的時間來潛心研究的時候，他們便可以請求准予進入大學或研究院。但在未進入研究院之前，學院當局對於他們的精力和誠意，是要經過很嚴格的入學試驗才能批准的。在他們被錄取之後，求學便成爲他們最正式的工作，同時由國家當局領到相當的補助費，在學院裏，他們的工作和在工廠裏的一樣的繁重；他們每天要在課室和實驗室裏花上六七個鐘頭，去研究自己所選定了的學課。可是這些學科都是有意地

安排好了，作爲他們將來職業的準備。

我曾經探訪過高等教育的三大研究院的公共宿舍。這三個學院：第一個是鑛學院，第二個是冶金學院，第三個便是非金屬研究院。在這宿舍裏面：一個美麗的女郎正在專心的研究鼓風爐；一個正在學做鐵師，但他以前曾做過釘書工人；有一個製造所裏的工人竟成爲中亞細亞的地質學家了。另一個臉龐平板而焦黃的卡札克人（KAZAK）也預備到新開的卡札克司坦銅鑛場裏去工作。這些工人，他們全由重工業委員會按照他們的研究墊付薪俸。他們的薪俸，每月通常由一百至兩百盧布，當然，學績比較優良的學生也可以得到比這更高的報酬。每年在夏季時，他們得在各地方上選擇自己的「實踐工作」。當他們一經選定了畢業後的工作，便由那選定了的工作機關另外付給津貼。這種選擇大抵是在五年學程中第三第四年時決定的。他們在求學時期，教育經費既是受自某個機關的，那他們至少得撥出一個時期，來爲這個機關服務。這樣一來，他們會感覺自己已經受了工作的束縛了吧。但這種服務，對於他們，不獨不是含有些微強迫性質的工作，反而是根據他們自己從各種機會上所得到的正確的理解，而純粹是自願這樣的，只要有相當的理由，例如關於個人的健康或國家一時的需要，他們便可准許變換他們的工作。可是沒有理由地隨意的改換工作，却是玷辱了青年們的品格的行爲。至於畏難而退，更會被人當作胆怯的落伍者來嘲笑。倘若他不能把情形改好，他幹嗎要

去學習呢？難道現在這工作不是他在「不論那一方面都任他去選擇」時特別選定了的嗎？

青年們所選擇的是那一類的工作呢？他們所選的決不會是輕易的工作。青年們既然有的是自由選擇的權利，難道真的就沒有了一個是棄重就輕的嗎？決不會有的！青年是需要征服一切的。青年們有的是爆炸的力量，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爲着要防止他們起來毀滅這個舊世界，他們必然的要受到種種顏色的錯覺和迷惑。但蘇維埃的青年們，是被鼓勵，被號召去改造世界的，他們也就如期的答覆了這種號召與鼓勵。在蘇維埃政權從開始到現在以來所遭遇的每一次苦鬥裏面，都有着自動地來參加進去的，那顛撲不破的青年的力量。

青年們在做事的時候，是用不着別人去督促的；他們都以爭先爲快。在青年前進黨的組織之下，他們總是自告奮勇地站在任何最主要的位置，站在最前線作戰的。我所認識的婦人裏面，有好幾位是曾經在內戰時期參加作戰的，她們曾毅然的和那阻撓她們前進的丈夫離婚。史太林格勒曳引機場，是蘇聯首屈一指的運輸機關。但這偉大的機場就是由各地會合在一道的青年們所建造和管理的。在六年以前，他們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要把我們整個青春都獻給這個鬥爭。」「我們不願讓他在舒適和娛樂的生活裏消磨去，我們不把史太林格勒建設成功一個社會主義的城市誓不甘休。」記得有一天晚上，十一點已經敲過了，從我住所的窗外飄來一陣陣鼓漿的水聲，搖船的大

概是一班經過了整個炎熱的白天，要在夏夜裏來一次「夜遊」的工人罷。接着，是青年人的喧笑聲，把鼓漿聲都掩過了。在這喧聲裏面，我依稀聽到這樣的一句話，好像是嫌夜已深了似的：「回家去吧！把精神好好的恢復過來，好預備明天的工作呀。」過後，喧聲和鼓漿聲漸漸的也就寂靜下去了。以上所說的記憶，直到現在，還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裏。

在亞州東北部鄂霍次克海岸上，青年建築了一所 *Comso Molsk* 造船港。過去那本是一個蚊蠅叢集的森林地帶，但現在卻已成爲莊嚴巍峨的新式都市了。莫斯科的地道，可說是世界最雄偉的工程的了，但也是青年們把它建築成功的。爲着這個地道的工程，莫斯科青年黨員除了犧牲了自己原來的工作的而外，還有許多是暫時捨棄了自己在大學裏的學程，而胼手胝足地來參加挖掘的。要之，不論那一種偉大的建築工程，青年們都在裏面佔據了最重要的部份；爲着要和成年的工人們競爭，像鑄造鼓風爐這樣吃力的工作，他們也把它承受下來了。他們組織成功一種特殊的農場，造成最光榮的記錄。他們像狂濤一樣地盪湧進各處新的產業部門，新的技術都緊握在他們的手裏，因此，就不斷的把新的技術人才造就出來。

和世界各國的青年一樣，蘇維埃青年們也紛紛地鬧着在工作和婚姻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在他們問題的發生，不是能否支持婚後生活的問題，——因爲他們認爲這是當然能夠的——而是有沒

有時間來滿足家庭生活的問題。在最近，有一個工作繁重的青年在 *Romsom's daya* 真理報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我是機器間裏一個司機，我也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除此之外，我還要從事於一種發明的的工作。我每日工作的煩忙簡直使我連呼吸的工夫抽不出來，我只能夠在夜裏見到我的妻子，但那時候，整天的疲勞卻使我立刻躺上床去，像一具死屍一樣的沉沉睡着了。莉珠亞哭了。我不是一個禽獸；我是同情莉珠亞的。但當我一着手去安排我的時間時，我就發覺到我簡直連一個鐘頭的設計時間也騰不出來，那就更談不到有充分的時間去滿足什麼家庭的生活了。』

當我們看到古珠尼疏娃選擇丈夫所下的標準之後，我們應知道這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她說：『不是一個良好的社會工人，我固然不要，但我也願和一個只專心注意于工廠工作的同居，一句話，我不要只偏於一面的人。我意中的丈夫，是一個能夠跟我一道打排球，滑冰，看戲，玩音樂，有同樣程度的文化水準，跟我一起讀書，並且可以互相討論的男子。因為只有這樣，才夠得上說美滿的生活。』古珠尼疏娃所說的，其實都是如何使生活豐滿和充實的問題，而這種豐滿和充實，只要人力一加以促進，便可以達到。蘇維埃青年們是不願放棄任何滿足的生活條件的。

九月一日是國際青年節舉行慶祝大會的時候，每年在這時候，青年黨的機關報康姆梭摩司卡的辦公室裏就壘滿了電信，最少也有數百通以上。從這些電信上，可以見到青年們在事業上的成就

和他們對於國家的貢獻的一班：有一隊青年鋼鐵工人，電告他們在六日裏翻造了一只爐灶，這工作通常是非得十日不能完成；另外有一隊青年鑛工，他們派來了一輛滿載鑛煤的列車，由精選出來的火車人員們護送着；還有一隊是報告着「文化田野營」的組織說他們那裏音樂、戲劇和書籍等都式式齊備。田場夜工時的生活，從此可以得到調劑；另外有一隊青年在一輛紅場大遊行的展覽車上，高高地擎着運動的紀錄，要在會場的羣衆表彰它。電話裝配廠（Red Town Telephone Factory）的青年共產黨員們徒步旅行到蒙古邊境，在一百八十天裏，共走去了五千四百哩路，另一隊卻攀登阿爾泰山，直到離地約有二千二百哩的山峯才與盡回來了。他們慶賀那些橫渡半個亞洲和半個北歐的，從貝加爾湖到穆爾曼斯克的長途滑冰家的成功；登山和跳航空傘的青年們所創的紀錄，也受到他們那最熱烈的鼓舞。在蘇聯的青年，運動的紀錄和煉銅的紀錄之間，並沒有什麼明白的，嚴格的界說。一切都同樣是一致的，前進的生活。

蘇維埃青年在工廠全體的社會生活裏面，不單是以不妨礙工作爲原則，還要推進工作，竭力去發展運動事業和娛樂，使生活達到美滿。沙皇時代雖只有區區的三萬運動員，但目下已一變而爲六百萬了，不論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或中亞細亞，甚至土耳其和西班牙等隊的足球比賽時，總彙湧着整千整萬興高采烈的觀衆。但在這運動裏的目的，和在富麗堂皇的運動場上爭奪錦標的別國運動

的競爭是完全兩樣的。他們最主要的目標是在爭取G.T.O.獎章——這三個字的意思是「爲勞働與自衛而準備」——凡運動員中能夠超過競走，賽跑，游泳，划船，滑冰，跳高，和各種冬夏運動所規定的標準的，都可以取得這種證章。但潛水，跳航空降落傘以及其他比較艱難的項目的運動員，却也替他們預備了另外一種高級的G.T.O。

在蘇聯各項運動中最風行全國的是跳航空降落傘。在天空裏飄下的青年們，確像風雨天裏的雨點。每年當脫希諾農場舉行夏令的航空大會時，在碧晴的天空裏就滿佈着作飛行，滑翔，或跳航空降落傘的青年，蔚爲奇觀。這一百五十個青年都從巨型的飛機上一道跳下，張着綢製的，五光十色的降落傘，紅的也有，白的藍的，黃的，淡紫的都有，像一朵朵散開了的彩虹，飄搖而下。青年的男女們，不論是個人的也好，團體裏面的也好，每個星期都創造了新的紀錄；尼娜卡曼尼娃從凍冰的高空上下降，高度約等於伯蘭克山的高度的兩倍，她這一次是打破了世界的紀錄了。這樣一來，在蘇聯的青年裏面，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口號：『我國的天空是世界最高的天空！』

第十六章 新人的發見

近年來在蘇聯各報上都不斷地宣傳着新人的發見。主筆先生們忙着要分析他們的品質；作家們也忙着要替他們寫照。記得在一年前，有一位撰稿人曾向莫斯科新聞建議編一欄連次登載的短篇小說，要每一篇的內容都是一個生活的速寫。編者問他這種小說究竟可以有多少的時候，他毫不躊躇的答道：「大約可以有一千吧。」

「有一千！我們的編者不禁驚奇起來。

「真的要把目下在我們這個世界裏出現的人民底種種式式的生活都描寫出來的話，這一千還嫌不夠呢。」作者答。

林肯斯塔芬告訴我，他曾確見這些新人裏面的一個，是一個到荷里活來的蘇聯青年。『他簡直新到不能明白這些聯邦的程度。……他是一個單位，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動是一致的。他用那基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觀點去看美國結果，美國資本主義的手法幾乎把他弄昏了。』

我在蘇聯逐漸的也碰到許多新人。但我不明白而誤解他們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的；他們那種

接近生活的方法和我所知道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尊重我的意志，他們不願用自己的人品來征服我的見識，同時，也因為我太習慣於一般商人那種處置他們，安排自己的方法的緣故，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更遼遠，更容易誤解他們。此外在西伯利亞的火車上旅行的時候，我也有過與事實恰恰相反的錯誤。事實是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爲人似乎很樂歡的高級官員，他對任何人的那種親熱的接近，和誠懇的談話都引起滿是生活火燦的答覆。於是我就親眼的看見他規避通稱「小斜眼」的韃靼女郎的吻，而這位女郎卻是他兩天來最相好的旅伴。

「接吻是要給自己最愛的人才稱心，但生活的樂趣卻非和大家分享不行。」他笑着說。

「你知道，在這火車上，他們對他都懷着什麼想頭？」我問他。

「他們想的不是我，是他們自己愛想的事。只要他們和我易地而處的話，他們不會不是和我一樣的。」

他最後說：「我們布爾札維克，一如基羅夫常說的，應該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但我以爲我自己應該比任一位布爾札維克同志都更快活才對。我們的老輩人，積年累月的戰爭，早給他們打上了遍身的烙印。我們那年青一輩的人，你休想他們能夠辨別得出他們睡夢也夢不到的過去的那種殘忍法，但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壓搾下面磨鍊出來，我的青年時代是獻給自由解放的鬥爭的，所以，我認爲

我自己是一個老到足以知道已征服的過去，也年青到足以生活在這整個新生活裏的人」這樣，我可說是從未見過比這更完美的人品了。

那麼，我們已能夠問這新人道向前發展着的是那一個方向嗎？在這些和過去已完全兩分了的千百萬人民中，可有什麼共通的性格嗎？關於這兩個問題，已有許多人着手去整理了。當土耳其斯坦的騎士們完成了四千三百公哩長塗橫沙漠這驚人的事業，在莫斯科下騎後，史太林說：「唯有這種向前衝破一切障礙的堅忍和目標的清楚才能成功這樣光榮的勝利。」真理報更進把這作爲一篇論蘇維埃意識中的性格問題的社評底主題，說明這種人品和希特勒先前在給法西斯蒂青年那一番動人的演詞裏而所要求的「絕對服從」是絕對兩樣的。

真理報認爲「健全而純正的個人」才是一個蘇維埃市民最基礎的本質。不是資本主義在初期時贊揚它的上層階級，但現下法西斯蒂曲解成朋黨思想（Dangsterism）的所謂「倔強的個人主義」。不是在「上帝和國家」這種種口實之下，形成一種服從心理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即在法西斯主義下，對於人民，只能形成盲目的迷信，操縱着人們的命運的資本主義的意識。不是對任何問題都抱兩方面態度的那種才能；資本主義下的知識階級都把這種態度認爲是超越的智慧的一個徵象，但真理報是把這種態度責爲「人格的分離和兩重人格，在羅曼色彩裏的哈姆雷德思

想』的。

『共產黨所要培養的不是柔順的服從和盲目的信仰。卻是自覺、勇敢、和果斷。那是從千百萬大衆所共見的清楚的目標產生出來的，是從堅忍卓絕的鬥爭裏產生出來的結果，所以才**有**資產階級社會連想也不敢想的，這樣顯著的，自覺的訓練……：目標的清楚，忍耐和堅決在內戰裏已獲得勝利，恢復了我們那破敗不堪的經濟，同時也創造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和集體化的農業。目標的清楚，忍耐和堅決在冰結的北極上打開了一條通路，把我們天空的英雄高舉入真空層裏去，把許多偉大的科學的，文學的，和藝術的表現者擁近共產黨的身旁……：共產黨從我們偉大的祖國全體勞動者身上鍛練出他的本質即健全的個人，而這種個人是跟健全的勞動者的集體化有着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繫。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有很多人以為這些話是不能盡信的。他們平常既慣於把自己的生活認為是「自由的」生活，把蘇聯的生活認為是「不自由」的生活，那他們自然不能一時就抓着一個可以把握着真確的對方的觀點。即使是一個對於現下蘇聯的「人」只有極膚淺的認識的觀察者，他也會得知：雖有某種性格是這些「人」所共有的，雖然應該分別，應該把握着他們那共有的性格，但這決不就是要把他們編成一律，一體的納入一個格式。反之，卻從之而表現出一個個活躍着的

個人，至少，這種個人的偉大，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個人是一樣的。在支加哥有一個公司裏的職員他似乎是一個藝術批評家，他從來就沒有見過莫斯科，但他告訴我各種各式的蘇聯照片給他的印象却特別深刻，不論是在紅場上示威羣衆的也好，競技的或工廠工人的也好，由於流露在面上的那種希望的成分，都一體的使他感動。『和納粹相片裏那種綿羊一般柔順的或橫暴的臉孔真有天淵之別，』他末後這樣說。和蘇聯工人或很前進的集體農場的農民交談過的人，不論誰都會感覺到：他們自己所賦有的不單是自由，還賦有一種獨特的典型，即集體的維護自由，增強自由的方式，這種典型是健全的，是很足以克復世界上任何困難與障礙的。

自由決不是漫無限制的：反之，它是具體的，明確的。由於階層與階層間的不同，種族與種族間的差異，自由也因之而有所區別。美國的路工先鋒隊員偶而因為有了刀斧在手裏，便帶着一副自由創造者的口氣說：『我建築什麼東西好呢？』他的自由是受制於他爲自己的生存而負的債，是以他能否出賣勞動力爲條件，是以有沒有工程可做爲前提的（即如這個工人的鐵路工程）；甚至他自己的技術和性格上最細微的區別，也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但因為有了斧柄在手裏，他感覺到自由了。他那原始的生產手段的所有，就是他這自由的要素和保證。

當生產手段一轉而歸工廠所有後，跟着，自由的意義慢慢的也改變了。對於產業上，自由成爲確

定價格和工資的權利；對於勞動者，自由只成爲隨意調換職業，找求一個比較寬放的僱主的權利；對於政府，自由便成爲『選擇一個統治者的權利』，卻不是可以占有，可以統治的意思。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也徒然是一種訴苦的權利，一種暫時規避民意的呼聲，而不是把健全的生產之思想充實生活的權利。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到另一個階段時，人們都因他們的工作和才能而各各不同了，但只能以自己和僱主間的自然關係，即切合於一個僱傭勞動者的關係爲標準。蘇維埃工人就在那些到他們廠裏來的美國工人裏看出這一點性質。『他們知道怎樣去訴苦，怎樣去發表意見，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要求，怎樣去希望。』

當人們自己是主人的時候，自由便以『要求和希望』這形式而出現。當他們是聯合所有者時，亦即希望的形式發展了——但不像家庭，各種組合或委員會——而它自身是由羣體的會商來決定的。在蘇聯，『她不作個人的獨斷』這句話，早就成爲一句頌揚史太林的話了。這就和說一位科學家不願從簡陋的實驗得出結論的意思一樣。人們通常要把自己個人的意見通過別人的意見之後才能成爲正確的意見。但現在他們已逐漸的自覺到他們必需選擇的各方面的『意見』，他們甚至已進一步的把這些『意見』組織起來，綜合起來了。他們批評，但不是從遠離的，孤立的立場，而是把自己作爲局內的人去批評。工人表示不滿的手段，不是反對產業主的罷工，而是反抗官僚政治的，

團結一致的鬥爭，以改良地面上的組織。自由不獨不應成爲一次抗議，反而應該成爲一個穩當的，熱烈的選擇；不是躲避，而是尋求。不應把它看作漫無約束，而應把它看作在複雜的生活機構裏，對於各個事件，各個地方一種自覺的選擇。



在一九三五的下半年，史達哈諾夫運動震撼了整個國家。人民都把它比擬爲一次爆發，一次地震。這運動同時在百個以上的地點，大多數的工廠裏出現。縱使在它的人民間有極大的差異，但它那基礎的特徵是一樣的。工人們發明了新的機器，開始擊破過去的生產標準，更不時的反對工程師和經理們的冷漠和敵對的行爲，但卻受到他們自己工友們熱烈的注意和工作。他們每一個人都得各自對舊觀念和舊習慣作戰；間或有一兩個人被暴怒的工人殺死，因生產速率突然加高而受到侵害。但被實績征服的大衆意見都歡迎，都摹倣這些改革者。立刻，在他們當地那揚揚得意的羣衆裏面，聽到羣衆說：他們成功了。他們是當地的英雄了。

在兩個月之內，世界上每個國家都不能不注意了，他們用盡最好的方法來歪曲真實的報告，認稱是「強迫」的結果。因爲這不僅是從俄羅斯來的通常的消息，這是世界生產性和科學最高界線的

擊破唐巴斯的礦工加倍了，魯爾的生產量高爾基汽車工廠的鐵工打破了福特的標準，列寧格勒的鞋工創造了新記錄，高出了捷克拔佳原有記錄的百分之五十。年輕的紡織姑娘們超過了美國最好的成績。瑞典的鋸木機，原以九十六立方米突為標準速度，可是阿契格爾的木工開玩笑似的提高到差不多三百立方米突。

幾百個美國工程師和工人，他們在五年前都曾『教過俄國人』。現在有的做着各種不同的職業，有的不做事，分散在世界各處，聽到了這樣的消息，也許要如下怨恨：『為什麼不在我們教他們的時候就這樣呢？』因為事實這樣的明顯。蘇聯全國已裝置了現代機械，用了現代的方法，一千一百萬個新人參進工業管理着它們。這些新人們曾經損壞過機器，浪費過原料，可也學習了它們。他們不能在教師教他們的時候，立刻就會，但得在他們的神經系統中成長起來。而且他們所學得的，不僅是美國的技術技能。技能外更有着他們為所有者的認識。這是整個偉大的機械化的生產全體的所有，它創造着現代世界。

被選出席全聯第一次史達哈諾夫運動者大會的人民們，——莫斯科每個人都想去——告訴了我們人民們的不可形容的熱情，從心湧出的像電般突發的快樂。蘇維埃的報紙都用了無數像『馴服科學這只兇猛的鬃馬』、『消滅體力勞動和心力勞動之間的障礙』、『準備從社會主義到共

產主義去，那裏人民將得各取所需了。」史太林在大會上對到會的代表們說：『我們政府的領袖，從你們那裏已經學得了很多。同志們，你們教訓了我們，謝謝你們，十二分的感謝你們。』那些大會上的人們都相信馬克思做下的計劃已證實了，全國跟他們一樣的這樣相信着，他們已創造了一個新經濟制度。他們千辛萬苦地現代化了這個國家，他們艱難地學得了共同管理它，現在出現了這裏預定了的結果。社會主義打擊着資本主義生產，恰如資本主義打擊了封建主義。

這些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有些什麼特點呢？那是一種愉快的動的創造，一種主宰了複雜的技術方法的自負，一種和社會意識的合作，一種對於學習的熱欲。他們討論中的每一句話，都顯示了堅實的創造力量和學習新技能的熱望。布西琴一個在高爾基汽車工廠裏車床上創造了鉗工紀錄的鐵匠說：『我從沒有夢想像研究這樣充實的東西。我不願單做一個工匠，我更要知道鐵鎚是怎樣做的，而且我還要使這些東西。』瑪利丹契科曾經創造了甜菜收穫紀錄的，要求在一個農業大學裏學習一種科目作為對她的獎勵，結果得到了允許。就是史達哈諾夫自己，他的創造紀錄，也是他同伴選他做代表下礦達到的。『國際青年節到了，我想拿一種生產紀錄來紀念這日子。因為我和我同伴曾經有過幾次想過：怎樣打破標準的限制，使礦工自由的設法，不要錐擊機停下來。』斯拉夫尼柯伐，也曾在詳細研究之後，想打破某種機械的紀錄，可是管理員不允許她，沒有得到實施。她回答說：『我

是大胆的航空傘跳躍者。『標準嚇不倒我，我將推翻它。』她終於把這機械提高到五倍的紀錄。她又說：『下午四點，我們有一個會議，他們爲我們工作好給我們花。』

你們得知道鍊鋼匠巴皮勒夫也是一個科學家，他說：『我們不是什麼競技者。我們化驗出我們的鼓風爐；我們修製，測驗它能出多少貨品，它告訴了我們有一一·三三噸。』瓦西里埃夫，一個曾經保持銲接工作紀錄的鐵匠，他用『沸騰』『爆發』這種字形容他工作的感覺。當他一九三四年的紀錄被安特列亞諾夫擊敗的時候，他激怒了，等不得他假期滿不滿，不管還有四天，便回去工作。『我打敗安特列亞諾夫，但我在報上看見一個喀爾柯夫的工匠做了一千件以上的紀錄。我真氣破了！』一班做九百四十五件。斯泰特尼克工匠也氣死了，他做九百七十五件。我跟同伴們商量怎樣組織我們的工作場；我們達到了一千〇三十六件。我們跟管理員討論這一件事，並且告訴他怎樣改變鍋爐；以真正的史達哈諾夫的熱誠，在四天之內，他給了我們一個鍋爐，這在一班的時間內，能燒一千五百件。現在有什麼能難住我們呢；我們討論，決定了怎樣堆置粗料，能使拿起來更容易些的方法。在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天，我創造了一班作一千一百另一件的全聯紀錄。同志們，我雖然沒有做到這鎚子可能的最高度，但我預備達到澈底的完成。』

史達哈諾夫運動者的特點，便是他們不做過度的工作，他們認爲這就是證明無效率。他們主張

一種不消耗體力的緊張——『假如工作做得適當，你會感得更好更強的；』另外還有的一點，就是他們教同伴們新技術的熱心。機車工程師沃梅里拉諾夫要求收教『最壞的工程師，』使他也爲紀錄的突擊者。斯拉夫尼柯伐曾被一個效率較壞的女人問過：『你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爲什麼你不教我？』她化時間指導年紀較大的女人，使她也得進步。

在新工廠裏的生活決不是容易平和的。相反的只有更像一種爆炸或戰鬥。我認識有一位工程師，他說史達哈諾夫運動者實在可怕。『他們在車床上都打標記。這些標記在各處都得見，我總算都滿足了他們，不然他們會說我怠工呢。這樣你會失去榮譽。你能被黨清除出去。我每天晚上得坐下計劃工作的進程。』這些新人的要求打破着舊的技術方法。因爲如紡織工人里薩柯伐所說：『每個工人都知道標準的超過完成，將不僅改進工廠中的勞働情況，同樣也得改進幼稚園，托兒所和膳堂。這一切都依存於組織的效率，合同的精神和計劃的完成程度。』

生產性的增高，在這些公司所有者絕對不再會出生失業的現象。工人得從這種工業換到那種工業。工業擔負休養工人的費用。那裏也有衝突，嚴重的問題和其他爭等，但是他們切實的感到他們能計劃能幹。他們已經從內戰，疫厲和水災中戰鬥過來的了。他們用了最大的努力達成第一次五年計劃。他們迅速地趕着一個第二次的計劃，這每年顯明地增加着食料，衣服和房屋。他們一點也不迷

惑他們是他們國家的所有者，他們將不斷有有價值的事情做。

一個史達哈諾夫運動者跟我說：「此後十年，農業工業將不是我們主要的事業。只要我們生產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貨物之後，便會有別的事業。人類的發展，探險，科學——這些就沒有限制了！」

不管這點新的建設者將造出怎樣的世界，但一件可以確定的：即它的建築是以意識的計劃和意志為基點的。創造的方式不是強制而是自主的，這一自主的選擇即發展着它自己的社會的保證。假如多數人民需要地質學，就多些地質學工作；假如多數人民需要醫藥，就將多些醫藥。多些幸福或多些餘暇，多些音樂或多些北極的探險工作，都隨多數人民的需要決定。總之，我們的新世界將是我們自主地創造的。並且假使有一面徧頗，遺漏了其他的話，那需要的社會傾向將明白地表示出來。物質的報酬和社會的認識的結合，早是自動的社會活動的方法。一九三三年二月關於農業為最重要的第一綫工作的宣布，號召起了國家最能幹的人。共產主義青年團為要求青年幫助的號召，同樣供給了史太林格勒耕作機工場和莫斯科地道的突擊人員。工資的增加和工作時間的縮短，使公共需要能夠吸引人民來工作，不管是開礦和醫藥那樣的不同。

然則人們的發展可有什麼界限嗎？這些新人就認為根本沒有。「假如在這樣短的時間裏，以這樣落後的人民，我們六分之一地面的所有者已做了這樣多，那我們人們，當我們有着我們地球的富

源，不再受戰爭阻窒時，還有什麼不能做呢？假使地球長老了，我們不把它改造適合我們嗎？假使太陽系終止它的轉動，我們不設法給我們的太陽以熱嗎？當地球是我們公有的工作場和家的時候，我們還需要設定什麼限度嗎？

這是他們確信的哲學。他們討論到這的時候，總是這樣的答覆。一種新宗教嗎？不，那是一個被丟絕了的字。他們將說是一種擴大的科學。他們對終極實在的認定，不是信仰的，也不是皈依的，猶如一切宗教所依據的那樣。這是通過智慧和意志的征服和挑戰的認定。奴隸和奴隸主，農奴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間的衝突終結了，無階級社會達到了，再來的便有意識的人和無意識的自然的衝突。不是由於信仰，而是由於分析，不是由於皈依，而是由於挑戰，我們得在那無終止的戰鬥中增高起來。無終止嗎？只相對的如此，不絕對的如此。不過終止在目前甚至還在我們想像的能力以外的。

這是一部和巴比塞的「史太林傳」互相媲美的巨著：

這是一本理論最正確，實踐經驗最豐富的分析、報導蘇聯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情形的書。全書共十六章，統計十二萬餘言。總之，本書把蘇聯整個社會生活各面揭露給我們，又是足以和巴比塞的「史太林傳」互相媲美的書，也是想知道蘇聯的真相的讀者非讀不可的「珍品」。

